

漂流、貧困、難以翻身，  
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3億人の中国農民工  
食いつめものブルース

山田泰司

# 3 不 億 存 人 往 的

# 賺錢的， 都是有錢人

這不只是農民工的故事，  
更是苦苦掙扎卻被時代碾碎的你的故事。

巫彥德 人生哲學專欄作家 林立青 作家

洪敬舒 廣州勞工團體聯合會主任——青工領袖

何明修 暨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學界

漂流、貧困、難以翻身，  
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3億人の中国農民工  
食いつめものブルース

山田泰司

# 3億存在 的

賺錢的，  
都是有錢人

這不只是農民工的故事，  
更是苦苦掙扎卻被時代遺棄的你的故事。

巫彥德 人生哲學及理財人 林立青 作家

洪敬舒 前理管系科編研部主任——專業書寫

何明修 華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視

漂流、貧困、難以翻身，  
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3億人の中国農民工  
食いつめものブルース

山田泰司

# 3億存在 的

賺錢的，  
都是有錢人

這不只是農民工的故事，  
更是苦苦掙扎卻被時代遺棄的你的故事。

巫彥德 人生哲學大師 林立青 作家

洪敬舒 臺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專業書寫

何明修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視

## 山田泰司 YASUJI YAMADA

山西大學、北京大學留學生。1992 至 2000 年任香港日語報紙記者，2001 年移居上海，任職於雜誌《美化生活》、《CHAI》。長期於日本《日經商務電子版》上連載中國觀察專欄。

## 劉格安——譯

政治大學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譯作類型包含商管、醫學、旅遊、生活、歷史和小說等。

聯絡信箱：[mercitapo@gmail.com](mailto:mercitapo@gmail.com)



# 3 不 億存 人在

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3億人の中国農民工食いつめものブルース

山田泰司

劉格安——譯

YASUJI YAMADA



從事廢棄物回收的鄭凱先生站在確定將拆除的上海自家門前。  
(2015年)





潤發夫妻。背景是他們居住的廢墟。（2015年，上海）



上海市中心的靜安寺一帶。PM2.5惡化時，大樓幾乎看不清楚。（右為2013年，左為2014年）





在浦東機場附近物流公司工作的小周房間。馬桶就在房裡，沒有隔間。（2015年）



吹著笛子的留守兒童日後成為音樂大學的學生。（上為二〇〇七年，下為二〇一六年，地點皆為安徽茂林）





在十年前的老地方再次重逢的留守兒童。（上為二〇〇六年，下為二〇一六年，地點皆為安徽茂林）





因家中因素從初中退學的男孩（上中，二〇〇六年，安徽茂林），後來在海南島工作。（下為二〇一六年、海南島）



選擇UNIQLO作為新娘服的長順與其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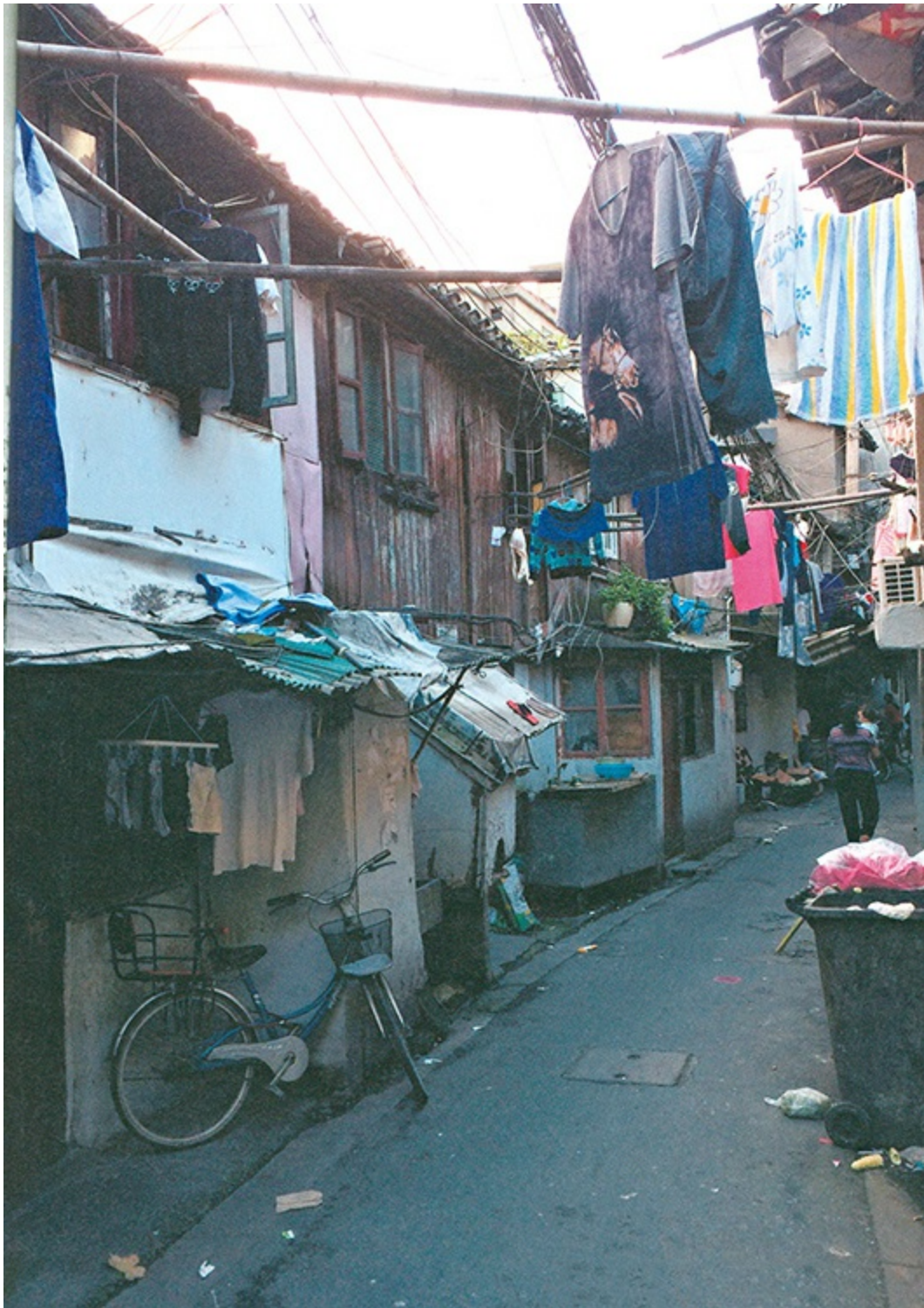


在上海從事廢棄物回收工作的鄭凱先生位於河南農村的住家。  
(2016年)





在日後的上海世博會場建地上拆除建築物的農民工。（2005年）



曾有大批農民工居住的上海貧民窟。在2016年拆除。（攝於2014年）

不存在的3億人 | 中國農民工的悲歌 | 目次





推薦序1 難以謀生的國度 / 林立青

推薦序2 都市要的是勞動力，不是人 / 洪敬舒

推薦序3 你是這社會中的少數，還是多數呢？ / 巫彥德

主要人物介紹

序章 難謀生者

日益擁擠的大都市

務農的年收入不足生活

四分之三的農民工沒上過初中

第一章 希望（奧運、世博）

一、留守兒童

沒錢就只能退學了

綁架犯，站住！

只有女人、小孩與老人的村莊

「又土又窮的農民小孩，哪有可能上學？」

戶籍分開的親子

連留守兒童都算不上的孩子

和春立的約定

電話打不通的理由

重逢

五人中有兩人中輟

「謝謝你記得我。」

二、女服務生的產地

一群不存在的人  
產壞人的安徽省  
無可奈何的豁達

### 三、受雞肉擺布的人生

大方捨去尾數的餐廳  
便宜好吃的店消失了！  
北京奧運與上海世博的衝擊  
過於懸殊的貧富差距  
只有超市跑不了  
曾經存在的良心  
希望尚存

### 四、優衣庫（UNIQLO）的新娘服

中國農民眼中的優衣庫  
十五歲出社會的新郎  
「優衣庫一定有！」  
大紅羽絨外套作嫁衣

### 五、當衝突化解分裂

上海與曾野綾子的勞動移民爭議  
「狗與中國人不得入內」的現今  
盡是上海人的公寓  
被中國人討厭的中國人  
「那個日本人根本不懂這裡的規矩。」  
排外的上海人改變了

## 第二章 爆買與PM2.5

### 一、重見藍天，民工離去

廢棄物價格暴跌的理由是空氣汙染？

消失的貧民窟與農民工的住處

有貧富差距，但沒有嫉妒

走投無路到連面子都不要的男人

### 二、鬼城

「爆買」背後增生的鬼城

亞洲金融風暴與雷曼兄弟事件

公寓大廈林立的鬼城

「沒人會買沒有資產價值的公寓。」

內需不振，推動亞投行與貨幣寬鬆

中國巴黎

缺乏活力的建設潮

經濟繁榮的倦怠感

### 三、單親媽媽的煩惱

身為單親媽媽卻不能有小孩的矛盾

住在野狗吠叫的廢墟中的母女

無法洗澡、蓬頭垢面的三歲小孩

不管幾歲都領最低薪資

單親媽媽的懲罰

不平等的罰款

違反一胎化的母女

訪日爆買與轉手出售



## 可憐的莉卡娃娃

### 第三章 異變

#### 一、遊民老闊

無家可歸的朋友

廢棄物回收業的困窘

出生地是癌症高發地區

失落世代的生存選擇

我喜歡廢棄物回收的工作

美容沙龍投資客

與生俱來的貧富差距

#### 二、家庭女傭目睹的異變

熱愛放鞭炮的中國人

隨處可見的「自首」、「舉報」標語

充斥習近平夫妻海報的農村

銳減的工作

「害怕工作被搶走」而無法返鄉的民工階層

強硬的政策是危機的表徵

#### 三、光天化日下的站壁女子

中國不存在暗巷

拆除圍牆的真正用意

大量出現在市中心的流鶯

共產國家的特種行業

非洲民工與中國流鶯

## 第四章 夢幻王國與夢的幻滅

### 一、任務完成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工作開始減少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市郊房租飆漲

集體消失的幼稚園生

驅逐地方出身者的上海

### 二、雖然蓋了高速鐵路

地溝油做的乳瑪琳

沒錢的人吃蠟燭

鄧小平的法國麵包

就業機會增加了嗎？

重獲生存價值的中高齡者

收入過低，年輕人不願回流

### 三、自用車與馬桶

馬桶外露的房間

農民間的貧富差距

與住家不搭調的汽車

和泡沫時期日本相同的危機

奢侈的車內比瀰漫殘敗感的家更令人嚮往

近在眼前卻遠在天邊的上海迪士尼樂園

### 四、同類相食的溝鼠

住在地底的百萬鼠族  
做生意看門道  
同類相食的掙扎與現實的選擇  
個人利益最大化  
逃跑的菁英

## 第五章 徬徨

### 一、聳然佇立的正宗哥吉拉

生氣的哥吉拉與不生氣的人類  
面對不公不義也雙手一攤說「沒辦法」的中國人  
被都市拋棄的農民  
離開窮途末路的上海，前往新天地  
無以為繼  
重返毫無展望的上海  
頌揚中國的失業者

### 二、流離失所

家不是用來住的  
失控的上海不動產泡沫  
已達薪資天花板的農村出身者  
失去立足之地的農民  
著眼於日本的中國農民

### 三、EXILE 與中國農民

EXILE = 「民工團」  
問題的轉移與歧視

## 佯裝成正經報導的官能小說

### 第六章 第一次看海

驅逐農民工

一夜致富

儘管告別了沒有窗戶的房間

「大家的運氣真好啊！」

廢墟，最後的落腳處

### 尾聲 農民工該何去何從？

西裝與鶴嘴鎬

巨大的貧富差距

雙親餓死的震撼

同樣的世代，不同的背景

除夕夜的日式炒飯

中國夢的極限

夢醒之後

### 後記



推薦序1

## 難以謀生的國度

林立青 作家

本書的作者，日本記者山田泰司，因為工作的原因在上海長時間居住，本書為《日經商務電子版》連載的「中國生活物語」專欄集結而成，再經過改寫的文章。由於作者近二十年都住在在中國，他筆下的農民工成為了日本人了解中國的一扇窗戶。

中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每一任國家領導人都有各自的口號，每年都有不同的建設和變化，唯一相同的是，這世界上所有人都感覺到中國日益強大，並且開始重視形象。習近平上臺以後，不管是亞投行、一帶一路、二〇二五中國製造等「大外宣」都強調中國夢，於此同時，中國的經濟軍事和國際政治影響力也逐漸膨脹。接收到這樣的訊息後，每個群體所看到的中國各不相同；在中國人眼裡，這是數十年改革開放後累積的國力，臺灣人則直接感受到的是商機，同時也有威脅和恐懼。

中國的面貌在這二十年來極度的快速轉變，不只是在對外的觀感上，對內的箝制也愈來愈加重，近幾年來，中國作家愈來愈少描述中國農民工及弱勢族裔的處境，深度的報導也愈來愈不受到鼓勵，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小溫馨文及暖文，在文字創作上，也愈來愈多所謂的仙俠奇幻，少了對於現實生活的揭露及批判。對於中國的深刻揭露，反而讓位給了外國作家，如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的《低端人口》（*Le peuple des rats: Dans les sous-sols interdits de la Chine*）（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八年），就用深刻的接觸來描述在日益進步的北京城之下，被拋棄的人們。

山田泰司來自日本，他在上海所描述的中國，是一個階級僵固的社會，他提出幾個特殊的觀點，在我看來非常值得分享給大家。

首先，作者在書中不只一次寫到了農民工在城市以及在不同地區的「認命」，而且對來中國的日本作者非常友善，但是寫到城市居民時，他點出了地區階級，其中最明確的便是上海人對於其他縣市人民的優越感。在書中作者用了不少細節，描述上海人對其他地區居民的明顯歧視及找碴的行為，對於安徽以及河南的群眾有近乎於種族歧視的對話，也對勞力工作者極為不尊重。

其次，他觀察到在二〇〇七年以後，移除舊建築物的都更明顯排除了原先住在此地的群眾，造成經濟差距的嚴重擴大，此時黑心食品也開始變多，而當人們發現就連自己都難以透過勤奮和努力翻身時，道德便開始低落。就連作者自己自二〇一四年開始，也租不起位於上海的房子了，因為房價在一年以內長了整整一倍，原先守著店面，願意去掉結帳零頭小數給予老客戶優惠的商販，也退出經營。

再來，出身日本的作者，觀察到在中國進行量化寬鬆，中國旅客到日本大量購買免治馬桶座的時候，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且不見遏止，連帶的影響是在關於中日兩國的討論之中出現的各種爆買狀況。

最後一點讓我最掛心的，是國家的體制傷害了弱勢族群的未來可能性。作者寫到一名未婚女性在生下孩子以後，發現自己因違反規定必須負擔高額罰金，只能住在被淨空的廢墟之中，而孩子完全得不到良好的照顧，相比之下，如果有認識的官員，則可以讓罰金降到只剩下不到三十分之一。

在讀完本書後，我一直記得作者提到，中國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

而且讓人們難以謀生的國度。小區拆除後大量出現的流鶯，還有年邁且認命的基層農民工故事，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的主力，卻從來不是中國故事的主角。這本書的出版，正是希望至少讓大家看到這一件事。

推薦序2

## 都市要的是勞動力，不是人

洪敬舒 臺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

閱讀山田泰司筆下眾生的深沉與無奈，並不是觀看他者的人生，雖然情節是上海近年底層社會經濟的陳述，但於我對貧窮研究與經驗的映對卻異常強烈。常常讀到某一段民工自述或山田的直白剖析，心裡也跟著共鳴：「啊，這在臺灣好像也是（有）。」

### 勞動遊牧

中國的人口每五人中就有一位農民工，這數據頗為驚人。換算臺灣兩千三百萬人，等於是四百六十萬名工作人口，也就是近全臺一千萬勞動人口的半數。放眼全世界，除了大規模的天災或戰亂，少有地區或國家能出現這麼龐大且規律的人口移動。

移動是全球化的附產品。資金流動帶來或帶走發展機會，讓人必須尾隨勞動市場移動，農民工、臺灣的北漂現象及藍白領的跨國移工都是如此。所以每位農民工動身出發之際，我想大半都與一九九〇年林強的〈向前走〉懷著同樣的夢。

阮欲來去臺北打拼，聽人講啥米好空的攏在那，  
頭前是現代的臺北車頭，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

農民工與臺灣的北漂族有著強烈的既視感。從農村到城鎮到都會區，臺灣也經歷了持續追逐更好的就業機會所形成的內部勞動遷徙；五



○年代工業化起跑的同時，農地繼承歷經數代分家切割，漸難以成家，臺北及高雄兩大會地區工商業的就業機會，成為巨大的拉力。至今許多落戶的臺北人，便是當時父親先離家打拼一陣子，等工作及住所安定就接走老小，等成就規模再大些，再拉著手足親友共同打拼，從移動家庭擴大為家族移動。山田說上海餐廳有許多來自安徽的服務生，臺灣許多行業也有同鄉幫。三重、中永和更是移居家庭的落腳城市，為一河之隔的臺北城提供都市建設或維持舒適生活不可或缺的工作。

等到八○年代高等教育機會增加，又成就了另一波遷移。國貿、企業及商科的新興學歷，成為中小城鎮難以供給的就業能力，於是北上就學接續就業成為隻身打拼的個人遷移，不同於前一代因貧而徙，這一波擁有經濟發展所需的技能、光鮮的上班族形象，直接催生了青年勞動力的〈向前走〉，就算多數人可能終其一生庸碌，仍奮不顧身組隊加入勞動遊牧。

## 雙失階級

從農的老一代食指浩繁、成年世代從工或服務業集中資源寄望下一個世代從學，是家庭在發展階段尋求翻身機會的固定路徑。所以不見得所有農民工都是下場淒涼，也有因緣際會遇到好工作或姻親而融入都市的幸運兒，但大半農民工長年做著被嫌棄的工作，領著微薄的薪水。

在城市拓張階段，體力勞動最是便捷的本錢，農民工投入建築或流水線生產，憑的不是技術而是不拒絕加班的毅力及體力。勞動的汗與淚成為澆灌產業與都市茁壯的養份，但被吸到乾癟的軀殼總是在某個時刻過後成為被割除的對象，因為他們已被當作髒亂落後的象徵，亮麗都城形象的破壞者。

就業的惡化還不足以逼退一心要向上爬的人。對底層社會的人而言，他們早就不過問想做什麼，只怕明天睜眼後卻沒得做。能夠逼退他們的手段只有剝奪居住機會，於是大規模拆遷出現了。如同書中一直流轉在各處廢墟的喬女士說的：

如果光是找到一個住的地方就耗盡心力，也不可能講究什麼工作意義。

說裁就裁、說拆就拆、說趕就趕，不容折扣與情理的聖旨，從產業與空間雙向貫徹著階級淨化的政治意志。

### 無史之人

中國的戶籍箝制產生「身為中國人卻非上海人」的身份差序，將農民工的公民權次級化，低端人口是他們在北京親友的另一個社會代稱。在臺灣也有一群都市遊者，在勞動市場的博奕中賭下青春及體力，無奈最後成為賽局的失敗者，從四面牆到只剩一張被從中焊上把手的公園長椅，明示著他們必須消失。

全球化形構了產業迭代更替，促成遷移的動力，臺北也成為小型的北上廣深。都市實現飛躍發展徹底改寫不同的資本工具，空間與產業的價差把原本相近相似的社會群體解裂成一夜致富與一文不值的兩極。處在社會與市場雙重邊緣位置的勞動者，被迫漂流於不同的職場與棲所，隨年華老逝終至失業與失所，成為不存在的無史之人。

經濟榮景與城市發展同是無情，因為兩者向來要的是勞動力，不是

人。



推薦序3

## 你是這社會中的少數，還是多數呢？

巫彥德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我工作的組織是臺灣一個名叫「人生百味」的組織，組織工作的目標就是與都市的貧困者一起合作消除貧窮，特別是街頭的貧困者。在這些工作中，我們有機會與國際的扶貧組織一起工作，並與其他國家的貧窮議題工作者交流，包含日本、韓國、香港。雖然各國的貧窮議題不盡相同，但大致上不脫離以下的情況：在都市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生活在都市底層的居民，大多數從事便利商店、速食店、餐廳、清潔、建築、臨時工等工作，且生活在都市中比較老舊與邊緣的社區。這樣子的貧困者，正緩慢且確實的在愈來愈「進步的城市」中失去立足之地，許多貧窮議題的工作者，稱這樣的情況為「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ve）。

中國大陸與東亞這幾個國家，雖然地緣與文化相近，貧窮者相臨的困境卻截然不同。我這幾年有一些珍貴的機會，與中國大陸從事貧窮議題的工作者交流。關於兩地貧困者的處境，雖然同樣都會碰到兩個問題：「忽略」與「汙名」，但這兩個問題也與社會制度是否能讓不同人發聲而有很大差異。「忽略」是因為社會排除很大程度來自於貧困者缺少發聲的機會與能力。例如本書中到海南島工作的春立，他對作者最大的感謝是：「謝謝你記得我。」貧困者很難在社會制度形成的過程中現身，經常被忽視與遺忘，因為似乎沒有必要性，也沒有重要性，因此幾乎任何的政府乃至社區的政策與制度的形成，都難以參考，也不會重視貧困者的意見。「汙名」則是因為生活在貧困狀態中的人，許多時候缺

少選擇，諸如正直、誠實、互信等種種美德，有時也是貧困者難以選擇的選擇，因此在臺北街頭的無家者，也一如書中描寫的在上海的安徽人，經常被貼上失序與髒亂的汙名。除了上述這兩個「忽略」與「汙名」，以「秩序與安全」為名的排除，更經常進一步將這些不存在的三億人推離整個社會，讓社會更加的失序與不安，而本書中觀察到的中國社會制度，更容易讓忽略與汙名顯得理所當然。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知道貧富差距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好像不缺一本書來告訴我貧富差距有多大。但這本書之所以值得推薦，是因為作者以不帶偏見的眼光，記錄著他與許多經驗貧窮的主人翁互動，而從這些互動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問題只是貧窮的一個面向，生活在貧窮中的人，他們有的不只有貧窮。例如即便身處貧困，書中主角們仍然重視著人與人的關係，對於遠道而來的作者，也務必要請他吃一頓平常連自己都捨不得吃的大餐。這本書提醒我們，在許多主流媒體追捧著成功、富裕、發展等等「進步」的同時，那些經常被人忽視的餐廳服務員、外送員，也努力地活著，努力記得自己從哪裡來，努力在都市的生活中維持人的樣子，而認識與相信彼此同樣身而為人的本質，只是在不同的生命經驗上有差異，這是改變社會排除最重要且最難的一步。

我想系統性社會包容是否發生，在於整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聽見與聽懂更多截然不同的聲音，特別是那些來自社會邊緣的，甚至是來至邊緣之外深淵的聲音。這樣的聲音被聽見的初期常讓人不安、不屑，而當人的素養足夠穿透自身不安與不屑的情緒，多聽見一個過去沒被聽見的聲音，那麼會被社會推向邊緣的人就又少了一群。透過作者的筆，開啟了一扇傾聽更多聲音的門，讓我們聽見生活上海底層生活者的聲音。

「進步」，是一個人過得特別好？還是大家一起過得不錯呢？近代中國的大國崛起之勢似乎勢不可擋。在我自己家族聚會的餐桌上，上一代每每談及中國，都是羨慕中國的崛起與富強，多多少少有那麼一絲惋惜沒有跟上這個崛起之勢的意思。然而，大家欽羨的是競爭論下的成功，當每個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時，便會帶來社會最大的發展。贏家全拿，而每個人都想當那個贏家，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發展得愈快就捨棄愈多的人。

當我們看到北京切除事件，明白了現代大多數的「進步」是屬於少數者的效率，是以多數無權無勢者的不便利換取少數有權有勢者的便利。那麼，那會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嗎？

你與我，是這社會中的少數？還是多數呢？



# 主要人物介紹

喬女士 安徽省農家出身，出生於一九八〇年。么女，上有兩個哥哥。單親媽媽。

潤發先生 安徽省農家的次男，出生於一九六四年。體力勞動者。

潤發太太 安徽省農家出身，育有二子。擅長料理的家庭女傭。

長順 安徽省棉花農家的長男，出生於一九九一年。育有一女。

鄭凱先生 河南省農家的三男，出生於一九七四年。從事廢棄物回收業。

春立 安徽省農村的留守兒童，因家庭因素主動中輟，赴海南島工作。

磊磊 在安徽省農村吹笛的留守兒童，後來在絲路吹笛。

陳喜 安徽省農村的留守兒童，主修建築的大學生。

吳皋 安徽省農村的留守兒童，克服中輟障礙，在上海成為技術員。

吳龐 安徽省農村的留守兒童，以運動與玩樂謳歌生活的大學生。

## 序章 難謀生者

這本書要寫的，是一群與爆買或反日無緣的中國人的故事。身為日本人的我，與生在中國內陸農村地區的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期，也就是二十一世紀初來到上海，並在我來到這塊土地上工作與生活將近二十年的期間內，因為一些機緣巧合而相識。

在藉由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和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等活動推動國家建設的中國，他們是一群靠著身體，將國家描繪的偉大藍圖，體現在上海或中國其他城鎮的功臣。在中國被稱為「民工」或「農民工」的這群人，如果不是他們忍著肌肉撕裂般的痛楚揮下鶴嘴鎬，挺著嘎嘎作響的背部或腰骨不停搬運鋼筋，如今可能就沒有狀似鳥巢、造型充滿個性的奧運體育場，或上海那一幢幢充滿近未來感的摩天大樓；如果不是有她們擔任家庭女傭，接下煮飯洗衣、接送孩童、照護年邁雙親等各種家事，上海的男男女女肯定無法在好不容易建設好的摩天大樓中，全心投入辦公室作業。

另一方面，中國在戰後依然屢屢發生像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等動搖國家的亂事，直到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國家才開始安定下來，其中一群成長於特別落後的農村、到大約二十年前都還沒有機會接受充分教育的無學歷農村出身者，儘管表面上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受到「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這樣的推崇，實際上卻陷入無法賺取現金收入的「難謀生者」窘境。對那些難以謀生的農民來說，大都市確實起到了提供「賺取現金」門路的作用，而這是農村或地方城市都難以做到的。

其中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約一百年間，曾為英國、法國、美國租界和日本人居住區的上海，正如一九二六到二九年間、共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的詩人金子光晴，將租界時代的這塊土地評為：「儘管皆為難謀生者投奔之地，二者卻有些許差異，滿洲是攜家帶眷去種松杉之處，上海則是獨自從人前消失，耗個一、兩年去澆熄熱情之處。」（金子光晴著，《骷髏杯》（暫譯），二〇〇四年，中公文庫）一樣，這裡向來都在接收那些在其他土地上一敗塗地或難以翻身，以至於走投無路的人。

雖然說是接收，但從來就沒有人熱情招待他們，更沒有上海人舉雙手歡迎他們加入。在居住方面，有些低所得者的住所不僅沒有廁所隔間，甚至連沖水馬桶也沒有，只有一個他們稱為「馬桶」的便盆突兀地放在那裡，環境往往十分惡劣。

即使如此，無論是沒有學歷的農民或失業中的外國人、無論勤奮或懶惰、無論有錢或貧窮，就接收背景成謎、來歷不明的人這一點來說，上海算是整個中國獨一無二的特例。這個來者不拒的寬闊胸懷，孕育出中國第一商業都市上海的活力，形塑出這座過去被形容為「魔都上海」、與中國其他都市有明顯區別的城市獨特魅力。

作為政治中樞的北京沒有上海這般自由，而且如果在規模不大不小的都市出現不說地方話的外人，立刻會引人注意，被由中國共產黨安插在居民之間，一個名為「居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網給網羅通報，肯定無法自在地生活。倘若不是上海的話，我這個不屬於任何組織的外國人，恐怕沒有機會邂逅來自中國農村的勞動者吧。

我是因為在生活了八年的香港無法繼續謀生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雖然已找到落腳的職場，但維持不到半年就失業，至本書出版（二〇一七）為止的十七年間，大部分都是以沒有歸屬的自由業者身分維生，但



每次都順利得到簽證，可以長居在這座城市。

在這十七年間，居民委員會的相關人員只造訪過我家一次。三年前，在我搬到現居處的隔天晚上，三名中年女性來訪。由於那是我第一次與居民委員會的人接觸，因此稍有防備，但她們問道：「有多少人住在這裡？你有固定工作嗎？」我回答說我自己一個人住，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寫東西，她們便你一言我一語地嚷嚷了起來：「真虧你有辦法寫文章」、「我就寫不出什麼東西來」，隨後又莫名其妙地瀟灑離開了。

## 日益擁擠的大都市

過去這二十多年來，儘管經濟方面稱不上充裕，許多農民工還是得在上海找到安身立命之處，然而他們最近這一、兩年卻面臨不少艱辛與波折。

有的人工作減少，有的人每轉職一次薪水就縮水一次，有的人在失控的房地產泡沫下因付不出房租而流離失所，有的人則一次面臨以上所有衝擊而走投無路。他們在瀕臨極限的狀態下，沒有一天不想著離開上海，其中也有人真的離開了。不過不久之後，所有人又都鬱鬱寡歡地重返此地，因為無論是到其他都市或返回鄉下，他們所處的環境絲毫不見好轉。

農民工的這種行動，究竟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若從結論說起，這代表包含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都市，都已經沒有餘力接收「難謀生者」了。尤其是沒有學歷也沒有技術的人，無以謀生的現象益趨顯著。無論是在大都市、地方都市或農民工的故鄉，他們甚至連不求「滿足」但求還能「接受」的東西都已經開始無法獲得了。

這些農民工如何才「能接受」這一切呢？關鍵就是，他們能否至少在還無法確信「下一個會輪到我」之前，還能擁有做這個夢的機會。這些農民工住在如同廢墟的破屋中，視而不見高級公寓的都市人，做著都市人不想做的基層勞動或雜活，一直支撐著他們的就唯有這個「明天就會輪到我」的希望而已，但那個希望如今正迅速破滅。

他們這樣的情狀在中國，尤其在都市地區，已被認知為社會問題了嗎？不，事實正好相反。

二〇一七年初夏，我向一位在上海數一數二大報社擔任記者、目前

獨立出來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上海朋友提到，最近上海愈來愈艱困了呢，沒有工作的人也變多了。他卻說：「啥？艱困是什麼意思？你說誰很艱困啊？」

他一臉不可置信地反問，似乎聽到了什麼真的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於是我告訴他最近發生在上海農民工身上的狀況，他只說了一句：「喔，或許真是那樣吧。」

然後就沒有其他反應了，彷彿這事是發生在其他國家一樣。

一想到他是前報社記者，我對他的反應就不勝唏噓。但即使如此，他在上海出身的中國人之中，並不是特別遲鈍的人。因為不光是過去幾乎形同免費從國家取得的房地產，在這兩、三年的失控泡沫下，價格如天文數字般飛漲，而且在上海生活，還會時常聽到附近鄰居成為億萬富翁的傳聞，所以看在上海人應該無法想像那些家庭女傭、工地的體力勞動者，或最近興起的宅急便、外送員等每天出現在眼前的農民工，明明跟自己一樣居住在上海這塊土地，卻遭遇生活狀況比幾年前惡化等情形。農民工的身影肯定投射在上海人的視網膜上，但實質上卻形同視而不見，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

明明存在卻看不見的這個現象，跟日本傳聞中的中國人形象正好相合。近年來，中國人給日本人留下最強烈的印象，應該就是他們在日本觀光時的爆買行為了。然而，我在本書中提及的我的農民工朋友，沒有一人去過日本爆買。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那個時間與金錢」。

據說最近爆買的趨勢暫緩，訪日中國人的消費從「財貨」轉移成「服務」。不過看我那群朋友最近的樣子，他們不僅無力消費「服

務」，甚至連爆買的邊都沾不上。換句話說，在日本人認知中的「中國人」印象中，農民工從未存在過。



## 務農的年收入不足生活

身為「難謀生者」的農民工，究竟在鄉下要無以為繼到什麼程度，才會來到都市呢？

我在二〇一七年夏天，向來自河南省農村的朋友鄭凱先生提問。他在上海從事廢棄物回收，說得更貼近現實一點，就是靠「撿垃圾」維生。

鄭凱先生說：「很簡單啊，因為我在鄉下的話，除了吃東西之外，什麼事也做不了。」

鄭凱先生是在一九九八年時來到上海，他說因為在老家的農村賺不到現金維持生計，只好來上海討生活。

轉眼就過了二十年。我問他，如果一直待在農村的話，現在還是沒辦法維持生計嗎？他說：

「待在鄉下的話，可以吃自己田裡種出來的食物，一天三餐是沒問題的，但真的就只有那樣了。不過這樣講你也沒辦法想像吧？我家有三畝（約二千平方公尺）田，半年種小麥，半年種玉米，賣掉這些的話，幾年前一年還可以有五千元（相當於新臺幣二萬二千元，以臺灣銀行二〇一八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四．四元換算，以下皆同）的現金收入，可是今年只有二千元（新臺幣八千八百元）而已。不僅如此，我父母那一代領的年金是一個月六十元（新臺幣二百六十四元），上海則是三千元（新臺幣一萬三千二百元）。上海人每月的年金比我的年收入還高耶，況且我們還得養孩子呢，就算我有五千元好了，那也是年收入而不是月收入喔？連一件衣服、一雙鞋子都買不起吧？」

即使薪水減少，即使付不起房租，還是必須到都會賺錢，這就是農

民工的現狀。

## 四分之三的農民工沒上過初中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於二〇一七年四月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中國農民工的人數截至二〇一六年底，是二億八千一百七十一萬人。中國的人口約五人當中就有一人是農民工。

此外，在學歷方面，「未上過學」的占全體的一%，「小學」占十三．二%，「初中」占五十九．四%，實際上農民工的七十五%，也就是四人中有三人都是初中以下學歷。另外，在年齡層的組成上，「十六到二十歲」占三．三%，「二十一到三十歲」占二十八．六%，「三十一到四十歲」占二十二%，「四十一到五十歲」占二十七%，「五十一歲以上」占十九．二%。平均月收入是三千二百七十五元（新臺幣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元）。這是用數字描繪出來的農民工樣貌。

那麼只要前往大都市，農民工就得以溫飽了嗎？如果不到大都市賺錢的話，他們或他們的家人又會陷入何種境遇呢？且從我在最多農民工來上海賺錢的安徽省某村莊遇到的農民工孩子，與他們今日的遭遇來開始訴說農民工的故事吧。

## 第一章 | 希望（奧運、世博）

上海世博前一年，在建築工地工作的農民工。（2009年）





## 一、留守兒童

春立在勉強撐過一段過於煩惱，每晚盯著天花板盯到天亮的失眠日子後，決定退學了。當時他年僅十四，才剛升上初中二年級。

老家所在的山中村落沒有初中，春立只好前往其他有學校的村落，住在宿舍裡，但他認為父母已經無法再支付自己的餐費與住宿費了。我在二〇一六年與他重逢時詢問，那是多少錢呢？已經二十二歲的春立回答說：「每週六十元（新臺幣二百六十四元）。」

這不是造成二千萬人餓死於大饑荒中的大躍進（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或癱瘓國家機能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時代，而是二〇〇八年，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真實事件。

## 沒錢就只能退學了

我在二〇〇六年認識春立，當時他十二歲，讀小學六年級。我為了安徽省一處保留著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興建的美麗古厝與石板路，卻從未被納入觀光地的古村茂林而去，他就在那裡生活。

當我一邊在村落裡走走看看，一邊將風景收入相機時，有三個孩子直挺挺地站在田埂邊一塊幾乎有轎車那麼大的岩石上，漫不經心地眺望著遠方。他們分別是當年十歲的陳喜、十一歲的吳皋與吳龐。

我順著他們的視線望出去，只見到稻田與天空。雖然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優美而且難得一見的中國田園風景，但對這些住在這裡的孩子來說，應該司空見慣才對。「你們在看什麼啊？」我問出口，其中一人說：「沒什麼。」口氣就像個開悟的和尚一樣。

這三個孩子一開口，就令我折服於他們的魅力之下，於是我拜託他們能否讓我拍張照。我想大概是很少有人想在這一帶拍照吧，所以話才出口，這些孩子臉上瞬間寫滿好奇心，三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說：「叔叔，你為什麼在拍照啊？」、「你從哪來的呀？」、「什麼？你是日本人啊！我還是頭一次見到呢！」

到了這個村子應該要去哪裡看看才好？我徵詢他們的意見，他們卻說：「明天是星期天，我們帶你去逛逛吧。明天早上七點再來這塊岩石這邊會合。」只是當時中國才爆發一起案件，有人將誘拐來或用日幣不到五萬圓（相當於新臺幣一萬三千五百元，以臺灣銀行二〇一八年底日圓匯率一：〇.二七元換算，以下皆同）買來的兒童，轉賣到山西省的黑磚窯做苦工。所以我對他們說，你們的一番好意讓我很高興，但你們的家人可能會擔心，所以我必須先去打聲招呼取得同意才行。「不用

啦，反正我們每個星期天早上七點就在一起玩了，我們會跟家裡人說要帶日本人去逛逛。」在孩子們的盛情之下，我判斷，應該在送他們回家的時候順便打聲招呼就沒問題了吧。

當時的我自然無從知曉，這個天真的判斷，最後雖會招致一項嚴重的事態，但也為我帶來與他們長達十年的交情。

綁架犯，站住！

第二天，我依約在早上七點來到集合地點，發現人數雖然同為三人，但其中一人卻從未見過。原來，吳龐因為家裡有事不能來，代替他來的是前文介紹過的春立。

那天，我們一塊爬山、跳進河裡，歡樂嬉戲了一天，後來雖然時間尚早，我們還是在下午三點左右踏上歸途，路上經過一戶農家門口時，那戶人家的人一面用銳利的眼神盯著我看，一面開口喊道：「吳皋，你奶奶剛才來我們家，她拚命地在找你，還說：『有沒有看到一個日本男人帶走我的孫子？』」

我因為怕孩子們整天在外父母會擔心，午餐時讓他們暫時回去，因此從下午出門到現在，應該還不到兩小時才是。我不明白吳皋的祖母為什麼在找他，一問之下，三人才告訴我說：「我們去沒來的朋友家吃午飯了，所以沒回家。」

唉呀，這下大事不妙！我嚇得一臉蒼白，不過也於事無補了。

不一會兒，在將近收割時節、開始染上金黃色的水田間小路上，我望見一名老嫗拿著像是樹枝的棍子，氣沖沖地朝這裡殺來。簡直就像電視動畫裡腳步快得像車輪在轉，嘴裡一邊叫著「站住！」一邊揮舞棍棒追打沒用丈夫的老婆一樣。

「啊，是我奶奶……」吳皋一臉要哭要哭地奔向老嫗。只見她一邊罵著：「你這個壞孩子！午飯也不回來吃，不知道跑去哪裡鬼混，都到快吃晚飯的時間了！」一邊用樹枝用力打吳皋的背和屁股。

「唉呀，奶奶，請不要打他。不是這孩子的錯，都是我不好。」我伸手想拉住老嫗的手臂，卻被喝斥一聲：「欸，別碰我！」嚇得我連忙



退開。

如何才能收拾這個激烈的場面呢？我滿心絕望地踏著搖搖晃晃的步伐，追在老嫗和孩子的後頭，結果一整群嚴陣以待的地方居民突然衝上來將我團團圍住。

「你帶著孩子在外面晃到晚餐時間，究竟有何意圖！」

「你今年幾歲了！」

我四十一歲……。

「都四十幾歲的人了，還做這種事！」

## 只有女人、小孩與老人的村莊

後來或許是罵到一個段落，稍微冷靜下來了吧，其中一名中年女性平心靜氣地說道：

「吳皋他爸媽啊，兩人都去北京掙錢了，要是這個寶貝的獨生子發生什麼萬一，替他們帶孩子的奶奶可得以死謝罪啦。」

我聽完，看了看這群包圍著我的人，發現雖然這十多名大人年齡分布廣泛，從看似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到老人都有，但所有人都是女性。明明是星期天的傍晚，難道所有男人都在工作嗎？

「唉，算了算了，你也累了吧？要不要喝點熱水？」這麼一說我才注意到，自己的喉嚨渴得不得了。不過老實說，我連喝口熱水的時間都覺得難熬，巴不得盡快逃離現場。「不，不用了，我真的很抱歉。」我輪流抱了抱那些垂頭喪氣的孩子的頭，「今天真的很謝謝你們，還有對不起，我會再來找你們的。」說完便轉身離去。

「又土又窮的農民小孩，哪有可能上學？」

雖說是自作自受，但或許一般來說，任何人遭遇這種事態，都不會想再來這座村莊了吧。可是我卻心想，我一定得再來一次才行，因為我和春立做了一個約定。

那天下午，我們玩累了在森林中休息時，春立問我：「叔叔，你下次什麼時候再來這個村子？」雖然我還想再來這裡見見他們，但我居住的上海離這座村莊約有五百公里遠，當時高速鐵路尚未通車，唯一的交通方式只有搭乘長途巴士，而且因為沒有直達車，所以來這裡一趟要花上一天的時間，實在不是說來就能來的距離。

不想隨便答應孩子事情的我，回答他：「這個嘛.....在你高中畢業之前，我一定會再來的。」我想，六年的時間，至少夠我再來一次了吧。

沒想到春立聽了，一臉為難地說：「叔叔，我應該不會上高中耶，所以你能不能再快一點來呢？」

「你不想上高中嗎？」

「我想啊.....可是農民非常窮又非常土，他們的孩子哪有可能去上高中或大學啊？每個人都這樣講喔。」

這番話大大衝擊了我的內心。

這孩子周圍的人應該都是農民才對，他大概是聽到了這個村子裡，那些去都市賺錢卻遭人輕侮的大人說來自嘲的話吧。

「才沒那回事，如果沒有農民生產食物的話，叔叔和你們哪有東西可以吃呢？農民可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喔。」

在旁認真聽我們談話的吳皋輕輕點了點頭。我看一眼春立，他雖然

也點頭了，臉上卻露出一種說不清的困惑表情，似是在說他並未完全接受這個說法。

我再次強調說：「如果你真的想上高中的話，一定可以去的。」

這一回，春立終於微微頷首，只是臉上表情依舊僵硬。



## 戶籍分開的親子

在這座村莊裡，有許多上小學、初中的孩子，父母其中一人或是兩人都到上海或北京等大都會去賺錢了，這樣的孩子在中國稱作「留守兒童」。父母當中若有其中一人出外賺錢，大多都是父親，因此留守兒童居住的村莊幾乎只剩小孩與女人。

我認識春立他們不久後的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公布一項調查結果，說男性或雙親共同前往都會賺錢而在家留守的婦女與小孩人數，全中國總計多達八千七百萬人，其中小孩有二千萬人，妻子為四千七百萬，老人為二千萬人。其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在二〇一三年五月發布統計，在二〇一〇年實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統計中，留守兒童共有六千一百〇二萬人，比五年前的前次調查增加二百四十二萬人。由此可見，隨著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與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的代表性大都市推動基礎建設，人手需求在邁向二〇一〇之際大幅成長，出外賺錢的人數急遽增加。

然而在中國民政部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公布的數字中，留守兒童的人數減少為九百〇二萬人，其中雖存在著將留守兒童的定義，從以往未滿十八歲變更為未滿十六歲的「機巧」，但即使從農村的就學實情來看，這也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減少幅度。

中國的戶籍分成都市地區出生與農村地區出生兩種，而被稱作「高考」的大學入學統一測驗，必須在原籍地的高中接受測驗，所以持有農村地區戶籍的孩子要上大學的話，即使平常與在都市地區工作的家長同住、就讀都市地區的學校，也必須返回原籍所在的老家。

那他們是不是配合高中升學返回鄉下即可呢？可那樣又太遲了，因

為目前依然保留著一種難以理解的制度，假如他們在都市地區讀到小學六年級畢業，再返回原籍所在的老家，也不能夠直接升上初中一年級，必須要再讀一年小學六年級。當然，父母為了避免這樣的耗時耗力，幾乎都會選擇把孩子從小就留在鄉下，即使親子一起居住在家長工作的都會，家長也會配合孩子上小學的階段，萬般不捨地將他們送回鄉下。

## 連留守兒童都算不上的孩子

那天和我在一起的三個孩子，家裡全是務農的，當中唯一與父母同住的只有十歲的陳喜而已。陳喜的父親同樣因為光靠農業收入無法供孩子上學，所以每天從村裡搭公車到一小時車程外的城鎮工作。

在日本，尤其在首都圈，來回兩小時左右的通勤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中國農村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由於返回村莊的末班公車是傍晚五點發車，因此正常時間下班的話肯定趕不上。無可奈何之下，陳喜的父親只好過著在城裡租屋，星期一到五在那裡過夜，星期六一早回家與家人相聚，星期日傍晚再返回城裡的生活。雖然從物理上的距離來說，父親並沒有住得特別遠，但陳喜依然算是留守兒童。

再來看看十一歲的吳皋與十二歲的春立，他們的家都在山區，附近沒有小學也沒有初中，因此吳皋與妹妹和祖母、春立則是與祖母，同樣租屋住在離家約十公里遠的這個村子，從租屋處去小學上課。吳皋說他的老家是從事茶葉栽培與養蠶的農家，但由於現金收入太少，雙親都去北京工作，有時甚至連春節（農曆年）都不能回來。

至於春立的老家，同樣是在距離這座村莊約十公里遠的山區從事茶葉栽培，但父母都體弱多病，只能一直待在家裡，無法出外賺錢。換句話說，吳皋與陳喜是留守兒童，但春立連留守兒童都算不上，生活條件卻比留守兒童還嚴苛。

## 和春立的約定

半年後的二〇〇七年三月，我再度造訪這座村莊。

正當我一面追溯回憶一面閒逛時，有一名看似小學生的男孩正在某條眼熟的田間小路上吹著橫笛。無論是在大岩石上佇立不動的吳皋三人，還是這個男孩，茂林的孩子都很有仙人風骨。

我給吹笛男孩看孩子們上次寫給我的地址和地圖，問他知不知道他們住哪，結果他說：

「喔喔，叔叔，你就是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山田泰司吧？吳皋他們家在這裡，跟我來。」

說完便逕自在我前方邁開步伐，著實令我嚇了一跳。看來我在這座村子已經出名了，人人都知道這個帶孩子到處亂逛、住在上海的日本人。

有個男孩坐在家門前一張像浴凳的小椅子上翻閱教科書，他就是那個說「我或許不會上高中，所以叔叔快一點來找我」的春立。雖然才過半年，他的體型明顯變大，稍微有點大人樣了。

聽見帶路男孩的聲音，春立從教科書上抬起頭來，認出我的模樣，並一臉呆滯地仰望著我的臉，彷彿在說「咦？騙人的吧？」。「春立，你記得叔叔嗎？我按照約定來看你啦。」我出聲說道，但他還是一臉半信半疑。

「你看，我帶來去年給你們拍的合照囉。」我一拿出放大到單行本大小、裝在相框裡的春立和吳皋等人的合照，他就大叫道：「哇，這不是我嗎！」其他孩子和他們的母親或祖母一聽到這聲音，也立刻「哇」地發出歡呼聲，簇擁上來。當中也有之前用樹枝狠狠毆打孫子的吳皋奶

奶。

我再次向他們的家長低頭致歉：「去年真的很抱歉。」所有大人就像串通好似地，全都笑瞇瞇地說：「啊哈哈！沒事啦。」

今天在場的果然也都是女性。

其中一人說：「去年那天孩子們也有跟我們說，你是從上海來玩的日本人，他們要帶你在村子裡逛逛啦，不過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嘛，所以早上雖然還是送孩子出門了，但我們也是很緊張的呀。不過現在都是朋友了，對吧？」眾人紛紛邀約道：「來我家吃頓飯再走吧。」剛好碰到晚餐時間，每戶人家都在給灶添柴，或在家門口擺出蜂窩煤爐，放上鍋子。在去年那場騷動時，我還只是被招待「喝點熱水」而已，看來今年的待遇提升了許多。

那個時候，平日在鎮上工作的陳喜父親剛好趁週末回家。他是我在這座村子裡見到的第一位壯年男性。當晚，我在陳喜府上蹭了一頓飯。



## 電話打不通的理由

履行重訪的諾言後，我放下心中的記掛，其後便與那個村的孩子們失去聯絡。若換作今日，透過智慧型手機的SNS（社群網路）即可輕易保持聯繫，但當時智慧型手機才剛要問世，人與人之間是很容易中斷音信的。我過後時常想起春立，好奇他究竟有沒有順利升上高中，還是真如年幼的他所講，沒能繼續升學。

假如繼續升學的話，應該已是上大學的年紀了吧？二〇一五年，我一時想起了他，便抽出陳舊的記事本，找到除了地址與姓名之外，他們唯一告訴過我的陳喜父親的手機號碼，傳了簡短的訊息過去，但毫無回應。我想對方說不定是忘了我的名字，所以納悶著不曉得該不該回覆，便試著撥電話過去。結果話筒中傳來「您所撥打的號碼是空號」的回應。難道他換電話號碼了嗎？無論如何，遠距離的聯絡管道就此中斷了。

儘管惦記著春立的事，我卻遲未前往那些男孩的村落，其中一大因素就是交通不便，從上海搭巴士過去得花上一整天的時間。之後我得知距離村子最近的城市，也就是陳喜父親出外工作的地方，在二〇一五年六月啟用高速鐵路車站。原本離上海一日的車程，如今只需要半天就夠了。

既然如此，自然非親自走一趟不可。

於是二〇一五年十月，我第三次走訪男孩們所在的村落。

我憑著印象來到招待我吃晚飯的陳喜家，但大門深鎖，呼喚也毫無回應。我向鄰戶表明來意後，他們才告訴我陳喜父親電話不通的理由。

陳喜的父親在幾年前過世了。隔壁老人家說：「他酒喝太多了。」

還說陳喜目前就讀位於安徽省省會（省政府所在地）合肥的一所建築大學，陳喜母親在丈夫死後便不再留在婆家。

## 重逢

我打起精神，拿出九年前拍的其他男孩與家長的照片，問他知不知道這些人住哪。接連回答「不知道」的老人家，終於指著吹笛男孩說，這孩子就住在我家後面。我立刻移步走訪，但大門深鎖，似乎也沒人在家。大約每隔三十分鐘，我就再去敲門一次，但跑了三趟依舊無人應門。

開往城裡的末班公車即將發車，與男孩們的重逢之路就這樣關閉了。我失望地走向公車站，途中興起一個念頭，想繞去最初與他們相遇的巨岩附近看看，便一邊注意時間，一邊快步移動。

然而，岩石已經不在了，連回憶中的場所都變了。不過這樣至少可以徹底死心地踏上歸途。我一邊想著，一邊邁向公車站。

這時，背後傳來一個聲音：

「你是照相的日本人吧？」

是一名中年男性。看他氣喘吁吁的樣子，大概是一路跑著過來的。他是八年前對我說出「你是山田泰司吧？跟我來。」的吹笛男孩磊磊的父親。他說他回家後聽到鄰居轉告，直覺我肯定是以前那個來給孩子拍照的日本人，便趕緊衝出來找我。

我們回到他家閒話家常。吹笛男孩磊磊後來成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一所藝術大學的學生，在那裡學習吹笛。「為了讓兒子去考藝術大學，我們答應他的請求，送他去上了幾十次的吹笛課，一次還要三百元（新臺幣一千三百二十元）。我這幾年留在村裡做電動三輪車的送貨工作，老婆去上海當家庭女傭，賺兒子上課的費用。但那樣還是不夠，我們還跟親戚借了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幸好最後他

有考上。」磊磊的父親笑道。

我向磊磊父親詢問磊磊的手機號碼，並傳了訊息過去。磊磊立刻回電給我：「你是山田泰司？騙人的吧？」

磊磊用中國最流行的「微信」（WeChat），替我創了一個群組叫「山田君的朋友茂林」，讓我得知五個男孩的消息。

父母生意順利、五人中唯一與雙親同住在這座村子裡的吳龐，後來考上合肥的大學，他不但考到汽車駕照，還熱中於打籃球，過著相當愉快的大學生活。

## 五人中有兩人中輟

與祖母和妹妹住在這座村莊上小學的吳皋，和春立一樣讀了兩年初中就退學了，不過理由並不相同。春立是因為無法支付學費，吳皋則是：「父母都出外賺錢，所以我想學費的部分沒有問題，只是我真的聽不懂上課內容，痛苦得不得了，實在沒辦法念下去。」雖然他自己下定決心，接下來就要工作一輩子，但因為父母苦心相勸，他才決定去上製造業的專科學校。他在那裡體會到用車床或模具精確地製造東西的樂趣，「用電腦學的模具設計基礎也很有意思。我去了專科學校才知道，原來學習也有好玩的時候」。

究竟是在什麼樣的制度下，才有可能發生這種事呢？我聽了好多遍還是無法理解，但吳皋說他選這所專科學校的理由之一，是修畢的話會同時授與初中畢業的資格。順利取得初中畢業資格的吳皋，十六歲那年經由專科學校的介紹，到位於上海的汽車零件製造工廠就職。重逢時他已經二十歲了，有四年的社會歷練，也有了後輩。他的工作表現深受肯定，月薪從那一年起調漲到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在中國的製造業中，若不是有相當技術水準的人才，拿不到這樣的金額。

讓我興起念頭想要與那座村子的孩子們取得聯繫的春立，則是在中國最南端的島嶼海南島。他讀了兩年初中退學後，便到遠親在海南島海口經營的中國繪畫與書畫畫廊工作。主要在畫廊附設的作業場中，與十名同僚共同負責裝裱。

春立說：「在辦公室或飯店的裝飾需求下，工作源源不絕地進來。我們都從早上八點一直工作到晚上九點。」

「謝謝你記得我。」

就職那年，春立十六歲。他說他獨自搭巴士、火車、渡輪一路來到海南島，抵達上班地點時，已經是從老家出發的第三天了。時隔八年在磊磊牽線的群組中重逢那天，春立說：

「我從初中退學，一個人來海南島工作已經五年了，中間也有寂寞的時候，奇妙的是，每到那種時候我就會想起叔叔第二次來找我那時我的心情，你說：『因為我們約定好了。』而我今天的心情也跟那天一樣。」

那是什麼樣的心情呢？我問。

他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說耶，但是、但是.....謝謝你記得我。」

在留守兒童的問題中，存在著都市與鄉村的不公平與貧富差距、出外賺錢不回家的父母放棄育兒等中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然後被留在鄉下生活的眾多留守兒童，在缺乏大人的庇護下，也更容易發生被捲入性犯罪，或因為生活困苦或太過孤獨而自殺等令人痛心的事件，而大多數時候，媒體唯有在這類聳動事件發生時，才會報導留守兒童的問題。

不過春立、吳皋、陳喜、磊磊和他們的父母讓我知道，有一群父母壓抑著與子女分離的痛苦努力拚搏，從微薄的收入中擠出學費供應孩子上學，還有一群留守兒童望著這些父母，選擇自己的人生並堅強地活著。而對我說「謝謝你記得我」的春立讓我意識到，原來有某一個人關心著自己，有時會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換句話說，即使只是把留守兒童放在心上，都有可能成為一種力量。另一方面，我也認為不能僅將留守兒童的問題視為案件或醜聞，消費完就撒手不管了。

二〇一六年二月，我第四度造訪男孩們的村子，與回鄉過春節的陳



喜、磊磊和吳龐三人重逢。開春時，在上海工作的吳皋則來到同在上海的我家附近見我一面。剩下未見到的就是春立了。

同一年六月，我飛到海南島。來機場接我的春立再一次對我說：「叔叔，謝謝你記得我。」

春立有個從兩年前開始同居的伴侶，名叫海蘭，是一名比他年長三歲的海南島女性。春立說他打算在那年秋天帶海蘭回家，與她訂親。我邀請他說，回鄉下時順道來上海一趟吧，秋天的時候迪士尼樂園也開幕了，雖然春立聽了以後說：「迪士尼樂園嗎？不錯耶。」但又立刻說：「可是我不能花不必要的錢，我得存給她們家的聘金才行。」我問那是多少錢？「一般來說是六萬六千元（新臺幣二十九萬〇四百元）。」春立說。在旁邊聽著的女友海蘭，一臉欣喜地注視著春立的側臉說：「不夠也沒關係，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意。」

春立雖然嘴上說必須節省開銷，卻負擔了我停留期間的所有住宿費、餐費與茶資。我一再跟他說，你不是必須存結婚基金嗎？有這番心意我就滿足了，但他說什麼也不接受，直說：「叔叔特地來海南島找我，我絕對不能讓你掏錢。」一旁的海蘭笑著幫腔：「沒錯沒錯，絕對不行喔，叔叔。」

然而，我當初為何會想造訪與我無親無故的安徽省農村呢？那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上海過的生活是由無以計數的「農民工」，也就是從農村出外賺錢的勞動人口所支撐的，而且其中多半都是安徽省的農民，遂而想要去了解他們的背景。

## 二、女服務生的產地

「今天也是『福建炒飯』（淋上芡汁的海鮮炒飯）和『白灼芥蘭』（淋上醬油的汆燙芥蘭菜）吧？每次都一樣的嘛。」

因為每晚光顧而與我面熟起來、看似二十五歲左右的女服務生，一邊點餐一邊古靈精怪地笑了。當時我大概已經光顧那家店三個月了吧。雖然彼此面熟，但那天晚上是這位女服務生第一次跟我有點餐以外的交談。終於能和她聊些更深入的話題了，我在心中暗暗握拳慶幸。

那是一家位在有數十間酒吧、夜店的上海市中心衡山路外圍的廣東料理店。時間是二〇〇三年，當時的我過著工作永無止盡、將近凌晨才踏出辦公室吃晚餐的生活，每天都光顧那家看準夜店客人生意而開到凌晨四點的店。

這家店還有令人高興的一點，是堪稱「香港版丼飯」的蓋飯菜色相當豐富，飯上鋪著叉燒、白斬雞（蒸雞）等配菜，一個人用餐也不成問題。其中福建炒飯更是一道絕品，先用比大火還旺、整個燒到鍋緣以上的火去除多餘油脂，三兩下炒出美味的蛋炒飯，再用大蒜與生薑炒蝦仁、雞肉、干貝、蘑菇、花椰菜、胡蘿蔔等食材，並淋上濃郁的醬油味芡汁。

以當時便宜餐廳的蛋炒飯還只要五元（新臺幣二十二元）的上海物價來看，雖然加上芥蘭菜的蓋飯要價五十元（新臺幣二百二十元），絕對算不上便宜，不過每次來都可以跟這位熟面孔的女服務員聊天，也是這家店的一大魅力。

## 一群不存在的人

假如我是出於愛慕之情而想每天見到她的話，故事應該會增色不少，只可惜事實並非如此。雖然還不確定，但我猜她八成是在上海居住的人口中，繼上海本地人之後，構成第二大勢力的地方出身者，因而受到吸引。

儘管這群勢力如此龐大，但如果每天都過著往返於自家與公司的生活，別說是開口交談了，很有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這些人的存在。她所屬的勢力就是有著這樣的特性。

或許是一直吃同樣的東西，她多少記住我了吧，於是我也第一次回她菜名以外的話。她告訴我說：

「我在這間店工作以後，才第一次在員工餐中吃到芥蘭菜，咬起來非常爽脆，味道很棒，我自己也很喜歡。」

芥蘭菜在香港或廣東是最受歡迎的蔬菜，但當時在上海等長江流域的江南地區，大概只有在賣廣東料理的餐廳才找得到。既然她是來這間店工作以後才吃到芥蘭菜，那表示她有很高的機率來自那個龐大勢力，而不是廣東人。

那天晚上的她相當主動，還問了我另一件與點餐無關的事。

「你是日本人吧？因為我看你總是在看日文書。」

是啊，我答，又反問她：「妳老家是安徽吧？」

她頓時瞪大雙眼，說：「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並不知道，只是在上海如果聽到認識的女服務生說，猜猜她是哪裡人，基本上只要回答安徽，保證有七成的機率會猜中。

為什麼上海的餐廳有這麼多來自安徽省的男女服務生呢？

這就是當初我之所以對安徽這個內陸省份產生興趣的契機。

說到安徽省就能立刻知道它位於哪裡，或有什麼具體印象的日本人，應該不多吧。

就地理上來說，安徽省位在上海的西側，以直線距離連結的話，從上海的中心到安徽最東邊大約二百公里。從湖北、江西、安徽三省邊境流入的長江，斜貫安徽的南部。

因為習近平國家主席的前任胡錦濤，祖籍（一族的原籍地）在安徽省，所以也有日本報紙每到三月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人代、國會）的時期，就會在報導中提及胡錦濤出身安徽省一事。此外，《三國志》迷應該也相當熟悉這塊魏國曹操出身的土地吧。如果是喜愛世界遺產的人，描述這裡有著黃山腳下自明朝留存下來的石板路與白牆黑瓦的古聚落，或許腦海中會更有畫面。

## 產壞人的安徽省

然而，如果問上海人說：「安徽省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安徽人怎麼樣？」

十之八九會得到相當不留情面的答案：

「老土。」

「貧窮。」

「落後。」

就像日本也有人會嘲笑埼玉是「土奇玉」，或半開玩笑地揶揄「名古屋人都把炸蝦說成『炸啥』」一樣。不過上海居民貶低安徽，並不是因為這種單純而戲謔的理由，而是因為背後存在著階級差異、歧視心理與偏見。

例如有一次，我在街上拍一個年約五十的上海男人擦鞋的照片，他問我：「你還拍了些什麼樣的照片？」

我說安徽農村之類的，結果對方立刻露出一臉詫異的表情，彷彿聽到什麼無法理解的外文。

「你是說你實際跑到安徽的農村去拍照嗎？」他問。

我回答他，對啊。他一臉不可置信，好像在說「這傢伙竟然是個不知世事的人啊」。

「安徽這個地方啊，沒必要大老遠從上海跑過去。反倒是安徽農民都來上海賺錢了。」他說。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無止盡對安徽的批評。

「你不知道安徽省是盛產壞人的地方嗎？你知道《三國志》裡篡漢的曹操吧？現在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也是，不到十個裡面就有胡錦濤、吳

邦國和李克強這三個安徽人，還有江澤民他爺爺也是安徽人，不是壞人哪有本事成為共產黨的大佬啊。」

他憤憤不平地說著，緊接著又一臉嚴肅地斷言道：

「不只如此，上海的『小偷』幾乎都是安徽人或維吾爾人。壞事我就不說了，總之你可別去安徽那種危險的地方。」

這名擦鞋男子不僅一聽到我請他讓我拍張照便爽快應允，還很友善地想請我吃眼前串燒攤販的咖哩肉丸。對於安徽的評論，應該也是出於一番好心，想給我這個在中國人生地不熟的外國人一些忠告吧。這種對安徽的土地與人帶有偏見的認知，不只可見於這名擦鞋男子身上，也是一般上海人，不，是一般中國人都有的印象。

不過，倘若問住在上海的安徽人說：

「上海是什麼樣的地方？上海人怎麼樣？」

他們的回答會更不留情面就是了：

「陰晴不定。」

「小氣。」

「裝模作樣。」

「冷淡。」

「有一堆陰柔的男人和心高氣傲的女人。」

無論如何，若光從反映經濟力的統計來看，安徽的數字在當時確實不太好看。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是八千六百七十五元（新臺幣三萬八千一百七十元），在全國三十一行政區（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倒數第四。反映購買力的居民消費水準是三千八百八十八元（新臺幣一萬七千一百〇七元），同樣位居倒數的第八名。若與上海比較的話，人均GDP



約為六分之一（新臺幣二十二萬六千四百八十六元），居民消費水準約為五分之一（新臺幣八萬〇九百四十二元）的比例（二〇〇五年，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當時的最高權力者鄧小平剛經歷過第三次失勢與復出，在他的一聲號令下，中國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經濟，於是安徽人第一時間便四散至全國各地謀職。北京奧運前一年的二〇〇七年，總人口六千六百七十五萬人之中，離開安徽居住在其他省分的人超過一千萬。其中人數最多的，就是所有大都市中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上海，有二百多萬人，其次是北京的二百萬人，再來是廣東的一百五十萬人（《經濟日報》，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截至二〇〇九年底為止，上海的人口約一千九百萬人，其中外來人口有六百六十萬人，意即上海每九人當中就有一人來自安徽，若僅限於外來人口的話，事實上每三人就有一人是安徽人。由此應該就能知道，安徽人在上海的勢力有多麼龐大了。

在這些四散於他省的安徽人之中，當然也有從事辦公室工作的上班族，也就是所謂的「白領」，或者是企業家。不過，主力還是從農村前往都會賺錢，在工地等地方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也就是所謂的「民工」或「農民工」。

雖然一般人似乎認為民工專指在工地工作的體力勞動者，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最初所謂的「農民工」，其實源自八〇年代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之際，將各地農村流入都會求職的人都稱為「農民工」。尤其在許多外資企業最初選擇試水溫的廣東省，更是有大批農民工蜂擁而至，因此又被形容為「民工潮」。由於當時農民工投入的工作主要是在建築工地，或將生產據點移至中國的外資企業工廠，因此才會塑造出「民工

就是體力勞動者」的印象吧。

不過在那之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的經濟水準逐漸提升，連帶也帶動餐飲業與服務業的成長。具體來說，像是餐廳的男女服務生、按摩店的按摩師、美容師等職業，也都開始有農村出身者。約莫在此時期，「農」字就從稱呼他們的這個名稱中拿掉，直接稱為「民工」了。

一九八〇年代泡沫經濟鼎盛的日本，那些「辛苦、骯髒、危險」的工作，因為日文發音都是K開頭而被稱作「3K」，特別受到年輕人排斥；但上海人是因為薪資太低、工作時間太長，還有為了保住「面子」，所以不想從事提供服務的工作。然而這些都是都市建設或維持舒適生活不可或缺的工作，最後只好由外來人口，也就是民工來彌補這塊缺口。

在上海的外來人口中，勢力最大的就是安徽人。安徽已然成為上海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供應基地。對於中國人，尤其是上海人來說，之所以有「安徽＝民工」的印象，正是緣於這樣的背景。

為了籌備二〇〇二年底定案的上海世博，當然除了拆除會場預定地上的住宅、加緊趕工完成地下鐵或幹線道路等基礎建設，還要同時進行舊城區的都市更新，因此整個城市都呈現施工中的樣貌。而身處在這樣的上海，雖然三不五時可以見到人們在工地工作的模樣，但一般生活中不會去和他們面對面交談，幾乎等於沒有實際的接觸。所以如果要與他們談話，勢必得找那些男服務生、女服務生、按摩師、美容師等從事服務業的人了。結果自然而然變成，我所結識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似乎過了二十五歲以後，連服務業也不太採用無經驗者，只剩下工地等體力勞動的工作可以選擇而已。

## 無可奈何的豁達

我日復一日地前往同一家餐廳吃同樣的餐點，試圖用這種方式讓他們記住我的臉，一步一步努力爭取與他們聊天交流的機會。

在我的努力之下，他們的輪廓變得愈來愈清晰。這群人來自農村，年紀介於十六、七歲到二十五歲，單身，從家鄉的初中畢業後就來上海賺錢，薪水大約在八百元（新臺幣三千五百二十元）到一千二百元（新臺幣五千二百八十元）之間，與同事一起生活在店家準備的宿舍大房間裡。這就是他們在北京奧運舉辦的二〇〇八年時的群像。

二〇〇〇年代中期，在集合著來自全中國甚至世界各地優秀人才、一職難求的上海，大學畢業生起薪突破二千元（新臺幣八千八百元）一事掀起話題。反觀那些被稱呼為民工的人，雖然年齡分布廣泛，下至十五歲，上至六十歲左右，但一般以上海來說，即使犧牲週六週日成天工作，大概能賺到一千五百元（新臺幣六千六百元）就已經算好的了。儘管曾有新聞報導說，在以「鳥巢」之稱聞名的體育場等，北京奧運相關設施建設工地工作的民工，平均月薪為二千八百元（新臺幣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元），以體力勞動來說是相當高的薪水，但這可以說是例外情形。

與他們這些離鄉背井出外賺錢的年輕勞動者聊天，自然會聊到未來的夢想或規畫，然後十人、二十人這樣聽下來，我發現他們的夢想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我要在上海揚名立萬」或「我要在上海成家立業」的想法。

如果我問他們：「你的夢想是在上海出人頭地嗎？你想在上海成家嗎？」

每一個人都會搖頭告訴我說：

「我想在上海工作個五年、十年，存錢回家開個小餐館。」

「就算要在上海結婚，也最好是跟同鄉的人，然後我想跟對方一起回故鄉開食堂。」

他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一方面可能也是基於現實的理由吧，因為比起他們的收入，上海的物價實在高得令人絕望。不過與他們聊過之後我才知道，他們也不會羨慕上海人或哀嘆自己的境遇。他們感受到了上海的生活確實很有魅力，物資充裕、生活方便、不缺休閒場所，還有很多迷人的男男女女。

只是也感覺得出來，他們是因為在上海生活期間，察覺到故鄉似乎比上海更能按照自己的身分地位，按照自己的步調去生活，才做出這樣的選擇。

我衷心佩服這種冷靜面對現實的生活態度，因為若換作是我的話，肯定無法做到吧。

但另一方面令我在意的是，那是不是一種出於心灰意冷，才形成這種無可奈何的豁達呢？換句話說，是心灰意冷地認為，中國就是一個人出生的起點是在都會還是農村開始，就已經有了明顯差距的國家。是不是即使年齡增長至三十幾歲、四十幾歲，思想的根基還是與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一樣心灰意冷呢？

我一邊將喬女士（那天我們第一次互相自我介紹，才知道彼此的名字）送來的福建炒飯送進嘴裡，一邊心想：「我看該是時候鼓起勇氣，結識一些年齡層較高、在建築工地工作的人，聽聽他們怎麼說了。」

### 三、受雞肉擺布的人生

以前只要有朋友或認識的人來上海，有兩家餐廳我一定會帶他們去。一家是上海的家常菜，另一家是賣廣東料理的店。兩家的門面或招待都稱不上突出，而且一到晚餐時間，附近的居民還會直接穿著睡衣和拖鞋，拎著鍋子跑來買晚飯，不僅充滿地方特色，連知心好友都會懷疑「什麼？吃這裡？」而一度想打退堂鼓。

不過料理的美味是無庸置疑的，例如上海料理那家店，從前菜的芝麻油與大蒜拌小黃瓜開始，就讓我一群朋友驚呼道：「只不過是把小黃瓜切段而已，怎麼可以這麼好吃！」把竹筍、薺菜、山藥、黑木耳、豆苗等當季蔬菜，還有豬肉或雞肉簡單地炒一炒、炸一炸、煮一煮，就是一道美味佳餚。

菜餚的價錢則驚人的便宜，在我頻繁光顧的二〇〇三到二〇〇六年，一盤菜大約才十元（新臺幣四十四元）。兩人吃差不多三十元（新臺幣一百三十二元），有一次我們十人一起暢飲啤酒、吃東西吃到撐，竟然還二百元（新臺幣八百八十元）有找。即使在當年物價還很便宜的上海，也是低廉得令人難以置信。

## 大方捨去尾數的餐廳

賣廣東料理的店叫「茶餐廳」，在發源地的香港，當地人會在那用餐，也會把那當作喝茶的地方，菜單上有餛飩麵，也有豬排或羅宋湯，硬要以日本風來說的話，就像是家庭餐廳那種型態的店。

我常去的上海那家店經營者也是香港人，招牌菜是皮烤得香香脆脆的自製叉燒。用這種叉燒做的炒飯也很美味，與茶葉裝在濾袋裡煮出來的香濃港式奶茶一起點只要二十元（新臺幣八十八元），是人在上海也能以便宜價格輕鬆享用到香港本地風味的珍貴餐廳。

那家上海料理店另一件令人期待的事，就是每次去櫃檯結帳的時候。負責顧店的是一個來自內蒙古、年約三十歲上下，看起來人很好，然後身材圓滾滾的小哥，他都會看著帳單噠噠噠地按計算機，但有時明明已經算出總金額了，他卻還是遲遲不說是多少錢。只見他困擾地盯著數字出來的畫面，過一會兒才下定決心似地抬起頭來，不好意思地說出金額。

一開始我只覺得奇怪，他怎麼不趕緊說出金額，但去了幾次我才發現，原來當他不好意思地說出金額時，都是總金額尾數在四元以下的時候，例如三十四元或四十三元。他會給我優惠，捨去尾數，只跟我收三十元或四十元。不到日幣五百圓（新臺幣一百三十五元）的一頓飯，就給了我六十圓（新臺幣十六元）的優惠，想必利潤一定被壓縮不少，可是他不僅堅持提供美味，而且即使削減利潤也要多培養些熟客，他的這番努力和臉上隨時掛著笑容的性格，使得店裡總是坐滿受他為人吸引而來的客人。我想，當時常去這兩家店用餐的我，確實過得很幸福。



## 便宜好吃的店消失了！

然而我這樣的幸福，並沒有持續下去。

一天，我在廣東料理店點了炒飯，結果裡面加的不是原先的叉燒，而是魚肉香腸。咦？難道今天叉燒賣完了嗎？我如此暗想，但之後二度、三度到訪，也都還是魚肉香腸。我不敢開口問老闆，但明顯是為了降低成本的緣故。

過了一陣子，炒飯的價格調高了，叉燒還是不見蹤影。既然換成魚肉香腸，味道大不如前，價格也調高了，我自然愈來愈少光顧這家店，也不再帶朋友過去了。

無獨有偶地，上海料理店那一陣子也不再捨去尾數，不久之後菜單上的金額還一口氣翻倍。再過一陣子，那個蒙古人也不再出現在店裡，換成一個不苟言笑的上海老闆坐在櫃檯。後來我又去了幾次，但店裡再也不像蒙古人還在時那樣明朗歡快，來客量也日益減少。一段時間以後我再經過那家店前，原來的餐廳已經變成花店，店裡仍然是同一個老闆意興闌珊地坐在那裡。

自此以後，我再也不曾找到任何像那兩家餐廳一樣的店了。雖然好吃的餐廳還是有，但美味程度也反映在價格上。說得誇張一點，就是便宜卻意外美味、不管一人或多人都能用餐的店，已經從上海絕跡了。

## 北京奧運與上海世博的衝擊

這兩家餐廳的改變發生在二〇〇七年，正好是隔年即將迎來北京奧運、再兩年後又將舉辦上海世博的時期。

我在調查後發現，從二〇〇七年到二〇〇八年，中國有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都集中發生在這段時間。

二〇〇七年年中爆發「紙餡包子事件」，有攤商將廢紙箱偽裝成肉餡放進包子裡販賣。

二〇〇七年底至隔年一月爆發「毒水餃事件」，有日本消費者食用混入殺蟲劑的中國製冷凍水餃後相繼中毒。

二〇〇八年秋天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有廠商使用以摻入三聚氰胺的飼料餵養的乳牛產出的牛奶為原料，製成奶粉、牛奶、優格等乳製品，造成食用這些乳製品的嬰兒或成人罹患腎結石或健康受損。

這樣羅列下來，不免讓人嘆息世道如此敗壞。只是嘆息之餘也有種感觸，會不會是因為籌備奧運與世博期間，舊日建設不斷被拆除，所有東西日新月異，財貨價格和人事費用與日俱增，所以在時代迅速變化的過程中，人們開始受迫於一種焦慮感，擔心從事良心買賣會遭時代淘汰。

難道在窘迫的環境下就能忽視道德嗎？當然不是這樣。只是中國在二〇〇七年以前並沒有道德低落到這種程度。食品安全事件集中發生在那一年，恐怕是時代或社會的傾軋以另一種形態爆發出來吧。我喜歡的那兩家餐廳經營者，到最後也失去可以捨去尾數，或堅持使用叉燒守護美味的餘力了。

其後雖然有再爆發出食品安全事件，例如二〇一〇年發生的有人將

排放到水溝的廢油重新提煉成食用油，提供給多家餐飲店使用的「地溝油事件」等等，但比起二〇〇八那一年，情況似乎稍有改善。然而在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一四年間，又再度集中爆發各種事件。

二〇一三年年初爆發「假羊肉事件」，有人用狐狸肉或老鼠肉冒充羊肉，在上海或江蘇省等地販賣。

二〇一三年三月爆發「病死豬事件」，有人將多達一萬頭病死豬丟入流經上海的黃浦江，甚至拿病死豬的肉來販賣。

二〇一四年七月爆發「上海福喜事件」，福喜食品公司將過期雞肉或掉在地上的肉賣給速食店，其中也包括麥當勞、肯德基等速食品牌，當時日本媒體也大篇幅報導此事。

## 過於懸殊的貧富差距

威脅到食品安全的事件再度開始集中爆發，背後的推力究竟為何？依我所見，或許與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的情況深刻相關。

福喜事件發生的二〇一四年五月，我搬遷至上海市中心，但我有意遷回前一年之前曾居住過的地區，因此調查了之前那處公寓的租金，沒想到短短一年之間，房租竟然飆漲到原先的一．五至二倍。雖然我老早就預料到，不久的將來可能必須打消住在市中心的念頭，但這樣的漲價速度還是太快了。

即便是持有不動產的人，因為物價的上漲會直接影響到生活，所以儘管他們一方面希望價格上漲，卻也開始注意到，若按照這樣的速度繼續衝刺，遲早會面臨極限。不過，在處於一旦全年經濟成長率超過七%，經濟很有可能硬著陸<sup>01</sup>的狀況下，他們也陷入不得不衝刺下去的兩難中。另一方面，對於未持有不動產的人而言，他們與持有不動產的人之間，則是開始出現令人絕望的差距。

那麼上海市民究竟如何看待上海福喜的問題呢？為此，我拜訪了一位在做家庭女傭的朋友，潤發夫妻的家。

他們來自安徽省的農村，潤發先生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潤發太太則是家庭女傭。他們住在都更案中確定要拆除，且居民都已經遷離的集合式住宅廢墟中。雖然住在決議讓居民遷離的住宅中是違法的，但由於承包拆除工程的是潤發先生所屬的建築公司，因此老闆讓潤發先生這些做體力勞動的員工住在那裡。房租、電力和瓦斯也全都免費。

自從定居在上海，他們平均每兩年搬家一次，但每次住的都是潤發

先生公司預計將拆除的廢墟。我曾去其中三間拜訪過，每間的格局不一，有兩房一廳也有套房，不過其中的共通點就是所有窗戶都被敲掉，自然光完全照不進屋內。

潤發夫妻以那種方式盡可能節省生活開銷，好為兩個兒子存學費或結婚基金。換句話說，如果不是住在廢墟的話，可能連存不存得到送兒子上大學的錢都無法保證。

二〇一六年的春節，潤發夫妻邀我去他們家吃開春飯，潤發太太還笑著說：「我去年花在自己身上的錢，就夏天回安徽省老家去美容院剪頭髮五十元，還有冬天新添購的毛衣四十九元，總共九十九元（新臺幣四百三十六元）。」

二〇〇六年的夏天，我一手拿著相機在城裡漫步，走著走著來到租借時期日本人聚集的虹口地區都更地，看見有體力勞動者站在即將拆除的舊集合式住宅屋頂上講手機，便問他能不能讓我拍張照。當時那個爽快應允的人，就是潤發先生。他告訴我說他是從安徽省農村來這裡賺錢，我說上海有很多安徽省的人，我很想再次拜訪你們生長的農村，但一直都還沒有機會，結果他竟然說他一週後剛好有事要回去，所以到時候有空的話可以去找他玩。

當真信了這番話的我，一週後真的花了十二小時跑去他家，途中還因為巴士故障而整整五小時動彈不得。見到我這個剛在上海認識不久，而且只是站在路邊閒聊過十五分鐘的來客，潤發先生滿面笑容地緊握我手說：「難為你大老遠跑來。」從此我就與潤發夫妻成為朋友。

潤發太太做事認真、做菜的手藝又好，在口耳相傳之下，她一天至少要兼顧三到五戶人家，做些打掃、帶孩子、煮飯的工作。他們來上海之前待過北京。兩人老家的村子相隔不到兩公里，而且都是「十六歲左

右混到初中文憑」，潤發先生在老家幫忙務農，潤發太太到北京做幫傭，後來經人介紹在一九八九年，兩人二十五歲時結婚，婚後立刻到北京工作。

潤發太太繼續做幫傭，潤發先生到工地工作，幾年以後，他們用存到的錢開了一家雞肉攤，把活生生的雞宰了拿到市場賣。要訪問關於上海福喜事件的事，他們是再好不過的人選了。順帶一提，他們收掉雞肉攤是受到二〇〇三年發生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影響，活雞被懷疑為感染源，因此無法再從事相關買賣，迫不得已只好改做其他生意。

「那時候生意做得還不錯，所以如果沒有SARS的話，我們現在可能還在北京賣雞肉吧。那樣的話，搞不好就不會在上海認識山田先生了。」說完，潤發先生笑了笑。

## 註釋

- 01** 硬著陸：經濟在一段強力擴張之後，以不引起通貨膨脹的過熱和不至於陷入衰退的，較劇烈的方式調控經濟。



## 只有超市跑不了

我問潤發太太在上海福喜事件發生後，雇主對她在煮飯方面有沒有什麼要求。她給了我這樣的答案：

「雖然不是從這次才開始的，但他們再次叮囑我說，食材要去大型超市買，不要在市場買。雖然上海福喜也是大公司，並不是說在大型超市買就可以放心，但萬一發生什麼問題的話，至少大公司沒辦法躲起來，我們也可以追究責任吧？在市場開店的都是個體戶，所以發生事情也只會被躲掉而已。」

不管在北京或上海，潤發夫妻的人生總是圍繞著雞肉事件打轉。

中國販售食材的地方大致上分兩種，一種是俗稱「菜市場」的市場，另一種是超市。菜市場是由個體戶在政府所建的市場中經營店鋪，建築物的型態依地方而異，主要是在體育館般大的空間，用鋼筋結構搭上屋頂，然後集合了好幾家賣蔬果的、賣肉的、賣魚的、賣雞蛋的、賣米的、賣小菜等各種攤販。潤發夫妻在北京經營的雞肉攤也是在菜市場裡。

## 曾經存在的良心

我進一步詢問潤發先生和潤發太太，他們在經營雞肉攤時，也有人會賣過期的肉嗎？

「當然多少還是有，但這種人並不多。把雞掐死再剖開肚子以後，發現雞生病了或內臟顏色很奇怪的，老實說偶爾還是有的。但我們家爸爸是很老實的人，所以那種肉全都會丟掉，不會拿出來賣，其他店家也大多都不會拿出來賣。因為啊，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賣不好的肉，到最後客人只會愈來愈少而已。」

由此可知，至少在二〇〇三年以前，用不好的肉濫竽充數的販賣行為，在潤發先生周圍並不是常態。

中國自從在二〇〇八年爆發奶粉和牛奶含有三聚氰胺的問題後，社會上就形成一股不喝牛奶改喝豆漿的趨勢，可以自己在家裡做豆漿的豆漿機深受消費者青睞。如今走一趟家電量販店，不僅可以看到架上陳列著豆漿機，還有二〇一〇年「地溝油事件」後問世的「家用榨油機」，或是可以洗淨蔬菜表面殘留農藥的清洗機等產品。然而，當我向潤發太太提起這件事，她說：

「豆漿機啊，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臺呀，可是現在應該沒有人還在使用吧。像麵包機、果汁機那一類的東西，用一陣子就膩了，而且又麻煩，到最後根本沒人用。」

「況且，」潤發太太接著說：「有這麼多危險的東西，光是豆漿安全也沒用啊。」

## 希望尚存

身為家庭女傭的潤發太太，自然見識過不少富裕階層的生活，但在當時將近八年的往來中，我從未從她口中聽到任何一句對有錢人生活的羨慕、對社會的不滿，或類似抱怨自身遭遇的話。她始終與丈夫一起埋頭苦幹，以供應學費給當時正在讀研究所的長子。在不動產的部分，她也從未放在心上，認為老了以後可以回鄉下農村的家，所以那樣就夠了。但連潤發太太這樣的人，都開始對影響人類健康或生命的食品道德觀低落一事，感到無力或束手無策。

話題談到一個段落後，潤發太太說：「吃完晚飯再走吧，從病死豬或雞肉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家都以魚肉為主，所以沒有其他肉，你就委屈一些吧。」說著便走到廚房。然後不過短短三十分鐘左右，她就迅速準備好皮蛋豆腐、炒青菜、冬瓜湯、辣味酥炸淡水魚，和下工回來的潤發先生三人一起圍坐在餐桌上。不愧是有口皆碑的家庭女傭，每一道都很美味。我平常很討厭細刺很多的淡水魚，但那道甜辣口味的淡水魚一點腥味也沒有，相當下飯。儘管我腦中一時閃過，假如中國再這樣下去，難保潤發太太不會有說出「從病死魚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家連魚也不吃了」的一天，但我實在無法向她說出這種話。

況且那時候出外賺錢的人，似乎還相信著自己未來的生活會更好，這樣的環境總有一天會改善，根本沒想過日後的環境竟會惡化到今日這種以PM2.5為代表的情況，也沒想過會有對未來失去希望的一天。

## 四、優衣庫（UNIQLO）的新娘服

在上海地區，日本的商品和食品已經很理所當然似地滲透進生活之中，例如二〇一七年的這個時候，在我上海的租屋處附近徒步十分鐘以內，就有兩家賣牛丼的Sukiya、一家賣讚岐烏龍麵的丸龜製麵、一家賣咖哩的CoCo壹番屋，和一家賣義大利料理的薩莉亞。每當工作繁忙時，我就會輪流在這四家店解決晚餐。

單點的話，一來很乏味，二來營養也不均衡，所以假如去Sukiya的話，我會選擇附豬肉味噌湯與沙拉的定食。假如去丸龜製麵，因為很遺憾地，菜單上沒有我在日本最愛的加了白蘿蔔泥的「蘿蔔泥烏龍麵」，也沒有加了溫泉蛋與山藥泥的「山藥溫泉蛋烏龍麵」，所以我都點肉片烏龍麵加炸蔬菜。假如去薩莉亞的話，就點起司雞排與芝麻葉沙拉。這樣大部分的店都是一餐約三十元（新臺幣一百三十二元）左右。

雖然包含我在內，有不少日本人會光顧這些餐廳，但每到晚餐時段，在我用餐的十分鐘左右時間內，店裡除了我以外，反而比較多都是中國的年輕人或家庭。儘管曾經有過日本產品價位較高，所以專門銷售給富裕階層的時代，但感覺日本的外食連鎖店，如今已完全成為上海的平民餐廳。

## 中國農民眼中的優衣庫

與外食產業同樣融入當地的，就是優衣庫了。由於我喜歡漫無目的地四處閒逛，導致襪子經常破洞，因此很常買優衣庫的襪子，也就是日本四雙九百九十圓（新臺幣二百六十七元）不含稅的超值組合。中國也有販售四雙一組的襪子，價格是人民幣七十九元。我用從日本扣款的信用卡購買，結果收到的帳單是一千三百五十圓（新臺幣三百六十五元），比在日本買還貴。

出於在日本購買比較便宜的心態，我主要買的就只有襪子而已。只是中國人當然不會錙銖必較地換算日圓，因此優衣庫和那些日本外食連鎖店一樣，總是有很多家庭或情侶一起來消費。

從優衣庫的中國網站可知，截至二〇一七年六月為止，上海總共開設了六十六間店鋪。經營優衣庫的迅銷集團於二〇一三年九月底，在上海數一數二繁華的淮海中路開設賣場面積約二千坪，而且是同公司中世界最大（當時）的全球旗艦店，由此可知該公司將上海定位為重要的都市。

上海、北京、廣州等在中國被稱為「一級都市」的大都會，尤其是上海，一般人對優衣庫的印象都跟日本一樣，認為是平常穿著的休閒服。然而，在中國地方都市或農村，它的定位卻稍有不同。

令我對中國農村或出外謀生者大開眼界的年輕朋友長順，就讓自己的妻子穿優衣庫當新娘服。

## 十五歲出社會的新郎

長順出生於一九九一年，今年（二〇一七年）二十六歲。初中畢業後，十五歲就從安徽省的農村前來上海。做過花市雜工、遠親家的保姆、海鮮餐廳的服務生等工作，但最長也只維持半年，輾轉之下開始的髮型設計師工作相當順手，因此在兩年內累積三家店的經驗後，自己在浦東機場近郊的城鎮租借約三坪大的空間開店。

如果刻意要形容的話，那家店的風格就像主打「十分鐘一千圓儀容整理」的日本QB HOUSE，二〇一二年時的定價為剪加洗加吹十元（新臺幣四十四元）。他每個月手邊結餘的錢是三千五百元到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五千四百元到一萬七千六百元），和據說平均有七千元（新臺幣三萬〇八百元）的上海上班族比起來，雖然只有一半，但好過在工廠或便利商店工作。只是母親擔心自營業不穩定，所以他聽從母親意見收起店面，開始在附近一家雇用許多初中學歷農民工的物流倉庫工作，因為那裡只要加班也可以賺取差不多的收入。

不久之後，長順便在二〇一三年的早春決定結婚了。新娘同樣來自安徽省，是在他職場附近的裁縫工廠工作的女工。當時女方十七歲，交往不久就懷了他的孩子，舉辦婚禮時已經足月了。附帶一提，中國的法定結婚年齡是男性二十二歲、女性二十歲，但十幾歲結婚生子，等到法定年齡才正式登記的情形，在農民工之間並不少見。

按照中國的習俗，尤其是在農村，生產都在夫家進行。長順家在迎娶新娘之前，花了八萬元（新臺幣三十五萬二千元）重新裝潢，將原本用來堆放雜物的二樓改裝成新婚夫妻和小嬰兒的房間。長順的父親一九六五年生，當時四十八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兩人都在上海做過清潔

工或食品工廠等工作，但幾年前父親身體出狀況，與負責照顧的母親一起回到鄉下，僅靠存款維持生活。

因此，為了迎娶新娘重新裝潢家裡，幾乎使他們散盡家財，連在附近餐廳舉辦婚宴招待客人的三萬元（新臺幣十三萬二千元）餐費，都是向親戚周轉來的。雖然婚宴費用多半會與出席者的禮金打平，但這樣做至少能夠確保不會丟失顏面。

「優衣庫一定有！」

好不容易解決錢的問題，沒想到在婚宴前幾天，長順母親突然慌張起來：「沒有適合足月產婦穿的婚紗，現在要訂做也來不及了，新娘的衣服該怎麼辦哪！」

雖然近來穿著西式純白婚紗的情形相當普遍，但傳統的新娘服是紅色的。即使穿著白色婚紗，更換禮服時也會穿著紅色。在保有濃厚傳統習俗與思想的農村，如果不更換禮服的話，新娘服必然會選紅色。

長順一家人最先想到的，是新娘服的顏色一定得要是紅色，然後最好可以溫柔包覆新娘的大肚子，而且材質要好、看起來不會太廉價，還要融入中文所說的「時尚」，也就是流行的設計。

這時，長順腦中閃過一個念頭，他突然想起一個牌子：「對了！去優衣庫不就有了嗎！」他的母親聽到也鼓吹說：「對呀！優衣庫！那兒應該買得到才對！」

他老家所在的村子幾年之前被併入蕪湖市，而優衣庫在蕪湖鬧區開設的門市於二〇一二年九月開幕，在安徽省是繼省會合肥之後開設的第二家店。

長順回憶當年的情景說：

「我在考慮要給老婆穿什麼衣服時，想到之前放假去上海玩，在鬧區逛到的優衣庫。那時第一個浮現在我腦海中的就是優衣庫的衣服五彩繽紛。牆邊的架上不都陳列著一堆五顏六色的T恤或外套之類的衣服嗎？而且優衣庫的商品五花八門，甚至連內衣和西裝都有，所以我想只要去優衣庫，應該就可以找到懷孕的新娘穿起來也不奇怪的漂亮紅色衣裳吧。」



長順一家人為了尋找新娘服而四處奔走的那時候，安徽省蕪湖的優衣庫大約才開幕半年，就已經是家喻戶曉了。

「我自己在上海住過，所以知道優衣庫是日本的牌子，不過在我鄉下老家那裡，似乎大部分人都是因為蕪湖店才第一次聽說優衣庫，但不管是當年還是現在，知道優衣庫是外國牌子的人並不多，因為親戚看到我老婆在婚宴上穿的紅色衣服，問說：『那是哪裡的衣服？』我說是優衣庫喔，是日本的牌子喔，結果對方驚訝地回我：『什麼？優衣庫不是中國的牌子啊？』」

## 大紅羽絨外套作嫁衣

為什麼優衣庫在中國非都市地區或農村，會被認為是中國的品牌呢？我請長順替我詢問他的親朋好友，想了解個中原因。他說：

「我的堂兄弟說：『因為廣告是找演員高圓圓來拍的，所以才以為是中國品牌。』伯父說是因為漢字名字『優衣庫』實在太像中國的牌子了，比方說『NIKE』的『耐克』或『ADIDAS』的『阿迪達斯』，雖然都有中文的漢字名字，但年輕人通常都會想到英文字，可是看到『UNIQLO』的話，根本不知道怎麼念，所以可能才以為『優衣庫』是中國品牌，取了UNIQLO這個英文品牌名稱吧。」

儘管如此，似乎也沒有人百分之百確信優衣庫是中國品牌。「若從蕪湖店的員工服務、產品品質、設計、品項齊全來看，村裡的人似乎都覺得水準確實高於以往印象中的中國產品。總歸而言，很多人都認為那是『不像中國品牌的優秀中國品牌』。」長順說。

他提到的高圓圓是中國數一數二的美女演員，從二〇一一年開始擔任優衣庫的代言人。不過她也是在二〇〇九年那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中國電影《南京！南京！》當中，飾演女主角的演員。我還記得優衣庫此番大膽的起用令我大吃一驚，也曾心想高圓圓怎麼敢接下優衣庫的工作。只是聽完安徽省的情況後，我想或許優衣庫是日本品牌的印象確實薄弱到那種程度吧。

在中國市場中，有許多日本品牌會以日本為賣點，強調「日本的技術」或「日本的品質」，不過優衣庫的案例顯示，低調提供技術與服務而不張揚國籍，確實也有奏效的時候。雖然不被視為是「日本的產品」，但衣服品質卻足以讓新娘穿著出席婚禮，可見品牌形象並不差

吧。

最後長順、長順太太和長順母親三人，在優衣庫蕪湖店找到紅色長版羽絨外套，以六百九十九元（新臺幣三千〇七十六元）的價格購入。婚宴當天，新娘身穿這件外套，接受到場六十名賓客的祝福。「那件外套又輕，顏色又漂亮，還可以溫暖地罩住我太太足月的大肚子。雖然可以穿婚紗當然是最好的，但那對當時的我們來說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了。」長順說。聽說長順太太如今依然將優衣庫的紅色羽絨外套，珍惜地保管在老家衣櫥中。

## 五、當衝突化解分裂

相信很多人還記得作家曾野綾子在《產經新聞》（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早報）發表以「勞動力不足與移民」為題的專欄時，曾經掀起一番議論。

曾野女士建議，為了彌補照護人員的短缺，應該逐步放寬證照或語言能力的條件，同時建立一套可以保護移民法律身分的制度，認可鄰近國家有意赴日就職的勞動移民。但她認為「為了理解外國人而共同居住是極度困難之事」，並主張說：「自從我二、三十年前得知南非共和國的情況以來，我就覺得唯獨居住地區應該劃分為白人、亞洲人、黑人，彼此分開來居住比較好。」至於令她產生此念頭的理由，她舉出一個發生在約翰尼斯堡的案例，原本一幢只有白人居住的公寓在廢除種族隔離後，開始有大家庭主義的黑人遷入，並使用大量的水，結果「不久之後，那幢公寓就變成水龍頭隨時都沒水可用的建築，而白人也陸續逃離，繼續住在那裡的只剩黑人而已。」

專欄見報後，南非駐日大使裴科（Mohau Pheko）在同年的二月十三日，去函向《產經新聞》抗議，認為此番言論是在「容許、美化種族隔離」。海外媒體也接連以批判角度報導專欄的內容。

針對這個專欄，曾野女士曾接受TBS廣播「荻上Chiki. Session-22」的採訪。當時我從上海用播客（podcast）收聽了這個節目。她說她不可能認為透過法律劃分居住地區比較好，強烈地否認了自己是在擁護種族隔離。那番話只是想表達假設她住在約翰尼斯堡，收到來自日本的臭魚乾的話，也會想在不須顧慮附近居民的前提下拿來烤一烤，因此才會認為居住在亞洲人地區比較沒有負擔。但另一方面，當被問及種族隔

離的問題點時，她的回答也令我印象深刻，她說自己去的時候已經沒有那些問題點了，不曾親眼目睹過，所以完全不了解，還提出歧視與區別是不同的概念，而區別要繼續執行下去等言論。

我這二十多年來都住在香港與上海，但基本上住的都是集合式住宅，而且都是一整幢只有我一戶日本人的環境。我想從這些經驗與觀點，針對曾野女士提出的「勞動力不足與移民」，探討一下上海的情形。

## 上海與曾野綾子的勞動移民爭議

在進入勞動力不足與移民問題之前，我先針對我在一九九〇年代居住了八年的香港與目前居住的上海，介紹一下兩地的外國人居住地區。

香港與上海都有一些地區，是特定國家或區域的人相對集中居住的地方。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上海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有法國租界、英國租界（後來的公共租界），這塊土地上曾有掛著「狗與中國人不得入內」告示牌的公園，或是外國人可以免費通行，中國人卻會被徵收通行費的橋梁。不過現在雖然還是有特定國家或區域的人集中居住的地區，但居住地區並非由法律強制規定。

說到上海，除了有所謂的日本街、韓國城、臺灣村等地區，還有歐美人士偏好居住的舊法租界，那裡充滿歐美觀光客，還有多家令人躊躇不敢光顧的店。有號稱日本人居住率將近一〇〇%的公寓大廈，也有附近就有日系幼稚園，或有道路可直通日僑學校道路的住宅區。在自來水無法直接飲用的上海，而且在那個還很難買到淨水器的時候，也有公寓大廈打出「今天吃蕎麥麵吧」的標語，標榜自來水是淨化過的軟水，所以可以像在日本生活那樣，隨意用冷水冷卻蕎麥麵。

韓國城和臺灣村等地區的狀況也大同小異，販賣該國家或區域食材的超市、餐廳、幼稚園和學校都坐落其中。對於那些明明沒多大興趣或語言不通，卻奉公司之命遠赴中國或香港的外派人員與其家屬來說，肯定比較方便吧。而不會喝酒又偏愛甜食的我，也很喜歡去日本人集中地的日系超市購買日本風味的萩餅。

## 「狗與中國人不得入內」的現今

只是不管是在香港或上海，我都沒有在所謂的日本街居住過的經驗。理由大致有二，一來是專供日本人居住的公寓通常以外派人員為主，租金較高，我無法負擔；二來是被稱為日本街的地區都位在新興住宅區，街道沒有歷史風情，對於喜歡散步的我來說缺乏樂趣。

因此，我一直住在集合式住宅中，在香港的鄰居多半是香港人，在上海的鄰居多半是中國人。我住在香港時，有位住在同一幢公寓的日本人告訴我，他使用從日本帶來的水煙殺蟲劑，結果住隔壁香港人看到白煙以為發生火災，趕緊通報消防隊，連消防車都出動了。不過我自己倒是沒有與鄰居發生過任何狀況。

## 盡是上海人的公寓

另一方面，我在上海住的地方，雖說大部分都是中國人，但一幢公寓的住戶是較多上海當地人或者較多來自其他省市的人，狀況大不相同。對身為日本人的我而言，要說哪一種住起來比較自在，絕對是上海人較少的公寓。盡是上海人的公寓大致上都很排外。

例如我從二〇〇九年開始住了五年的公寓就是如此。在那一幢八戶之中，除了我家，其他七戶都是上海人家庭。我那一戶在我遷入之前，也是上海人的房東自己住在裡面。

在那幢公寓裡，明明其他住戶也做了相同的事，大家卻只會三不五時來我家敲門抗議，抗議冷氣滴出來的水沒有妥善處理、電視的聲音太吵、走路的腳步聲太大等等。要是哪裡漏水的話，總會第一個先來敲我家的門，懷疑我是罪魁禍首。每一次我都會聯絡房東，必要時請他來修理，但住戶總是當著我的面，向前來處理的房東抱怨說：「都是因為你沒把房子租給上海人，才會發生這種麻煩事。」



## 被中國人討厭的中國人

上海人排外的態度不僅針對日本人而已，連對中國人也一樣，尤其對來自安徽省與河南省的人格外刻薄。因為上海人在經濟能力提升後，他們不想做的體力勞動或家事服務，多半都是由這兩省來上海賺錢的人負責。簡而言之，就是有瞧不起他們的地方。雖然民族同為漢族，但在結構上卻是上海人接受來自河南省與安徽省的勞動移民。

從事廢棄物回收的鄭凱先生也來自河南省的農村，他是我住在那幢全是上海人的公寓期間認識的人。我住的公寓算是他的地盤，每當寶特瓶或廢紙累積到一定程度，我就會撥手機給大部分時間都將三輪車停在社區大門附近等候的鄭凱先生，請他來收取廢棄物。

只是那裡的住戶討厭鄭凱先生出入公寓。鄭凱先生相當注重儀容，總是穿著剛洗好的乾淨衣服，但因為他經常埋首在公寓垃圾場，翻找有沒有什麼意外之寶，所以身上總是有些髒汗，自然不太可能受到眾人舉手歡迎。鄭凱先生自己也心知肚明，每次上下穿梭在四層樓的公寓樓梯間時，都小心翼翼地不讓裝著廢棄物的大袋子，碰到住戶放在樓梯間或走廊上的物品。

「那個日本人根本不懂這裡的規矩。」

不過，再怎麼小心仍有極限。

有一回，鄭凱先生回收完我家的廢棄物，才走下樓梯不久，便聽見樓下傳來一陣怒罵聲。我衝下樓一看，一樓的住戶正指著牆壁大罵鄭凱先生。我看了看他手指的地方，牆壁上什麼也沒有。不過仔細用力看會發現，那裡有一條看似用7H鉛筆畫出來的五公分大小淺痕。一樓住戶吵著怪鄭凱先生的袋子碰到牆壁。不過那道汗痕看起來像是只要用橡皮擦一擦就掉了。看來這位對我和鄭凱先生都沒有好感的人，也就是討厭所有非上海人的一樓住戶，應該都是趁著鄭凱先生來我房間的時候，屏息躲在自家門後的暗處，虎視眈眈地察看有沒有任何失誤，以抓住所有投訴我們的機會。

以往因為我是闖入上海人公寓的外人，所以對於各種不合理的指控總是不予反駁，但這次實在令人無法原諒。畢竟事情沒有嚴重到必須將一個好好的人責罵到這種程度，而且我很清楚對方知道鄭凱先生一旦反駁，日後有可能無法在這一區做買賣，不敢為自己辯駁，所以他才敢如此大聲。

我走到一樓住戶面前，將臉湊到幾乎快碰到對方鼻子的距離，但盡可能用冷靜的口氣對他說：「你也知道他不工作就無法生活吧？他的工作就是必須扛著這個袋子，而且我們都有自覺你們討厭我跟他，所以我知道他每次上下樓梯時都很小心，以免弄髒或損壞你們的東西。我也每次都提醒鄭凱先生說小心別弄髒了，今天也不例外。結果現在是怎樣，就那麼一點點汗漬耶。我就直說了吧，你根本就是故意在刁難吧？」

或許是意料之外的反擊令他嚇了一跳，一樓住戶面紅耳赤地丟下一

句「我才不怕你！」就躲回屋裡了。樓上還傳來三樓住戶的聲音：「那個日本人根本不懂這裡的規矩。」不過我可是比他們守規矩多了。

我心想，住在全是上海人的公寓，真是一點也不輕鬆。

## 排外的上海人改變了

一年之後，我搬出那幢公寓。在那件事情發生約五年後的某一天，我問鄭凱先生，一樓的住戶最近如何？結果他給了我意外的答案。

「那天那件事很快就傳到社區其他幢公寓的住戶耳裡喔。然後最近這兩、三年，那個社區也有愈來愈多從上海以外的其他省來的中國人。然後啊，一樓那個住戶完全變得安分老實。告訴我這件事的上海人還說：『他應該是注意到周圍已經不再只有上海人了，一直那樣堅持也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摩擦吧。』讓我驚訝的是，最近那個一樓的住戶看到我時，還會過來跟我打招呼哩。」

正如前文所述，上海人經歷過上海那段「中國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屈辱時代，好不容易結束租界時期，以為自己終於可以成為這座城市的主角時，外來人口的勢力又迅速增長。根據當時（二〇一四年二月）上海市當局公布的統計數據，上海的人口約二千四百萬人，其中上海人，亦即持有上海戶籍的人口約一千四百萬人，外來人口約一千萬人，上海人尚屬多數。

但在過去一年間增加的人口當中，有八五%是外來人口，顯示上海人可能很快會面臨跌破半數的日子。以往上海人之所以如此排外，肯定多是受到租界時代的歷史背景或近年在人口上的劣勢所影響。

但換個角度來說，由於外來人口增加，上海人也有更多機會與來自他省的人群接觸，或是在同一個職場工作。當然居住方面不僅有機會住在同一幢公寓，上海人與外省人結婚的案例也增加了。

我在廣東料理店認識的喬女士，當時已來上海賺錢十二年，她獨自生下孩子後，就到ASUS上海廠當女工，該品牌的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等

產品在日本也很有知名度。那位喬女士說：

「我剛來上海的時候，上海人真的很瞧不起我們安徽省的人，但最近變了很多。那些住在我社區附近的上海人鄰居對我兩歲半的女兒非常好，我自己這幾年對上海人的看法也改變很多，這應該代表上海人與安徽人彼此都習慣對方了吧。」

即使住在一起的都是亞洲人，彼此也會有不少衝突。連中國人住在一起都會因為出身不同而產生摩擦，但理解也會與日俱增。我和鄭凱先生在經歷過被上海人怒罵那件事後，從原本只是認識的人變成朋友，交情好到我會拜託有三輪車的他幫忙搬家，或是趁他春節回家時前往他老家拜訪，留宿在他位於河南省農村的家裡。與習慣不同或脾性不合的人一起生活，有時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

只是，後來在上海或北京等中國大都市，上海人與地方出身者，尤其是與出外賺錢的人之間，一度看似縮短的距離又再度開始拉遠，並逐漸邁向分裂。

## 第二章 | 爆買與PM2.5

中國數一數二的「鬼城」天都城。(2015年·杭州)



## 一、重見藍天，民工離去

二〇一四年秋天，上海天天都是碧空如洗、秋高氣爽的好天氣。上海的PM2.5汙染主要會在冬天惡化，因此不能夠掉以輕心。不過大概從前一年的二〇一三年春天開始，只要在外面走路一、兩個小時，喉嚨或鼻腔就會嗆得像是感冒一樣，有些日子甚至會感覺呼吸困難。在汙染極度嚴重的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天空總是混雜著灰色與黃色，只能隱約看到太陽的蹤影。相較起來，在藍天較常露臉的二〇一四年，汙染程度或許略有改善吧。

那一年秋天，我收到很多朋友的搬家通知。他們之間的共通點就是，每一位都是所謂的「農民工」或「民工」。

我自己也即將搬離那年春天才剛入住的家，為此我撥了通電話給廢棄物回收業的朋友鄭凱先生，我每次搬家都託他來幫忙運送行李，想麻煩他下個週六過來一趟。結果他說：「我那天自己也要搬家，沒辦法幫你。」一問之下才知道，他住的地區確定將在都更案中拆除，因此不得不撤離。

鄭凱先生住的地區，是眾所皆知的低所得者居住區，搭建著許多簡陋的木板屋，說是貧民窟也不為過。大部分的居民都和鄭凱先生一樣，是從外地來上海工作的人。雖然沒有窗戶、沒有廁所、沒有熱水的居住環境絕不算好，但低廉的租金正是吸引人之處。在被迫撤離前，鄭凱先生住了十幾年、蓋在破產工廠用地上的小屋，裡面四坪左右的套房月租四百五十元（新臺幣一千九百八十元）。鄭凱先生與同樣來上海服飾店工作的長女，還有愛犬冬冬一起生活在這裡。

於是，我重新決定了一個搬家日期。我把要給鄭凱先生的寶特瓶和

廢紙集中起來，如果是以前的話，鄭凱先生看到會笑說：「哇，你幫我留了這麼多啊，真不好意思。」但那天他看起來卻沒那麼開心。我問他是不是數量太少的關係，他面色黯然地說：「不，廢棄物的價格從今年早春就大幅下降，根本賺不到錢了。」一問之下才知道，廢紙的收購價格在那年二月初的春節以前，是每公斤一．二元（新臺幣五．二八元），但大約從春節開始就暴跌至原本的三分之一，也就是〇．四元（新臺幣一．七六元）。他說寶特瓶也一樣，而且那樣的狀況一直持續。

當時便利商店店員的月薪大約是二千五百元（新臺幣一萬一千元），相對於此，鄭凱先生說他賺得比較多時，一個月可以賺到五千元（新臺幣二萬二千元）左右，但廢棄物價格下滑那麼多，他的收入肯定也大幅減少。「嗯，現在已經無法像之前那樣靠回收寶特瓶或廢紙過活了，所以我決定去最近確定將在都更案中拆除的社區，做家電或廢材料的回收。」他說。

像鄭凱先生那樣的廢棄物回收業者，都有各自劃分好地盤的社區。鄭凱先生的地盤就是我以前住的社區，他每天早上都騎著心愛的電動三輪車上班，到社區門口坐鎮，靠著收購社區住戶拿來的寶特瓶、廢紙、舊家電或家具維生。然而寶特瓶與廢紙的價格大跌，使得他在社區的生意做不下去，只好轉移陣地到即將拆除的都更區，確保能夠取得大量的家電或家具。



## 廢棄物價格暴跌的理由是空氣汙染？

話雖如此，為何寶特瓶與廢紙的價格會驟降這麼多呢？我詢問鄭凱先生，他答道：「因為PM2.5啊，空氣汙染。」咦？為了改善環境汙染，回收不是應該做得更徹底嗎？我進一步追問，結果鄭凱先生對我露出一臉「這傢伙真是什麼都不懂」的表情，但還是繼續為我說明。

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年，也就是二〇一四年早春，中國政府取締了製造汙染的工廠，結果迫使無法滿足政府要求的小規模或零星工廠大量關閉。在這些零星或小規模工廠中，有很多地方都使用寶特瓶或廢紙作為原料。由於這些工廠關閉，需求驟減，因此廢紙或寶特瓶的收購價格也暴跌。

在與上海鄰接的江蘇省經營工廠的人，也對我說過類似的情形。在江蘇省或上海近郊的浙江省也是，那年春天以後，不符合環境汙染標準的勞力密集型中小規模企業的製造業，都半強制性地被迫歇業。雖然不是直接下令歇業，但政府要求這些企業遷至有著完整的環境保護設施並且遠離住宅區的工業區。只是對於大多數中小規模企業來說，政府指定的工業區租金太昂貴，實在無法經營下去。最後政府就會強制通知拒絕搬遷的企業歇業。

## 消失的貧民窟與農民工的住處

鄭凱先生將重心從廢紙或寶特瓶回收，轉移至都更區的家電回收後，收入變得比以前好。他會把收集到的家電賣給專門業者，價格最好的是冷氣機，有室外機的可以賣到三百至四百元（新臺幣一千三百二十至一千七百六十元）左右。其他像冰箱是一百元（新臺幣四百四十元），傳統電視機是八十元（新臺幣三百五十二元），他說平均下來一天約有四百元的收入。像鄭凱先生那樣的廢棄物回收業者連週末都要工作，只有春節返鄉期間才會休息。若純粹按照他所說的金額去計算，月收入會超過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

但好事不成雙，為了籌備二〇一〇年即將舉辦的上海世博，上海市中心的都更迫在眉睫，然而當時都更的速度卻有種停滯的感覺。換言之，市中心必須拆除的舊城區已經所剩無幾了。我問鄭凱先生，他也說：「以我的活動範圍來說，規模較大的只剩一、兩個地方了吧。」也就是說，預計再過幾年之後，上海市中心將不會再有可以取得大量家電或家具的地方，而可以輕易想見的是，鄭凱先生他們勢必將再陷入無生意可做的困境中。

更嚴重的是，鄭凱先生他們住的超低廉住宅，即將因為都市更新而陸續從市中心消失。被迫撤離生活了十幾年、租金四百五十元的家，鄭凱先生只好為了工作方便而在市中心租屋。房間同樣只有一間，坪數卻從四坪縮小到二．二五坪，租金還漲到將近四倍的一千七百元（新臺幣七千四百八十元）。

「每天收入有四百元的話，一千七百元的房租並不算太大的負擔吧？」我問，結果他說：「沒這回事，這樣根本無法生活下去，因為有

可能會像今年這樣，東西的價格突然暴跌啊。」看來一天四百元的收入是「相對較好的時候」，而且即使收入再多，房租突然變四倍也是相當沉重的負擔吧。

鄭凱先生連續幾天前往自己以前居住、確定將拆除的貧民窟，邊走邊撿家電或舊家具。說來雖然殘酷，但那模樣簡直是自食其肉，靠著自相殘殺苟延殘喘一樣，他自己肯定也覺得無地自容吧。他的長女已在前一個月，趁著工作的服飾店經營不善歇業時，返回河南省的老家了。

我問鄭凱先生，等上海的都更告一段落以後，他的工作該怎麼辦呢？「如果寶特瓶或廢紙等廢棄物的價格到明年還是一樣低的話，就算眼前還有剩餘的都更區，我還是會考慮改行。我來上海十幾年了，一直都是從事廢棄物回收工作，所以現在說要換工作，我自己也很害怕。」他說。事實上，自從那年春天價格暴跌以來，他的同業之間也愈來愈常聊到改行換業的話題。

## 有貧富差距，但沒有嫉妒

同年秋天搬家的另外兩名友人，遷居理由也是因為本來居住的地方確定將被拆除。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從外地來此靠著上海人不願從事的體力勞動等粗活賺錢的低所得者，在上海的生存空間逐漸消失。

這些出外賺錢的人與上海人之間，從十幾年前開始就存在著龐大的貧富差距。大約從二〇〇五年開始，我就會刻意去聽他們說話、觀察他們的生活，但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出外賺錢的人，從來不會羨慕上海人，也就是出生在都會地區的人們的生活，他們只是一群默默地做著自己眼前能做的工作，過著平淡生活的人而已。我從來不曾聽過他們哀嘆自己出生在農村的境遇、嫉妒都市人，或是抱怨自己的生活。

大概直到那一年，也就是二〇一四年的春天，我才開始感覺到他們態度上的轉變。雖然在出外賺錢的人之間，當然也存在著個人差異，不過一些像是「賺錢的都是老闆」或「這個社會為什麼這麼不公平」之類抱怨或嫉妒的言論卻明顯增加了。

連潤發夫妻也是如此，他們有個令人自豪的長子叫敬敬，當時在研究所學習環境工程，修讀碩士期間還優秀到受到國家南極觀測隊邀請。敬敬本來預計在隔年夏天結束碩士課程，而且直到那一年（二〇一四年）的春節，他跟雙親都還理所當然地在談論修讀博士課程的話題。

然而當我同一年秋天再度與他們見面時，潤發太太說的話卻不一樣了：「怎麼可能去念博士，必須早點讓他去工作才行。」她是家庭女傭，潤發先生一樣還在上海市中心的都更區從事體力勞動，但她說自從那年春天以來，她服務的家庭數已經稍微減少了。至於她先生那裡，提供工作機會的都更區也確實有愈來愈少的趨勢。

我知道他們之所以不曾抱怨或嫉妒，是因為從事的是自己可以接受的工作，而且付出也有相對的報酬。這些來上海賺錢的人們，對於生活的不安確實日益膨脹。

## 走投無路到連面子都不要的男人

搬家隔天，我請從事廢棄物回收業的鄭凱先生，帶我參觀他之前住過，但最近成為他的職場的都更區。我坐上他的電動三輪車車斗，在那附近一圈圈地徘徊，但騎到一半他突然越過肩膀對我說：「昨天的搬家費啊……」

「我們是朋友所以沒關係，但我昨天回去跟同事們講了以後，他們都說：『那樣未免也太便宜了。』」

我付給他的跟同年春天搬家時的金額一樣，也就是直接由他開價決定的價格。雖然他說：「我們是朋友，多少錢都可以。」但我好不容易說服他，他才開了那個價錢給我。然後同年秋天的搬家跟前一次比起來，移動距離雖然拉長了一些，但因為行李件數減少了，所以兩相抵銷之下，我以為這個價錢應該沒問題。

況且因為寶特瓶和廢紙的價格暴跌，所以我判斷維持相同金額對他來說，應該是相當不錯的條件了。他和一起來幫忙搬家的幾個朋友，午餐和晚餐也都由我包辦。然而，他卻暗示我「給得太少」。

所有關於中國商場的書籍，幾乎都一定會提到「中國人非常重視面子」，或「在中國做生意，朋友這類人際關係很重要」。這一點不見得是錯誤的，儘管金額的多寡一定也有影響，但他們的想法是朋友就要互相幫忙，彼此之間不要計較金錢。鄭凱先生嘴上說「我們是朋友」，卻明知會丟了面子，還是要透露出對於「錢太少」的不滿。看來他們已經被逼得走投無路了，彷彿是為了上海的秋天重見藍天所付出的代價。

## 二、鬼城

彷彿是與中國觀光客在日本「爆買」免治馬桶座或零食的報導等比例增加，大約從二〇一四年起，有件事情再度在日本的網路上受到矚目，那就是所謂的「鬼城」開始出現在中國各地。大抵上都是先由中國媒體報導某處的鬼城，然後日本媒體轉載，於是住在中國的人看到報導以後，實際前往報導中的鬼城，用照片拍下自己周圍的鬼城再上傳到部落格，以這樣的形式廣為流傳。

## 「爆買」背後增生的鬼城

雖說一概稱之為鬼城，但其中有像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那樣，據說最初開發目標是百萬都市，實際上卻只有三萬人居住，整座城市都是鬼城的地方，也有銷路不好的分售型公寓，或是沒有廠商也沒有客人、如同廢墟一般的購物中心或百貨公司等，報導的對象五花八門。這些報導的共通之處，應該就在於都是以「中國經濟沒問題嗎？」的疑問作結。

如前文提及的「再度受到矚目」，其實中國鬼城受到關注並不是第一次了。鄂爾多斯變成鬼城的言論始於二〇一〇年前後，同一年也傳出浙江省省會杭州郊外，有一處重現巴黎市景，甚至打造艾菲爾鐵塔的大規模分售地，完全成為鬼城的消息。

我當時也曾帶一位從日本來採訪這座「中國巴黎」城的攝影師前往當地，那裡看來確實是一座冷清的鬼城。在那座模仿巴黎公寓的城市裡，只看得到收垃圾的人，還有一片無人整理的荒涼土地，石頭與雜草遍布在裸露的土壤上，上頭孤然矗立著一座艾菲爾鐵塔，底下站著一對身穿白色婚紗與晨禮服的新人，正在拍攝紀念照的超現實畫面。

鬼城話題才剛在中國掀起熱議，我就同時在上海感受到「空置店鋪愈來愈多了」、「店裡的客人減少了」等不景氣的現象。然後媒體或市場上也熱絡地在談論中國經濟究竟會不會硬著陸？還是會在軟著陸下漸趨平穩呢？



## 亞洲金融風暴與雷曼兄弟事件

日本媒體的議論，從一開始就帶有先入為主偏見的部分，而且比想像中還多，彷彿期待著硬著陸的發生一樣，反映出近十年來的中日關係。因此，我開始對照自己本身在家計上的兩次硬著陸經驗，衡量是否「尚無大礙」或者「情況不妙」。

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間，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我當時居住的香港時的事。香港被英國歸還給中國後，為了展現香港將會愈來愈繁榮，從中國流入的金錢使得香港在回歸的一九九七年，無論股市或不動產市場都呈現活絡狀態，反映股價的恆生指數連日突破最高點。

然而，泰國貨幣在回歸後急貶所造成的影響，也波及到因投機貨幣流入而使股票或不動產攀升到超越實質水準的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創下歷史最高點（當時）一六六七三點的恆生指數，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十日跌至七九七九點，不到一年就大跌一半以上。不動產價格也在一九九七年秋天達到巔峰，一年後暴跌三十五—四〇%。

不玩股票也沒有不動產的我，當時並未實際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與我有何關聯。不過，記得大概在一九九七年底時吧，我在香港中環的金融街上，見到一名穿著高雅、渾身散發資產家氣息的中年婦人跪地磕頭乞討，那模樣令我深受衝擊。

她雖然穿著看似喀什米爾羊毛般柔軟又保暖的水藍色毛衣和米色羊毛長褲，但身上散發出一種，她所僅存的財產只剩身上那套衣服的感覺。她的損失應該不是靠乞討來的錢就能過得去的，不過看來她已經陷入走投無路的困境了。難道狀況已經迫切到，連看起來像達官貴人的太太、一點暴發戶氣息也沒有的女性，也必須在路上乞討的程度了嗎？真

是令人不寒而慄。

不久之後，我任職的出版社也因為廣告委託量遽減等原因，資金周轉不靈。經歷薪水遲發、部分媒體停刊，以及接二連三的裁員動作，也讓原先的三十名員工減少一半。不知為何我沒有成為裁員的對象，但我認為「這種不珍惜人的公司實在待不下去」，因此主動辭職成為自由業，卻又在不景氣之下，接不到任何工作，很快便捉襟見肘，過著坐吃山空的生活。

第二次是在二〇〇八年到二〇〇九年，雷曼兄弟事件爆發時。暫時返日的我，因故來到武藏野線的某座車站。那座城鎮有物流公司倉庫會雇用許多一日派遣工，而車站前面似乎成了派遣工的集合地點。很多人都穿著顏色不起眼的外套或工作服，但其中卻有穿著風衣與深色西裝的男性，外表看上去四十幾歲，無異於丸之內內的上班族。

是不是在雷曼兄弟事件影響下，遭到裁員的上班族呢？只見他獨自一人佇立在遠離人群之處，全身上下散發的氣息似乎在說這裡不是他該來的地方。「連正職員工也開始受到影響了嗎？這下嚴重了。」一想到這裡，內心就感到不寒而慄。咦？這是在重蹈覆轍吧，究竟是什麼時候呢？在我一邊思索的期間，日本出版社交給我的工作也大幅銳減。在目擊到那位貌似丸之內內上班族男性的兩個月後，我自己也來到那個車站前集合，以日雇派遣工的身分，在日本「出外賺錢」了幾個月。

## 公寓大廈林立的鬼城

如前文所述，從二〇一〇年以來，我有幾度感覺到上海有愈來愈多像廢墟的購物中心或住戶很少的公寓，並對於景氣似乎開始惡化有所警戒。不過我並沒有像經歷亞洲金融風暴或雷曼兄弟事件時那樣，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然而二〇一五年四月底時，我走訪了一處位於安徽省的鄉下城鎮，那座城鎮標準的鬼城樣貌還是多少令我不安。

那座鄉下城鎮就是安徽省的廣德縣，位在與浙江省的交界處。中國的縣是在市底下的行政區劃。人口有五十一萬，距離上海二百二十公里。縣府的官方網站上面強調，工業方面據說有許多機車零件與印刷電路板的企業，農業方面則素有「中國板栗之鄉」與「中國竹子之鄉」之稱。

只是無論工業或農業，都只是「有」那些產業的程度，例如竹林面積雖為全國第六，但板栗卻未提出具體數字，只說是全國數一數二知名而已。縣府網站特別強調，從廣德縣走高速公路不用兩個半小時，即可抵達上海、浙江省杭州、江蘇省南京、安徽省合肥這四省的省會，而且廣德縣還被評選為安徽省所有縣中「最具潛力的十縣」之一。換句話說，這無非就是表示目前沒有一個最具競爭力的產業。

況且就算到大都市的交通方便，充其量也只是「距離沒那麼遠」而已。事實上，從上海發車的國道巴士直達車也很少，我搭過的國道巴士甚至在確認過含我在內只有三名乘客要在廣德下車，便嫌棄地表明說：「在廣德下高速公路太浪費了。」最後直接在前一站的浙江省服務區，把我們三人「賣給」其他客運公司，然後就揚長而去了。

我想在那之前，我應該在中國搭過國道巴士超過百次以上，但被丟

在服務區還是前所未有的經驗。雖然中國人可能已經習慣這一套行事作風，但即使是語言相通的外國人都會嚇到，更何況是語言不通的人，恐怕只能舉手投降了吧。像那種連國道巴士都懶得跑一趟的城鎮，沒有太多企業願意進駐。當時的最低租金是九百三十元（新臺幣四千〇九十二元），雖然差不多是上海的一半，但根據當地人的說法，若與百貨公司或便利商店店員薪水相比的話，實質上大約是上海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已。

「沒人會買沒有資產價值的公寓。」

基於上述原因，廣德縣前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周邊大都市賺錢的人特別多。走在街上也覺得相當清閒，看不出哪裡有五十一萬人這麼多。當時的廣德縣正值老街翻新期間，城鎮中心殘存的農地也在重新整地，大舉建設全新的公寓，但空屋仍然隨處可見。

當時的市價是每平方公尺五千五百元（新臺幣二萬四千二百元）。即使是已開放入住兩年的公寓，從外面看起來感覺入住率平均也只有五成左右，比較少的地方甚至不到兩成。明明已開放入住的公寓都是如此了，周圍卻仍如火如荼地在建設數倍之多的公寓。

當時廣德規模最大的購物中心，即使是週六與週日也門可羅雀。雖說已經開幕一年半，進駐的廠商卻少到用寥寥無幾都不足以形容其慘況。商店雖然還是有一定數目，但放眼望去不是販賣板材、油漆、壁紙、水管設備等與房屋裝潢相關的店，就是理髮廳。前者不用說也知道，是看準建築商機而來，後者在中國則是可以在最短時間內用最少資金與技術開始投入的代表性行業。然後這些店裡也幾乎沒有客人。

有位三十幾歲的男性在三年前從上海搬到岳家所在的廣德居住，他說：「廣德的人也覺得，從最近全國的市價來看，價格並不會特別貴。只要出外賺到錢，並不是買不起的價格，但是因為出外賺錢的關係，平常都生活在其他大都市，所以買下的公寓必須出租給別人才行。在這方面，由於廣德沒有本地的產業，因此幾乎沒有租賃需求，再加上政府推動抑制房價的政策，未來恐怕也沒太多增值空間。也就是說，即使買了資產價值也不會提高，所以很少有人會想買那樣的公寓吧。」

我在中國幾個城市都看過與廣德差不多荒涼的城鎮或公寓，只是這

還是我第一次看到明明入住的人如此稀少，卻還是如火如荼地大量興建公寓的城市。

## 內需不振，推動亞投行與貨幣寬鬆

在二〇一五年當時，倘若只看中國觀光客在銀座或秋葉原爆買的現象，理所當然會產生「中國經濟哪需要擔心？」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中國之所以推動降息或降低存款準備率等接二連三的貨幣寬鬆政策，以及推動因為還在觀望參加與否而深受日本國內矚目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其目的在於企圖藉由刺激內需並向海外尋求賺錢的機會，來支撐失速漸趨明顯的經濟。這不免讓人擔心，在當時那個高度成長告終、低成長已成定局，亦即進入中國政府所謂的「新常態」時代下，像廣德那樣的城市持續以那樣的速度建造公寓，最後是不是會變成真正的鬼城呢？

不過另一方面，有一個理由讓當時的我，即使已經預期到這座城鎮的鬼城面貌，也尚未被不寒而慄的感覺襲擊。此外，比起我在上海感覺到的，事實上我反而比較擔心中國整體的狀況是不是很糟糕。因此，我決定在五年後前往鬼城界中堪稱廣德前輩的「中國巴黎」，瞧一瞧它現在的模樣。

號稱中國巴黎的「天都城」這塊分售地，位於杭州市的郊外。杭州是中國數一數二富裕的城市，二〇一五年的人均GDP是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六美元，比上海的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七美元還高。只是中國的巴黎位在距離杭州市中心二十公里遠的山間農村，直達的交通工具只有市公車而已。

經手此地的開發商在二〇〇一年開始開發，目標是在這塊七千畝（約四百六十七公頃），也就是相當於一百座東京巨蛋大的土地上，於十年內打造出十萬人口的都市，並以放射狀環繞的方式建造公寓，中心

則是仿造艾菲爾鐵塔而建的鐵塔。但根據中國媒體在二〇一五年年初的報導，經過十五年以後，當地人口才四萬人左右，不及目標的一半。

時隔五年再訪中國巴黎，那裡依舊像是一座鬼城。白色石灰牆面沿著中央大道而建的一幢幢公寓，一樓部分全都用來當作店面，但廠商入駐率連一成也不到。住宅入住率方面，那些白牆公寓大約也只有三成吧。主要通道上鋪滿石板與草皮，還有幾處噴水池和廣場，但帶著小孩的老人卻零零星星。就算以平日上午來說，也感覺不太出來有人居住的氣息，幾乎讓人懷疑媒體所報導的四萬人，是否只是轉載業者公布的數字而已。



## 中國巴黎

另一方面，與五年前不同的是，後來新蓋的公寓又多了數十幢。但即使是開放入住第二年的公寓，入住率乍看之下也僅止於五成而已，不算太高的數字。而且周圍還有一批新的公寓正在建設中。五年前還是荒地的艾菲爾鐵塔底下，也正好開始打造地基了。明明現有的公寓入住率很低，卻還是大舉興建新公寓，這一點與廣德一模一樣。

於是我直接拜訪當地的房地產仲介，請對方帶我看了兩間看得到艾菲爾鐵塔的房子。兩間都是一百三十平方公尺的三房兩廳，價格是九十萬元（新臺幣三百九十六萬元）。中國的公寓不含內部裝潢，因此費用另計，雖然視浴缸或家具等級不定，但要確保最低限度的生活品質，至少要十五萬元（新臺幣六十六萬元）左右，總計大約是日幣二千萬圓（新臺幣五百四十萬元）。據說平均下來的還款金額是頭期款二十五萬元（新臺幣一百一十萬元），最長貸款三十年，每月還款三千多元（新臺幣一萬三千二百元）。

我詢問，入住率舊一點的大概不到三成，這五年新蓋的不到六成是嗎？結果對方回答：「嗯，差不多是那樣，只是鬼城這個汙名使價格上漲程度比其他地區低，所以用買或租的都划算，消息傳開之後，也有愈來愈多上班族住在這裡，靠著汽車或公車通勤到杭州的市區。」

這間全店只有四位業務員的房地產仲介商，前一年的成交件數約為每月平均十五件，但今年似乎增加到十八至二十件左右。順帶一提，如果要承租他們介紹的那種房子，每月租金是一千元（新臺幣四千四百元）。停車場裡的汽車大多是現代汽車的Sonata、Elantra、本田的Fit、City，或別克的Excelle等日幣二百萬（新臺幣五十四萬元）左右的車。

## 缺乏活力的建設潮

帶我看屋的房仲是一名二十一歲的男孩，他在同屬浙江省的象山這座沿海城鎮讀完專科學校後，便來這座城市工作。他說他的老家是農家。我問，你將來也會在這個中國巴黎買房子嗎？

「因為我以後想在這裡或杭州工作，所以平常應該會住在這裡，但買房的話還是會買在故鄉的老家附近吧。從中國鄉下來的人都是這樣，要結婚時就在老家附近買房。這個中國巴黎也有很多地方農家出身的人，平常在上海或北京工作，但趁著結婚就在故鄉買房子。」他說。

沒錯，在中國被稱為鬼城的公寓，尤其是地方上的建案，入住率與成交率差異甚大的情況並不在少數。在這個中國巴黎也是，聽說入住率即使只有五成，成交率卻在七成上下，其中有幾幢甚至超過八成。換句話說，即便外觀看上去無異於鬼城，但很多時候實際銷售情形卻比看起來好很多。背後的原因也與近年來的結婚情形有關，即使是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只要兒子娶媳婦，就算不買公寓，至少也得花十五萬到二十萬元（新臺幣六十六萬元到八十八萬元）重新裝潢家裡，否則沒人願意嫁。

以廣德這個沒有地方產業，通勤圈內也沒有工作缺口的城鎮來說，事態恐怕比中國巴黎還嚴重吧。不過，在農村結婚情形的背景下，廣德一樣有成交率高於入住率的現象。如火如荼建設新公寓的原因之一，或許也是考量到有這方面的需求吧。我見到廣德的鬼城卻並未感到不寒而慄，是因為我在上海聽過農村出身的朋友談論此事，多少知道那裡並沒有外觀看起來那麼像鬼城。無論是中國巴黎或廣德，我都無法從兩地的城鎮或人群身上，感覺到「擔心房子或東西賣不掉」的焦躁感或悲愴

感。

但即使如此，這一年在看過兩座鬼城後，我確實比之前更加懷疑，明明高度成長期已經結束了，這樣真的沒問題嗎？因為儘管兩座鬼城都在如火如荼地興建公寓，密集程度用「建設潮」來形容也不為過，但不管哪裡都完全感受不到活力或朝氣，那想必是因為刻意創造出來的需求超過實際需求所致。

## 經濟繁榮的倦怠感

即使如此，中國巴黎無論在城鎮或居民身上，都還散發出一種明快感，因為此地作為經濟繁榮的杭州臥城，至少有一群人有從這裡通勤的需求。而反觀廣德，無論城鎮或居民，都散發出一種濃厚的倦怠感。

前文介紹的那位住在廣德的男性說：「在廣德這裡，雖然也不可能過得多奢侈，但只要一個月有二千元（新臺幣八千八百元），就可以在市中心租公寓，維持基本的生活。如果是沒有租屋需求的農家，更是不需要花什麼錢。中國以前雖然以一胎化為原則，但鄉下農村生兩胎以上是正常的。如果把孩子都送去都市工作，讓兩個孩子供養的話，父母不工作也能得以維生。廣德也有愈來愈多人，差不多才四十歲就靠著孩子提供生活費，一天到晚在打麻將。」

不把心思花在孩子的教育上，只想著盡早讓他們賺錢養家，才初中畢業就送去外地工作，自己則在壯年時期就辭職在家吃喝玩樂，那樣的大人如果在鄉下農村不斷增生，那麼當孩子結婚時，當然不可能有存款可以買公寓或重新裝潢家裡。假如這樣的人日益增加，四處興建的公寓又會面臨什麼下場呢？

如今即使是內陸的農村地區，真正「無以為繼」的人也只剩下極少數了。但在像廣德那樣的城鎮，卻毫無「終將得以為繼」的展望。既然如此，與其繼續工作或讀書，不如不要工作，整天打麻將或玩股票還比較好。這種念頭或許就是倦怠感的來源吧。雖然倦怠感是種虛無縹緲的概念，但我認為那也是不能忽視的一面。

### 三、單親媽媽的煩惱

二〇一五年秋天，中國確定廢除自一九七九年實施的一胎化政策。雖然在二〇一三年已經先執行只要夫妻中的任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有第二個孩子的逐步開放政策，但現在則是任何夫妻都獲准生育二胎。

關於政策遭到廢除的理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十月公布此消息後，日本各家媒體也隨即對此提出說明。在少子高齡化急速進展的情況下，對於社會保障的焦慮，還有解決年輕勞動力的問題，主要的分析可說是集中在這兩點上。

對於中國當局的決定，也有許多人以為時已晚、事到如今無法解決根本性問題等理由加以批判，例如：「現在才開放二胎，但要解決勞動力不足或年金財源不足，需要幾十年才能發揮效果」、「那只是基於經濟上的理由決定廢除，而不是針對一胎化政策所製造出的許多沒有戶籍的孩子或人工流產等，人道層面上的負面問題進行反省」等等。

但是當我親眼見到一些年輕的朋友，尤其許多都是內陸農村出身的人，在一胎化政策的影響下，因為生孩子而遭到公然指責，或是為了取得孩子戶籍而煩惱憂愁、四處奔走的模樣之後，對於因為違反政策而無法取得「戶口」（戶籍）的孩子，光是經過確認的部分就有一千二百萬人（二〇一〇年人口普查的資料）之多的悲劇，能在廢除政策之後確實有所減少這一點上面，我認為理應無條件贊成才是。

## 身為單親媽媽卻不能有小孩的矛盾

受到一胎化政策影響的人，並不是只有「夫妻」而已。

在中國，無論是一胎化政策或二孩政策，只有正式結婚的夫妻才能夠替孩子報戶口。

單親媽媽有小孩這件事，即使在一胎化政策廢除後，依然違反二孩政策，也就是「計畫生育」的政策，因此孩子不能夠登記戶籍。

沒有戶籍的話，連學校也不能去。雖然沒有說禁止去醫院，但醫療費用卻必須全額自付。此外，近年來中國不僅搭飛機如此，連搭高速鐵路或國道巴士都有實名登錄的義務，必須在購買車票時出示身分證，但沒有戶籍就不會發行身分證，沒身分證就無法搭乘交通工具，所以連移動都無法，是名副其實動彈不得的人生。

中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亦即無婚姻關係之男女所生的孩子，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不過在《人口與計畫生育法》第十八條中提到，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條件的夫妻可以再生育第二個子女，但同法第四十一條卻規定，不符合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扶養費」，簡單來說就是「罰款」。

換言之，在以往的一胎化政策下，生育第二胎的夫妻一樣不能登記孩子的戶籍，雖然繳納罰款即可替孩子取得戶籍，但若拒絕支付就無法取得戶籍。

另一方面，單親媽媽因為沒有結婚就生育子女，這項行為本身即違反計畫生育的政策，所以即使是第一胎也得繳納罰金，否則孩子的戶籍將不予承認。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違反一胎化政策下出生的，她長大以後成為單親媽媽生下孩子，也為了取得女兒的戶籍四處奔走。她就是在廣東料理店對我說出「你每次都吃一樣的嘛」而從此與我聊起來的喬女士。在一胎化政策宣告落幕的現在，我想藉由書寫她這位堪稱此政策最佳範例的故事，緬懷一下在這項政策的時代下活過三十五年的中國人的人生。

## 住在野狗吠叫的廢墟中的母女

二〇一五年十月，我從上海市中心往北搭乘一個多小時的地鐵，來到位於浦江鎮的車站。穿過二〇一五年夏天才剛在站前精華地帶開幕的購物中心，與周圍正在開發的分售型公寓，來到一處被巍然矗立的水泥高牆圍起來的地方。穿過牆間勉強可供一人通行的縫隙後，眼前看到的又是另一座城鎮。

如今在那條看似這個城鎮舊日主街的小路上，幾乎不見任何人影。路旁的商店已全部歇業，只有一個架著紅色頂棚的攤販。在堆積如山的瓦礫前方，佇立著一整排亡靈般的社區樓房，而且窗戶上幾乎都沒有玻璃。這裡感覺不到什麼有人居住的氣息，更甚者，恐怕不管是誰見到這座廢墟，都不會認為這裡能住人吧。

一隻徘徊在社區樓房前面的野狗見到我的身影，便發狂似地吠叫。我不禁停下腳步。這個城鎮有許多野狗，大概是以前住在這裡的人撤離時遺棄的吧。其中恐怕沒有一隻狗打過狂犬病的疫苗，因為會給狗打疫苗的飼主，肯定不會將其棄之於不顧。我來這裡少說也有十次了，但每次都覺得野狗很可怕。

雖然野狗沒有靠近我，卻還是一直對我狂吠，我一邊張望一邊從口袋裡掏出手機，撥了通電話。沒多久，有個人影從野狗坐鎮的其中一幢房的樓梯間走了出來。野狗認出熟悉的身影，立刻停止吠叫，甚至搖起尾巴來了。喬女士一邊摸著野狗的頭，一邊對我招手說：「牠跟這裡的居民在一起時不會亂叫，你放心吧。好了，快上來吧。」我這才小心翼翼地經過野狗，隨她上樓。



## 無法洗澡、蓬頭垢面的三歲小孩

喬女士生於一九八〇年，今年三十五歲。她來自安徽省的農村，老家也是農家。

喬女士與三歲的女兒琳琳，還有特地從鄉下來這裡照顧孫女的母親，三人一起住在這個廢棄社區的其中一戶。她沒有丈夫，喬女士是以單親媽媽身分生下琳琳的。

她們與一對二十幾歲的夫妻共用兩房兩廳的空間，那對夫妻也是從內陸貧困省之一的貴州省來外地賺錢，那裡經常被拿來與安徽省相提並論。兩家人分別擁有一間四坪左右的寢室，客廳、廚房與浴廁則是共用的。值得慶幸的是，窗戶上有玻璃，也有沖水式馬桶，還可以用桶裝瓦斯煮飯燒菜。不過熱水器不出熱水，也沒有蓮蓬頭或浴缸等入浴設備。

在嚴冬時期氣溫也會降至零度以下的上海，面對即將到來的冬天，家裡有一個新陳代謝旺盛的三歲女兒，沒有熱水的生活實在很棘手。

「叔叔好。」琳琳邊說邊從房間走出客廳，我摸了摸她的頭。春夏秋冬，無論哪個季節，她永遠蓬頭垢面，應該是因為很少洗澡的關係吧。

即使如此，這個家裡唯一能賺錢的喬女士每月能拿出的租金，含雜費在內最多只有五百元（新臺幣二千二百元）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她如今在上海唯一的選擇，只剩下離開市中心，違法居住在確定將拆除的都更廢墟裡了。原先的居民談完補償事宜，大部分都撤離以後，原本的房東就將這些正在等待工程開始的建築，違法出租給像喬女士這種需要便宜租賃住宅的人。

所以自從成為單親媽媽以後，她就專挑廢墟居住，輾轉流連在工廠二樓的倉庫或無人居住的廢棄社區之間。

## 不管幾歲都領最低薪資

喬女士高中畢業後，在安徽省省會合肥就讀製造業專科學校，畢業後前往深圳經濟特區的電子機械工廠工作，其後遷至上海，陸續從事過服務生、辦公家具業務等工作。

我問她為何開始從事與學校專業不同的職業，她說：「因為我明明是製造業專科學校畢業的，領的薪水卻沒比最低薪資高多少，而且看那些做了好幾年的前輩，他們的薪水也幾乎調不上去。感覺以前學的全都派不上用場，實在既可悲又愚蠢。當初念製造業的學校是我父親建議的，但因為他一直待在家裡務農，根本不知道該讓女兒念什麼才好，可能是在哪聽到中國是『世界工廠』，所以製造業前景看好之類的傳聞，才会有這種誤解吧。不過我也不恨我父親啦，那個年代的農村不只我家這樣，其他人的認知也都差不多是這種程度。」

過去一年來，她在ASUS製造工廠上班，從家裡騎腳踏車過去大約三十分鐘。她被分配到生產線上，等於倒退回剛出社會第一年的十年之前。專值夜班的她，從晚上八點開始連續工作十二小時到早上八點，每月薪水接近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雖然比剛從專科學校畢業馬上投入職場的工廠時代多四倍，但如今連剛從學校出來的十八歲新人也是領同樣的薪水。「這讓我再度意識到，作業員不管做多久都是作業員，而且幾乎所有人一輩子都領最低薪資。」

然而這一年的夏天，喬女士的母親跌倒受傷，慣用手的手臂肌肉斷裂，所以別說是照顧孫女了，連一件家事都做不來。喬女士不得不辭去工廠的工作，一邊照顧老小，一邊趁著空檔去有錢人家裡做家庭女傭。報酬雖然是半天一百元（新臺幣四百四十元），但只有週末才找得到工

作，這兩個月來的月收入還不到五百元（新臺幣二千二百元）。

儘管單身時期的收入總是沒比最低薪資高多少，但至少當時的生活過得比現在好。雖然都住在公司宿舍或與朋友合租，但也不至於需要住在廢墟裡。

## 單親媽媽的懲罰

喬女士的生活一夕之間陷入困境，是從她以單親媽媽身分生下女兒的那一刻開始。

一個女人家獨自負擔全家三人的生活費，當然很辛苦，只是不管怎樣辛苦，生活費總可以設法節約，但另一項無法節約的負擔，對喬女士來說才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就是前文提過的，未婚生子必須繳納的「社會扶養費」。

「對方拒絕結婚，叫我做人工流產，還說就算生下來也不會承認是他的孩子。」

二〇一二年，懷孕三個月的喬女士與我商議此事，我聽到對方是出身上海的公務員，就不斷試著說服她，說我非常理解她的心情，但最好還是放棄生產這件事。

當時，某家由《日本經濟新聞》對旅居海外讀者推出專欄的媒體，委託我在專欄中介紹以上海為背景的電影，而且必須是過去十五年間拍攝的作品。因此我利用網路搜尋，也翻遍各種DVD，終於找到幾部符合的電影，但令人驚訝與厭倦的是，許多電影拍攝的主題，都是一方因為家世或身分不同，結婚遭到反對，為了把家族擺在個人前面，所以提出分手，女主角則因此自殺或發瘋。

其中關於《半生緣》（導演許鞍華，一九九七年）這部電影，我在專欄的開頭這樣寫道：「故事本身以現代中國也層出不窮的主題為主軸，描述為了『家族』放棄『個人』人生的男男女女的人生。在這部電影當中，包含主角的朋友在內，沒有一個人選擇與自己心愛的對象結婚。片中姊姊用形同暴行的計畫讓妹妹懷孕生子，對於那背後令人為之

顛慄的動機，連親生母親都視而不見，只說：『是為了留下家族的血脈。』」（《日經GALLERY》，二〇一二年十一月號）

正如這段文字所述，這部電影所拍攝的上海人重視「身分、背景的差異」與「家族優先於個人」的觀念，並不是今不復見的陳弊，基本上現在的上海父母依舊認為孩子最好可以與上海人結婚，而聽從父母意見的孩子也不在少數。

據說喬女士也遭到對方的姊姊怒斥：「我們家怎麼可能會讓弟弟跟那種安徽來的鄉下姑娘結婚。」但聽說交往期間比較想結婚的其實是對方，儘管這完全是喬女士的說法，可是就像前文提到的電影一樣，一旦到了要奉子成婚的那一刻，男方恐怕是在家族的反對下，最終選擇家族而拋棄個人了吧。

## 不平等的罰款

喬女士生下了孩子。之後她提起訴訟，成功讓男方承認孩子是他的，並每月支付一千二百元（新臺幣五千二百八十元）扶養費。雖然琳琳的父親是誰、母親是誰，都已經得到公家機關的承認了，但那個時候的琳琳仍然沒有戶籍。正如前文提到的，這是因為政策上規定只有已婚夫妻才能生育子女。為了取得戶籍，必須支付一筆社會扶養費，也就是罰款。

這筆罰款的金額並沒有統一規定是多少，而且不同地區的金額也不一樣。喬女士的情況又是如何決定金額的呢？

首先，必須向喬女士戶籍所在的安徽省當地政府單位，申請登錄孩子的戶籍。然後負責的官員會走一趟她的老家，去「評估」一下「收入狀況如何」，也就是到府盤算一下她付得出多少錢。

最後，對方提出的金額是六萬元（新臺幣二十六萬四千元）。喬女士雖然聯絡了琳琳的父親，但對方毫不配合，自始至終沒有付錢的打算。喬女士一家人掏空家財，還在外面借了一些錢，才付掉這筆罰款。她當時一度成為名副其實的身無分文之人。到了二〇一五年時，她的女兒琳琳已經三歲了。

雖然都市出身者很少這樣，但農村或從農村到都市賺錢的年輕人，在法定年齡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之前結婚生子，並在雙方達到法定年齡後辦理結婚登記的情形並不少見。這算是所謂的事實婚，不過因為也會舉辦婚宴，所以與日本的事實婚稍有不同。

但無論如何，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這對夫妻的孩子還是得到結婚登記時才有戶籍。然後因為在結婚之前生孩子違反了一胎化政策，所以這

種時候也必須支付罰款。也就是說，科處罰款的理由與單親媽媽無異。

用優衣庫的紅色羽絨外套代替婚紗舉辦婚宴的長順夫婦，同樣也是安徽省農村出身、在結婚登記之前就生小孩的情侶。他們在年紀較小的妻子到達法定年齡的二〇一五年支付罰款後，取得了孩子的戶籍，但一問之下才知道，罰款的金額只有二千元（新臺幣八千八百元），是喬女士支付金額的三十分之一。

長順老家的資產狀況，是不是喬女士老家的三十分之一呢？絕非如此。雙方的老家我都去過，但經過我像中國官員那樣「評估」他們的家，並從他們的言談中分析，兩家的資產狀況相去不遠。雖然在戶籍地以外的收入似乎與取得孩子戶籍無關，但因為長順夫妻同在上海全職工作，所以若以家庭收入來說，反而是比較年輕的他們賺得比較多。

那為何會出現這樣的金額差異呢？答案是，因為年輕的長順家裡有人認識當地官員，而喬女士沒有。

這就是唯一的理由。

## 違反一胎化的母女

喬女士的家族已經不是第一次因為違反一胎化政策而支付罰款了。除了琳琳之外，從那一年開始倒推回三十五年前，喬女士身為第三胎的么女，她的父母也在她出生時付了一筆罰款。

喬女士出生於一九八〇年，那是一胎化政策正式執行的第二年。已經有兩個男孩的喬家知道，再生第三胎就會違反政策。喬女士的母親雖然有刻意服用當局分配的避孕藥，卻還是懷上了喬女士。

當時政策才剛執行不久，大力推動的地方當局不允許生產，喬女士的母親與其他幾名違反政策懷上身孕的孕婦，在村內長官率領下，前往鎮上的大醫院接受人工流產手術。然而，負責動手術的醫師說沒辦法準時抵達，喬女士的母親因為放兩個小孩單獨在家，必須回去照顧孩子，便交代說自己會在醫師抵達的時間之前回來，先暫時回家一趟。沒想到醫師回來的時間比預定時間早了許多，並在完成其他孕婦的手術之後就回家了，喬女士的母親因此沒能順利接受手術。

由於之後要做人工流產為時已晚，因此喬媽媽生下喬女士，並繳了二百元的罰款。據說當時縣長一個月月薪才七十五元，他們只好借錢來支付罰款。

只是在那個年代，並不是支付罰款即可息事寧人。違反一胎化政策生下喬女士的喬家雙親，還被當地的廣播節目指名道姓提出來批評。

喬女士說：「媽媽每次提到我出生時的事，就會笑稱我是『避孕藥生出來的女兒』。」我想喬媽媽當然沒有惡意，喬女士自己也以玩笑帶過，不過以母女之間的對話來說，這不免令人覺得既荒謬又悲哀。

中國導入一胎化政策至今三十五年，說過這種話的親子恐怕不只他



們而已，而且應該全中國上下都有父母因為生孩子而被廣播點名批判吧。儘管當初是為了解決糧食短缺等問題，但不能否認的是，一胎化政策確實是個相當扭曲的制度。

不但出生時遭到廣播批判，也沒有交情好的官員可以通融，讓他們取得戶籍這種理所當然的權利，最終可以依賴的只有家人而已。喬女士之所以決定以單親媽媽身分生下孩子，或許是想讓世上多一個自己的親骨肉吧。

在中國廢除一胎化政策的同時，人們也開始討論是否應該承認單親媽媽所生的孩子。衷心期望這個問題早日納入正式議題，不要再有第二個孩子面臨像琳琳一樣可憐的遭遇。

## 訪日爆買與轉手出售

最後我想聊一聊琳琳取得戶籍那年夏天，我所見到的這對母女。

當時我的家人從日本來上海，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該送什麼伴手禮給琳琳，最後考量到她才剛滿三歲，又是女孩子，應該送她莉卡娃娃比較合適。

我們在琳琳最愛的餐廳薩莉亞用餐，並連同袋子一起將莉卡娃娃遞給她。她好奇地把手伸進袋子裡，取出裝在透明盒子裡的莉卡娃娃，表情瞬間一亮。太好了，她好像很高興。我與家人相視而笑。

結果坐在旁邊的喬女士開口了：

「不行，要等到回家才能開，不然盒子會壞掉吧。我說不行了，盒子會壞掉！」

她的語氣強硬，還從琳琳手中奪走裝著莉卡娃娃的盒子。

我與家人面面相覷，無法理解她何故如此。

我可以理解為何要回家再開，但我不明白為何要一再強調「盒子會壞掉吧」。

這時，我腦中想起一件事。

雖然訪日中國遊客爆買的新聞已報導好一陣子，但那些人在日本買的東西，並不是全都拿來自用或當伴手禮送給朋友、親戚、同事等熟人，其中也有不少人的目的是買回中國轉手出售。例如在阿里巴巴拍賣網站上，有許多賣家販售看似在日本爆買之旅中採購回來的電鍋或免治馬桶座，最近甚至連小學生的書包都有。我自己也有一些平常沒機會去日本的中國朋友，請我回日本時順便幫他們買東西。

二〇一五年秋天，我以農村地區為中心，前往安徽省旅行了十天左

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在飯店裡、共乘計程車上，或是在朋友家，一旦有人知道我是日本人，十之八九一定會問：「最近有超多中國人去日本旅行對吧？聽說他們都會買馬桶座或電鍋？真有意思。」

當時已經與我相識長達十二年以上的喬女士，從未拜託我在回日本時幫她買些什麼，只是在訪日爆買的新聞或資訊隨處可見的情況下，喬女士會聽聞有關轉賣日本採購來的東西的消息，實在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不，或許知道才是正常的吧。因為母親身受重傷而辭去工作，如今沒有收入的她，即使想在網路上賣掉最近聽說很受歡迎的日本產品，以多少填補一些家計，也十分情有可原。

## 可憐的莉卡娃娃

從安徽省旅行回來後，我為了聊一聊安徽省的事，走訪了一趟喬女士的家。好奇兩個月前送的莉卡娃娃還在不在的我，忙著用眼睛搜尋它的下落，結果莉卡娃娃就在地上的玩具箱裡。究竟是敗給琳琳的哭鬧不休呢？還是從一開始就不打算轉賣出去？我不知道答案。但總而言之，莉卡娃娃身上已經有點汙漬，不太可能再轉賣出去了。喬女士一再叮嚀要好好維護的外盒，也完全不見蹤影了。

琳琳從這一年的九月開始上幼稚園。幼稚園一年的學費是五千六百元（新臺幣二萬四千六百四十元），雖然已經繳了半年份，但喬媽媽的手術也花了五千元（新臺幣二萬二千元），喬女士有點擔心剩下的半年份付不付得出來。

我拿起莉卡娃娃，問琳琳說：「妳喜不喜歡這個娃娃呢？」只見她專注地讀著繪本，嘴裡答道：「喜歡啊。」卻看也不看我或莉卡娃娃一眼。喬女士聽著女兒的回答，臉上露出一抹寂寞的微笑。

喬女士說要送我出來，我們一起走出了公寓。她指了指入口階梯旁的地面說：「那個是我種的。」為了填補微薄的收入，她開始栽種白蘿蔔與花椰菜。只是在菜園前方不遠處，散落著一地從拆除現場丟出來的廢棄材料或垃圾。這樣不會污染到嗎？我心裡想著，卻默不作聲。

### 第三章 | 異變

農戶家中貼的習近平夫妻的海報。(2016年，安徽)



## 一、遊民老闆

上海的人口在二〇一四年底當時，是二千四百二十五萬人。若包含市郊在內，整體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三千六百人，但市中心人口最多的虹口區，則多達每平方公里三萬六千人，其他還有三個超過三萬人的區域。同一年，東京人口密度最高的豐島區是二萬一千人，二十三區平均是一萬四千人，由此可知上海的人口有多稠密。雖然每當大型連假或跨年時，上海也有很多市民會去國內外旅行，但同一時間，中國其他省市的觀光客也會湧入上海，因此一年到頭都是來往的人潮。

上海歷年來五月底到六月中旬人潮較不擁擠，以二十四節氣來說即為芒種的時候，因為從安徽省、河南省等地來上海賺錢的農民工，會暫時返鄉收割小麥。

二〇一五年五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我看著月曆突然驚覺，竟然已經要六月了，而且六月六日就是芒種。真是粗心大意，明明約了做廢棄物回收的鄭凱夫妻，說要在鄭太太回河南省老家割麥之前一起吃頓飯的。平常像立春、春分、大寒等日本一般生活中也很熟悉的節氣，我多少會記得大概是什麼時候，但因為我沒有務農，所以一不小心就忘了芒種這日子。

我急忙趕到鄭凱夫妻倆平日劃為據點的都更地區。

當我趕到鄭凱先生的據點時，見到他獨自一人在人行道上，面前鋪著一張藍布，上面擺著一堆破銅爛鐵，正在向路過的行人叫賣。奇怪的是，以往他回收的東西都專門賣給業者，應該不曾親自在路邊叫賣才對。

## 無家可歸的朋友

我向他打了聲招呼後，果然，他太太已經回河南老家去割麥了。原來已經錯過了啊？真抱歉，明明是我約的。我問鄭凱何時有空，想說至少約他一人也好，結果他十分在意地點，直問：「可以是，是去餐廳吧？你打算去哪裡？那裡都是什麼樣的客人？」我以為他可能是因為我要請客而有所顧慮，或是因為不能吃辣所以不想吃四川料理或湖南料理，於是我告訴他，是最近剛開的東北料理，聽說便宜又好吃喔，結果他低聲說道：「呃，是新開的店喔？可是我沒有洗澡耶。」

什麼嘛，原來他在意的是這個啊。我哈哈大笑說，一天沒洗澡沒關係啦，不會臭到讓旁邊的人發現的，我自己上星期才因為突如其來的漏水工程，整整一星期都沒洗澡哩，既然這樣你就先收攤回家，洗好澡再來，我會等你的。

鄭凱完全沒有如我預期那般，開玩笑地說出「你竟然一星期沒洗澡？別靠近我！」之類的話，反而毫無笑意地說道：

「我沒有家可以回去洗澡了。」

「咦？你家的浴室也壞了嗎？」我確認道。

「不是，我沒有家了，最近我都睡在這裡。」

鄭凱先生一邊說著一邊轉過頭去，視線前方是利用公寓圍籬搭建在路上的帳篷，以及從縫隙間探出頭來的愛犬冬冬。

才一個多月不見，他竟然一夕之間成了露宿街頭的遊民。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有朋友變成遊民。我想說些什麼，卻找不到適當的回應，一切都太令人震驚了。

## 廢棄物回收業的困窘

鄭凱先生趁著沒有客人的空檔，斷斷續續告訴我他露宿街頭的來龍去脈。

在河南老家度過二〇一五年春節的鄭凱先生，因為希望增加人手來補貼家用，所以三月便帶著從未到都市賺過錢的妻子回到上海。然而，廢棄物的價格變得比過年前還要廉價，明明在過去一年內，寶特瓶、廢紙、鐵屑和木板的價格，才全都暴跌至原來的三分之一，過完春節之後竟然又下跌了五成。包含房租在內，如果要與太太兩人在上海生活，再怎麼省吃儉用一天也得花掉一百元（新臺幣四百四十元）。可是那一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的收支，沒有一次是盈餘。最後他們付不出每月更新合約的套房月租一千七百元（新臺幣七千四百八十元），所以才決定住在街頭。

鄭凱先生回去河南省就有房子和田地，只是就算待在河南也沒有工作，無法養活一家人。田地雖然半年種小麥、半年種玉米，但全年加起來的收入只有五千元（新臺幣二萬二千元）而已。所以他從二十年前結婚以來，一直都以出外賺錢的方式，供養家裡的妻子與兩名孩子。



## 出生地是癌症高發地區

鄭凱先生出生在安徽省與江蘇省交界附近的農村地區，附近不遠處的周口市還曾在距今大約十二年前，因為許多人罹患癌症而以「癌症村」聞名。之所以有許多人罹患癌症，據說是因為流經河南省的淮河遭到工業排放廢水污染所致。

「我出生的那座村子，小時候只要挖六公尺深的井，就有足夠的水可以喝了，但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我們發現那裡已經被污染了。現在就算挖三百公尺深，也挖不到可以喝的水，所以現在全村都用自來水喔。」

童年時期的鄭凱就生活在那樣的村子裡，不時還得幫忙家裡照顧牛隻，雖然小學時期的他成績優異，據說每到期末考還會獲得表揚，但自從升上初中以後，開始「大玩特玩」，荒廢課業，成績也一落千丈。我問他，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河南省農村初中生，究竟是玩些什麼才荒廢課業的呢？他說：「就丟擲銅板猜是正面反面，還有打排球之類的吧。」聽起來十分健全。

## 失落世代的生存選擇

初中畢業後，鄭凱先生「因為周圍的人都這樣」，所以沒去上高中，留在家裡幫忙農活。後來他在二十一歲結婚，第一份外地工作是在山西省一座叫晉城的城市，與親戚兩人一起投入支解牛隻的行業。先向農家或仲介購買牛隻，再進行屠宰、支解、剝皮，把肉拿到市場上賣。量多時一天會處理到兩頭。

「通常都是由我的親戚先抓住牛尾巴，等到牠不動的時候，我再用鐵鎚往牠的眉心一敲，讓牠一命嗚呼。你問我不會害怕嗎？因為就算我回鄉下也沒有工作，所以一旦害怕就養不活一家大小了。要不就留在鄉下成天吃地面長出來的東西，要不就到外地靠殺牛活下去，我也只能二選一了。」

鄭凱先生出生於一九七四年，以日本來說，就是在泡沫崩壞後「失落的十年」期間出社會的人，亦即所謂「失落的世代」。失落的世代在就職冰河期、雷曼兄弟事件、貧窮與貧富差距擴大等狀況下，度過了嚴峻的青年時期。即使是日本的失落的世代，是否也會覺得鄭凱先生這些出生在中國農村的相同世代之人，他們所度過的青少年時期與能做出的選擇之少，實在令人感到恐懼嗎？

由於牛肉生意每月可賺三百元（新臺幣一千三百二十元），收入比在工廠工作還要好，因此他感到心滿意足。只是在那之後，政府限制了牛隻的支解處理，個體戶無法任意進行，因此短短三年就被迫轉換跑道的他，來到上海投靠親戚。此後直到二〇一五年為止的十七年間，他都一直在做廢棄物回收。雖然生活向來不輕鬆，但過去從未陷入必須露宿街頭窘境。「雖然廢棄物價格暴跌的影響也很大，但最棘手的還是因

為都更的推動，使得市中心再也租不到五百元（新臺幣二千二百元）左右的便宜公寓了。」他說。

## 我喜歡廢棄物回收的工作

我問鄭凱先生為什麼決定在路邊販賣以前沒賣過的破銅爛鐵，他說：「很簡單啊，因為這比賣寶特瓶好賺。」攤位上擺出來的是開瓶器、鍋蓋、指甲剪、休閒鞋、襪子、原子筆、指甲油、有點髒的粉餅、用過的乾電池，還有也是用過的口紅膠等等，真的淨是一些破銅爛鐵。他以一元（新臺幣四．四元）均一價販賣這些東西。我仔細端詳了一番，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是我可以買的，結果我來回看了四、五遍，怎麼看都沒有一樣是我想要的東西。然而，路過的行人大概以每十分鐘一人的速度掏錢光顧。最受矚目的商品是東芝的冰箱，價格說是二百元（新臺幣八百八十元）。

這些東西恐怕全是撿來的，沒有花費到任何成本吧。但就算從早上八點持續賣到晚上八點，以每十分鐘一人的速度來說，一天也只有七十二元（新臺幣三百一十七元）。即使三臺冰箱全數售出，整月下來也不過二千七百多元（新臺幣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元）。這樣還是達不到鄭凱先生說的夫妻二人在上海租公寓的最低生活費三千元（新臺幣一萬三千二百元）。他們還有個初中三年級的兒子，因為交通不便無法從家裡通車，只好住在學校宿舍，這樣下去，連兒子的學費與生活費都湊不出了。

受到廢棄物價格暴跌與房租高漲的影響，聽說鄭凱先生的同行也陸續有人洗手不幹了。我問他轉行的話要做什麼工作？「很多人騎電動自行車當宅急便的送貨員。」他說：「一個月有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所以我也在考慮。但送貨的工作是公司組織吧？我做到這把年紀都已經自由慣了，不知道現在還能不能適應。」

「而且啊，」鄭凱先生繼續說道，「雖然廢棄物回收的工作經常被人瞧不起，但我也有好幾次賺的錢，比大學畢業的上班族月薪還多。賺到錢的時候，既開心又有意思。我都已經做了十七年，也產生感情了。」

雖然鄭凱先生對於這份工作感到自豪與眷戀，但今後要靠廢棄物回收捲土重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吧……。與他約好隔天晚上一起用餐的我，不禁在回家路上如此心想。

## 美容沙龍投資客

隔天，我邀請鄭凱先生來我家吃晚餐。雖然不知道已經時隔幾日，但我想先讓他沖個澡再說。

洗完澡後，鄭凱先生拉開啤酒拉環，湊上去吸了一口，說：「我決定明天早上離開上海，因為在上海已經很難靠廢棄物回收過活了。我要去我大女兒工作的湖北省武漢，看看那裡有沒有什麼工作。如果找不到好工作的話，或許會再回來上海吧。」

我雖然捨不得，卻也無可奈何。那一年春節，我在鄭凱先生的河南老家見過他二十歲的女兒，當時她說：「我有認識的人在武漢經營美容沙龍，說生意愈做愈大，要我過去幫忙，所以我決定假期結束後就開始工作。」我對鄭凱先生說，有女兒在那邊也比較安心吧？不如他也去給那間美容沙龍店雇用如何？結果他笑著說：「美白跟指甲彩繪嗎？那種事情我做不來啦，況且他們禁止雇用男性啊。」

「不過我會去參加經營會議就是了。」

什麼？經營會議？難道是去向美容沙龍的老闆打招呼說，小女受您關照了……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吧？

沒想到鄭凱先生說了：

「我女兒決定去武漢的時候，我給那家美容沙龍投資十萬元（新臺幣四十四萬元），取得了兩成的股份喔。」

聽得我頭昏腦脹。既然已經是美容沙龍的共同經營者，何必要在路邊賣破銅爛鐵，甚至露宿街頭呢？而且一問之下才知道，很多中國人經營的私人公司都是按月分紅，他甚至說，從三月到現在自己獲得的分紅「當然有和賣破銅爛鐵的收入差不多」。

雖然聽得我頭昏腦脹，不過我還是馬上恢復了精神。是啊，農民工就是這樣一群咬緊牙根賺錢度日，只為了把錢用在孩子身上的人啊。

## 與生俱來的貧富差距

當年因為SARS收掉雞肉攤後，從北京來到上海的安徽省農民工潤發夫妻也是，先生在建築工地工作，太太同時替好幾戶人家幫傭，連週末假日都要工作。家庭收入較多時，一個月據說有一萬五千元（新臺幣六萬六千元）。然而他們兩人完全不把錢花在自己身上。

「但每天晚上還是會讓爸爸小酌一罐啤酒囉。」如此笑道的潤發太太，那一年花在自己身上的錢，正如前文所述，除了飯錢以外，只有上美容院與買毛衣花的九十九元（新臺幣四百三十六元）而已。他們用省吃儉用存下來的錢，送大兒子去上研究所，還為了這一年秋天結婚的二兒子，花了二十萬元（新臺幣八十八萬元）重新裝潢鄉下老家。

鄭凱先生也是，明明不是身無分文的人，但全身上下從外套、襯衫、牛仔褲、帽子、鞋子、手錶到諾基亞手機，沒有一樣行頭是花錢買來的，全都是回收來的廢棄物。

此處希望強調的是，農民工之所以能為了孩子存到投資美容沙龍，或重新裝潢家裡的錢，都是因為平日省吃儉用，可以因為在討生活的都市沒有家，為了極力壓低房租支出而住在形同廢墟的公寓，甚至像鄭凱先生那樣露宿街頭，並持續了長達二十年這樣的生活。不是說所有居住在上海等中國大都市的居民，都能因為都更的補償金而成為暴發戶。只不過，在出生地就有工作機會的都市居民，與必須出外工作才能賺到學費等現金的農民工之間，確實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貧富差距。

我問鄭凱先生，有沒有問過女兒武漢有什麼樣的工作？

「我沒問過，但因為物價比上海便宜，所以要是能靠回收廢棄物掙錢就好了。畢竟也習慣了嘛。」



美容沙龍的老闆今後似乎也打算以自己喜歡的工作維生。

## 二、家庭女傭目睹的異變

儘管也有人說：「爆買已經結束了。」但二〇一六年春節仍然有大批中國觀光客造訪日本各地，展現出旺盛的消費力。另一方面，若將目光轉向中國國內，而且是我所生活的上海市，這一年春節可以看出兩項令人在意的變化。一是堪稱春節應景物的煙火與鞭炮遭到禁止，二是有愈來愈多家庭女傭或出外賺錢的勞工，連春節都留在上海不返鄉。其中家庭女傭不返鄉的現象令人在意，似乎可以看出中國經濟變調的端倪。

我想即使是沒來過中國的人，應該也曾在新聞畫面上看過，象徵中國春節的活動之一，就是人人都會燃放爆竹煙火。整個春節連假期間，城裡每個角落不分晝夜都能聽見鞭炮或煙火的聲音，其中的巔峰時段有三次，分別是從除夕跨到初一的那一小時前後、迎接掌管金錢的財神爺從天而降的初五凌晨，以及春節連假告一段落的十五元宵夜，全上海市民會同時燃放爆竹煙火，因此整座城市都會被籠罩在白茫茫的煙霧和震耳欲聾的巨響中，連待在屋裡都幾乎無法聽見旁人的聲音。

然而二〇一六年時，為了防止空氣汙染繼續惡化，陸續有地方以大都市為中心，下令禁止這項行為。上海也不例外，凡是在圍繞市中心而建的環狀線以內，一律受到禁止。

## 熱愛放鞭炮的中國人

中國人內心似乎有一部分將春節返鄉，還有與家人一起放鞭炮，視為一種人生的樂趣與鼓舞。

我至今曾多次在中國過春節，但姑且不論返鄉一事，我實在是直到今日仍然完全無法理解，放鞭炮究竟有什麼樂趣，竟然連大人都樂此不疲。不過在我剛開始生活在中國的一九八八年，那時剛出社會成為大學老師的人，初任薪資是七十元（新臺幣三百〇八元），而當我聽聞平均每戶人家花在春節煙火與鞭炮的金額是二百元（新臺幣八百八十元）時，嚇得目瞪口呆的同時，也感受到放鞭炮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即便我不是很能理解。即使到了現在，大家似乎還是會在這方面花費五百到一千元（新臺幣二千二百元到四千四百元）的程度。

我在二〇一五年的時候，趁著鄭凱先生返鄉的機會，前往他位於河南省邊境的老家過春節，他家倉庫裡也堆滿了大量採購的鞭炮與煙火。我單刀直入地問：那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只見年過四十的他一臉愕然地答道：

「因為，開心嘛。」

意思就是純粹開心，沒有理由。對中國人而言，鞭炮或煙火似乎有什麼東西鼓動著身體深處，可以把一切壓力都拋到九霄雲外去吧。

## 隨處可見的「自首」、「舉報」標語

許多大都市禁止放鞭炮。上海則從年底開始，四處張貼或懸掛著禁止施放的海報與橫布條，「違反禁燃，舉報有獎」、「一旦發現違法行為，立刻通報一一九」、「私藏者，鼓勵自首」等無情字眼充斥在十二月的城市裡。在燃放爆竹煙火的三個巔峰時段中，上海當局還特別挑在最激烈的跨年夜，動員警察和義工出來監視，更令人驚訝的是，動員的人數竟多達三十萬人。在我居住的公寓入口，也有幾名警官在跨年那天晚上站崗監視。或許是動員的成效吧，我整個晚上沒聽到鞭炮或煙火的聲音。

另一方面，在過去數年來反腐敗工作相繼揭發政府或企業幹部的同時，日本的網路或新聞報導上也開始出現「宛如重回文化大革命時期」等言論，批判嚴格取締春節爆竹一事。當城裡隨處可見「舉報」、「自首」等文字標語時，內心感受確實不會太好。只是我想轉述的是，我曾詢問經歷過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對方的反應是「說像文革時期有點太誇張了」。

某位出生在北京報社記者家庭的六十多歲女性，於文革期間住在雙親任職的報社宿舍裡，她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幾乎每天都會聽到『今天幾號棟的同事跳樓了』，或『昨天幾號棟有人跳樓了』之類的話題，簡直就是地獄。」

## 充斥習近平夫妻海報的農村

另一名文革當時在天津度過童年時期的五十幾歲男性也說，他清楚記得小時候常去附近的樹林玩耍，有時會在那裡看到死掉的人。

「小時候並不覺得看到屍體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名男性出生於日本舉辦東京奧運的一九六四年。我比他小一歲，但至今為止見過的屍體，只有我去世的祖父而已。

面對中國這個國家或人民的言行，確實有不少時候會感到難以理解，不懂「為什麼中國是這樣的呢？」。只是，一旦知道彼此儘管出生在同一時代，但是童年時期所見、所聞、所接觸的事物截然不同時，就能理解彼此的思考或價值觀會有差異，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一年春節，我為了見一見許久不見的留守兒童，特地跑了一趟位在安徽省農村地區，那個有著美麗石板路的古村茂林。我在那裡注意到很多人家都在自家醒目之處，張貼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海報。我問那是在哪裡買的，他們說是村裡書店賣的。見到這幅畫面，我也不禁心想：

「難道農村地區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愈來愈深了嗎？」

不過，我一個住在同村的二十幾歲友人說：「農曆正月買領導人的海報來貼，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當我跟她說，這樣啊，但日本不只是書店而已，到處都沒有賣安倍晉三與夫人的海報喔。她卻一臉吃驚地回道：「什麼？真的嗎？」

雖然在中國人家裡看到牆上大大張貼著國家主席與第一夫人的海報，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但詳細了解實情後，其實背後可能也沒什麼特殊含義。究竟該從何理解中國這個國家，說起來實屬不易。

## 銳減的工作

就在春節即將到來的二〇一六年一月底某天，潤發夫妻約我說：「我們明天就要返鄉了，你在那之前來我們家吃頓飯吧。」

我已經三個月沒見到他們了。雖然他們告訴我一個令人開心的消息，說去年結婚的次男夫婦有了孩子，但臉色卻一點也不好看。由於他們之前說過，覺得次男的老婆「脾氣有點暴躁」，因此我以為是有嚴重的婆媳問題，結果一問之下，潤發太太笑著揮手說：「不是那樣啦！」卻又立刻收起笑容，「是工作減少了。」

潤發太太因為兒子要結婚，所以休假一個月，返鄉做準備。工作勤奮又煮得一手好菜的潤發太太很受歡迎，最多的時候光是固定客戶就有八家，過去最高一個月賺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平均下來也有八千元（新臺幣三萬五千二百元），月收入連大學畢業的上班族都自慚形穢。

「因為我太輕忽了，以為休息一個月而已，很快就能再找回客人，沒想到十一月回到上海時，狀況完全不一樣了，外包家事的有錢人變少了。」她說。

「工作減少是因為景氣變差的關係吧？」我問。

「家庭女傭之間是這麼認為的，有些只外包打掃工作的家庭突然中止委託，有些外包打掃與煮飯的家庭則說：『我們自己會打掃，只要煮飯就好了。』這樣的情況在這兩個月來大量增加。」

潤發太太自己也是，原本最多八家的固定客戶，竟然減少到只剩兩家。「我萬萬沒想到的是，雖然我休息了一個月，回來竟然找不到兩間以上的客戶。因為這次是二兒子結婚以來第一個春節，所以做父母的沒

理由不回老家迎接返鄉的媳婦，但老實說我很想留在上海多賺一點錢。」

潤發先生也因為上海市中心幾乎沒有需要拆除的建築物了，所以在工作量減少的情況下，這幾個月來只好靠著人脈，改做最近在上海富裕階層之間流行起來的地暖鋪設工程，然而月收入始終無法達到每天都有拆除工作時的水準。

## 「害怕工作被搶走」而無法返鄉的民工階層

當時，不只潤發夫妻親口證實工作減少的狀況，連獨自扶養四歲獨生女的單親媽媽喬女士也是其中之一。正如前文所述，喬女士的女兒原本由同居的喬媽媽照顧，後來因為喬媽媽受傷的關係，她辭去了ASUS工廠的工作，開始當家庭女傭。然而，據說以往的兩家固定客戶，從二〇一五年十一月開始減為一家。

「雖然他們沒說辭退我的原因，但我想肯定跟景氣變差有關。」

產生危機意識的喬女士決定，二〇一六年春節要獨自留在上海找家庭女傭的職缺，只讓孩子和母親回去安徽省的老家，但結果卻是，「一家也沒找到。」她神情不安地咬著嘴唇說。

上海的媒體「東方網」在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的報導中提到，當年春節的家庭女傭時薪，從平常的二十五元（新臺幣一百一十元）倍增至五十元（新臺幣二百二十元）。光看數字可能會覺得家庭女傭是賣方市場，但喬女士卻告訴我實情：「雖說都是家庭女傭，但還是有分成兩種需求，一種是煮飯、洗衣、打掃等家事需求，另一種是照護老人、身障者或照顧嬰幼兒的需求。春節時薪翻倍的是那些少了家庭女傭，全家人就會傷腦筋的看護型家庭女傭。如果只做家事的話，時薪還是二十五元。」

來自前文介紹過的，家家戶戶貼著習近平夫妻海報的安徽省古村，並且在上海以家庭女傭維生邁向第十年，同時也是如今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學笛的留守兒童磊磊的母親，她也說：「二〇一五年之前的春節時期，最快也是法定假日最後一天的初六才回上海，最長的時候還在鄉下老家待到元宵節。但今年初四就要回上海了。」我問她是不是因為比往



年還早開工的關係，她說：「因為我聽說景氣變差，工作開始減少，今年春節有很多家庭女傭都不返鄉，要是工作被別人搶走就糟了。雖然我跟現在的客戶是老交情，但還是不能掉以輕心。萬一工作減少，要供孩子上音樂大學也會更辛苦。」

磊磊的父親留在鄉下老家種稻，農閒期則靠著裝卸貨物賺取現金，他這十年來與妻子或孩子見面的時間，只有在家人春節返鄉時而已。對磊磊一家人而言，二〇一六年的全家團圓時光，短短四日便結束了。

在距離更近的地方，我在上海住的社區有個鄰居，她在外地賺錢的先生這一年春節也沒有返鄉。那對夫妻雖然來自江蘇省的農家，但因為故鄉已經沒有親戚，所以他們往年都沒有返鄉，而是在夫妻兩人的房子所在地，同時也是妻子工作的上海過春節。

然而，二〇一六年先生卻不回來。雖然我無法直問說，今年妳先生不會回來吧？但被眾人公認為「社區情報通」的十六號棟歐巴桑，眼睛很利地發現我以後，便湊上來竊竊私語說：「我跟鄰居打麻將時聽說啊，住你隔壁的先生因為收入不好，所以今年春節回不來了。」我心裡暗想，她怎麼跟我說這些呢，真是的。

## 強硬的政策是危機的表徵

無論如何，在不景氣的影響下，出外賺錢的人工作開始減少一事，肯定是不會錯的。如果這只發生在春節前後的話，有可能是因為大家前往日本等國家進行爆買之旅，所以在那段期間不需要家庭女傭，而實際上這也確實是理由之一吧。

只是家庭女傭都異口同聲地說：「工作從十一月左右開始減少。」儘管看當時在日本的爆買狀況很難發現，但比起以富裕階層、中上階層為主的爆買旅客，景氣的惡化似乎更早一步開始接近提供前者服務的民工階層。

在景氣可能日益惡化的警告聲中，這個現象著實令人掛心。不過唯一的救贖，應該是春節的禁燃令只限於都市地區，而不適用於民工階層返鄉目的地的地方小都市或村落吧。

在我造訪的安徽省農村，村民仍然從一早五點左右到深夜兩點為止，連日盛大燃放爆竹煙火。即使如此，當地的夜空還是一片清澈，彷彿伸手就能觸摸到星星。

在享受高度成長這點上，民工階層看起來確實不比都市出身者。至少我到目前為止，還沒看過有哪個家庭女傭曾到日本進行爆買之旅。如果他們過年返鄉時最期待的爆竹與煙火遭到禁止，肯定會憂憤鬱結吧。

不過二〇一六年的春節，不得不留在上海，而且還無法放鞭炮，內心憂憤鬱結的民工，應該確實是比前一年增加許多才是。聽到鞭炮與煙火遭禁的消息時，我不禁想吐槽說，應該有不少事情比空氣汙染更該優先解決吧。只是明知市民會憂憤鬱結卻還要下令禁止，可見這是項危機感的表徵，顯示當局認為景氣與汙染的狀態，已經到了束手無策的地

步。

### 三、光天化日下的站壁女子

多位名留日本文學史的作家筆下描寫的，日本以外國家的城市中，上海應該堪稱豔冠群芳吧。

除了有日記、散文、小說等各種體裁，包括在搭船前往倫敦留學途中暫時靠岸的夏目漱石、以報社視察員身分到訪的芥川龍之介、十七歲時造訪父親外派地點的永井荷風、奉命將芥川獎頒予駐守杭州的火野葦平而專程前往的小林秀雄、為了讓愛上情夫的妻子回心轉意而夫妻同遊的金子光晴，都曾動筆寫下上海風貌。當年金子光晴看見魯迅一動也不動沉思了一小時的橫濱橋、壯麗庭園令永井荷風深受感動的豫園等，如今依然有不少地方殘留著當年的面貌。

上海是最適合用收錄這些作品的文庫本或存有其電子書籍的智慧型手機，代替旅遊書展開散步之旅的城市。可惜最近有個旅遊的附加條件，那就是只能選在PM2.5等空氣汙染沒那麼嚴重的日子。

## 中國不存在暗巷

然而在上海或中國的城市散步，有一項美中不足之處，就是無法享受在小路、暗巷或後街散步的樂趣。中國只有一般街道而已，沒有小路或暗巷。

這樣說或許有熟悉上海或北京的人會反駁道：「說什麼夢話，小路或暗巷不是到處都有嗎？」、「北京的胡同不就是小路嗎？」不過中國都會區的道路全都是一般街道，差別只有路幅寬窄不同而已。認為上海或北京也有小路或暗巷的人，腦中想到的只是路幅比較窄的道路，但那仍屬於一般街道。

中國的城市之所以沒有暗巷或小路，是因為住宅結構的關係。

自古以來中國就屬圍牆文化。用城牆圍住整座城市，用牆壁圍住一個家族或團體同住的複數居所。用城牆圍住城市可以隔絕外面的世界，用牆壁圍住房屋四周可以防止家族以外的人或路過的陌生人入侵。進入住家的方式是，先穿過面向街道的大門，進入圍牆裡，再經過中庭之後，才終於抵達自家的玄關。

這種建造城市或住宅的精神與方式，代代相傳至今。有些社區的規模還大到有上百戶、上千戶入住，因此有些圍牆之中，甚至具備學校、超市、醫院、澡堂、理髮院、餐廳等各種生活必備機能，即使不走出牆外也能滿足基本需求。

這種住宅區中的小巷，應該就相當於沒有圍牆文化的都市中的暗巷、小路或後街吧。只是圍牆中的道路，總讓人有種闖入他人封閉空間的突兀感，和一種完全由牆壁維護生活空間的預定和諧（*Harmonia praestabilita*）氣氛。圍牆中欠缺的是，在對外毫無防備的開放之處自然

形成的巷弄、小路、後街上，能感受到的驚險、刺激、緊張或興奮。

## 拆除圍牆的真正用意

當這種用牆壁圍住社區，限制外人出入的住宅區一形成，最麻煩的問題就是，任何人都能通行使用的一般道路數量就會減少。在每個角落都建設這種用牆壁或取代牆壁的商店圍住四周，構成像方型積木一般的住宅區，久而久之便會建造出再怎麼走也走不到下一條交叉路口的城市。

二〇一六年，中國開始規畫要禁止這種用牆壁圍住四周，也就是中國當地稱之為「封閉式小區」的住宅區。

提案者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與中國政府，內容是從這年二月下旬開始，往後新開發的住宅周圍將不設圍牆，住宅區內部的道路也開放讓汽車與行人自由通行。除此之外，現有的住宅區也將分階段拆除圍牆，目標是希望讓任何人都能夠自由通行。

當局提出的理由，是希望增加任何人都能通行的一般道路，以減緩交通阻塞的問題。交通阻塞也是造成遲遲找不到解決辦法的PM2.5等嚴重空氣污染的元凶之一，所以這個理由可以說是極具正當性。

只是中國人民並未全盤接受當局的說明，因為課土地稅才是當局真正的目的。

事情是這樣的，將現下因為有圍牆所以被當作公共場所的花圃等空間，透過拆除圍牆的方式分配給個人，然後將其列為私有財產課稅以增加稅收，據說這才是真正的目的。

此外，也有人反對說，開放人車通行可能會提高交通事故的機率等等，安全性將無法獲得保障。

拆牆爭議才剛開始而已，目前有可能先觀察一陣子，或甚至在強烈

反對聲浪下遭到廢案。只是在歷來即使拆除包圍整座城市的圍牆，也要堅守住自家圍牆的中國，假如真有一天遭到廢除的話，恐怕堪稱空前絕後的創舉了。在圍住自己四周的作風下培養出來的文化、思想或習慣，或許也會有所改變吧。更重要的是，拆除圍牆或許能讓暗巷或小路的文化出現在中國。



## 大量出現在市中心的流鶯

見到這整件事情愈來愈有意思，獨自感到興奮的我，為了再次觀察被牆壁環繞的居住空間，特地抽出時間搭地鐵去看了一些住宅。

過程中，我在市中心的某個住宅區，見到一幕令人不可置信的畫面。在星期日的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區內，有流鶯站在那裡。假如只是一、兩人的話，我恐怕還不會注意到，況且那種程度的人數，我也在高級飯店的入口附近看過。然而，在那個住宅區內，流鶯人數卻多到一眼就分辨得出來，這條街有四、五個人，隔壁街有七、八個人，再隔壁街又有四、五個人。

之後，我試著穿越她們所在的街道，其中有幾個人搭訕我說：「要不要一起去玩啊？」還說費用最低從五十元（新臺幣二百二十元）起算。便宜的程度令我深受衝擊。其中也有看起來二十幾歲的人，不過四十歲上下的人似乎是最多的。

那裡是集合式住宅集中的住宅區，目前因為確定進行都更，居民已經開始撤離，有一部分甚至已經開始拆除了。原先周圍似乎也有一道圍牆，但出入圍牆內外的大門已經被拆除了。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的通道很窄，只能勉強讓兩個人擦肩而過，因此汽車無法進入，但行人似乎可以自由通行其中。我連續兩天來到這裡，第二天卻發現附近聚集了二十名左右眼神銳利的年輕人，看起來好像是來驅逐那些還沒撤退的居民。

看到那樣的畫面，我第一個浮現的念頭是，該不會有不法組織趁亂在拆除期間入侵這個住宅區，然後在他們的安排下，才会有那些流鶯站在街上招攬客人吧。

## 共產國家的特種行業

只是，事情還不能輕易下定論。

我有朋友從事住宅拆除的工作，我自己也看過了好幾個確定拆除，而且居民開始撤退的住宅區。不過像那樣有流鶯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還不是一、兩人，是十幾個人，同時出現在堪稱市中心區域的畫面，至少我還是第一次見到，而且孤陋寡聞如我，也從未聽聞有這樣的現象發生。然後在趕人的那群年輕人停留的兩小時期間，流鶯都找地方躲起來了，直到他們離去才再次站上街角。從這一點看來，流鶯應該不是趕人的年輕人組織安排的。

此外，我在距離預定拆除住宅區約一個街區遠的路上，也發現幾名流鶯低調地站在建築物陰暗處拉客。該處的前面就是市區公車往來行經的大馬路。

在一向予人共產黨嚴格控管國家印象的中國，還有上海，雖然不知道這樣說適不適當，但這裡當然有紅燈區。雖然不像日本那樣公然表明是風俗店，但在掛著夜店、卡拉OK、三溫暖、腳底按摩招牌的店當中，很多都有提供色情服務。另外，中華圈也有部分理髮廳扮演著特種行業的角色，零星散落在城鎮各處。有些從店內透出來的照明很昏暗或帶有紫色等怪異顏色，有些門口的磨砂玻璃只有一小塊是透明的，可以用來窺視店內情形，因此一眼就能知道那是色情理髮廳。

## 非洲民工與中國流鶯

經過一番調查後，我發現在距離流鶯攬客的住宅區不遠處，有一處以風月場所較多而為人所知的貧民窟。不過那些店營業的地點是在店內、建築物內。我再重申一次，以往上海市中心從來不曾有數十名流鶯光天化日下站在街頭。從事色情行業的她們，究竟為什麼開始拋頭露臉呢？是不是發生了什麼變化，才促使這種現象發生呢？

無獨有偶地，有位研究中國人在非洲工作情形的研究人員告訴我一件事，說有中國女性為了向遠赴非洲勞動的男性提供色情服務而前往非洲，但大約自二〇一五年年中開始，男性與女性遠渡非洲的人數似乎都有呈現增加的趨勢，而且是以四十歲上下的人為主。然後據說增加的原因似乎有受到不景氣的影響。

在中國，凡是高中畢業、專科畢業或學歷更低的人，年紀一過三十五歲就會很難找到工作。服飾店或餐飲店也不會雇用這些人當店員。如果是男性的話，超過五十歲也很難找到警衛或公寓管理員的工作。那些女性的選擇之一是當家庭女傭，但前文也已提到，在不景氣的影響下，大約從二〇一五年十一月開始，家庭女傭的職缺就逐漸減少了。

大批流鶯突然出現在圍牆遭拆除的住宅區街道上。她們彷彿是從中國經濟傾軋下形成的城牆裂縫中被擠出來一般。連家庭女傭的工作都很难找到的女性，有些人選擇站到上海的街角，有些人決定遠渡非洲，這些跡象在在顯示景氣確實開始惡化了。這甚至也讓人預見到，一旦圍牆消失而獲得道路自由，這樣的暗巷情景應該也會出現在中國的其他住宅區吧。

## 第四章 | 夢幻王國與夢的幻滅

搭乘高速鐵路返回工作崗位的人們。(2016年·安徽)



## 一、任務完成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了。開園第一年的遊客人數就達到一千萬人，遠超過目標的百萬人次，業績似乎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在接近「夢幻王國」迪士尼樂園開幕的二〇一六年春天，發生了一個鮮有人知的現象，一群過去為了追尋夢想而來到上海的人們，正如雪崩一般大舉遷離上海。遷離的人潮多到有的幼稚園甚至因為大量孩童離開上海，面臨經營不下去的危機。

這群人就是上海從事基層勞動或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失去工作與住處的他們，在上海著實失去容身之地後，歷經了一番艱辛波折，最後如遭驅逐一般離去。他們是一群即使想走也不知往哪走，一群走投無路、進退兩難的人。一群被迫妻離子散的人。在上海屬於貧富差距社會底層的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存在的真相是，在海納百川的廣博胸襟下逐漸膨脹的上海，如今面臨成長極限，終於開始痛苦哀號，把容納不下的地方出身者驅逐出去。

在這個「夢幻王國」成功引來人潮的城市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一群人，上海的無情切割蘊藏著急速失去光輝的危機，畢竟這裡向來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塑造出其作為一個都市的魅力，並吸引人潮與錢潮的投入。然後上海的這副模樣，在國家憑藉強大經濟實力，企圖以「一帶一路」將勢力擴大至歐洲或非洲，並大手筆買下希臘港口或非洲資源等強勢行徑背後，也與整個中國努力掙扎，連在非洲都試圖創造出國民就業機會的模樣遙相呼應。

在歡慶夢幻王國開幕的上海、在不願再予人夢想的上海，以及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人群中，也可以見到拚命扶養四歲女兒的單親媽媽喬女士

的身影。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剛才房東來趕我離開公寓了，叫我五天後搬出去，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我的智慧型手機在二〇一六年剛開春不久的三月初旬，收到喬女士在緊要關頭傳來的這封短訊。

「連她也這樣啊。」回撥電話的同時，我嘴裡喃喃自語著，內心確信「他們周圍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所謂的他們，指的是農村出身並從農村地方來到上海工作的人們。長久以來，他們都被統稱為「農民工」，但如今農民工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也有不少第二代以後的人念到大學畢業，進入都市企業工作，成為所謂的白領。只是目前在整體比例上占壓倒性多數的，還是最初農民工從事的工作，也就是在從「改革開放」進入高度成長的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的中國，在都會地區從事因「辛苦、骯髒、危險」而面臨人手不足的建築工地體力勞動、倉庫作業、工廠產線工人、服務業外場、富裕階層或中上階層家中女傭的人。

## 工作開始減少

前文也提到過，上海的家庭女傭工作大約從二〇一五年秋天開始減少。喬女士原本的兩家客戶，也是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減少為一家。就在她擔心新的一年會面臨什麼狀況時，又遭到房東的驅趕。

我聽聞喬女士被驅趕的消息後，確信「他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是有理由的，因為那兩、三個月以來，除了喬女士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的地方出身友人說過「我在煩惱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覺好像快被趕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類的話。

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為妻子準備婚宴上的婚紗，只好讓她穿優衣庫紅色羽絨外套出席的長順，也是其中一人。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他，在高中升學考試落榜後，十五歲就到母親工作的上海，透過親戚的介紹開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親思順和我同為一九六五年出生，今年（二〇一七年）五十二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今年五十歲，兩人都只讀到小學畢業而已。思順曾經對我說：「雖然我上了六年小學，但最後只讀到三年級而已。」在現年四十歲以上的中國農村出身者當中，思順的學歷並不算少見的特例。

言歸正傳，十五歲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長順，因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兩星期就辭職回到父親以務農維生的老家。附帶一提，我就是長順辭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車返鄉時，在長程巴士上認識他的。其後，他三番兩次變換職業與居住地，一會兒在東北遼寧省的瀋陽幫親戚帶孩子，一會兒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寧波的海鮮餐廳當服務生，然後再度回到上海當髮型設計師，最後在二〇一二年，來到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物流倉庫當作業員。雖然薪水視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來也有四



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那一年，他認識了在附近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同樣來自安徽省農村的十七歲少女，兩人認識之後在隔年的二〇一三年結婚，並於同年生下女兒。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總收入是七千元（新臺幣三萬〇八百元）。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長順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對我說：「我在工作中學會操作電腦，薪水也調升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說將來想買自己的車，載女兒去兜風，為此必須先考到駕照，於是在二〇一五年花了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考到汽車駕照。他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工作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從十五歲出社會起算已經第九年了，到二〇一五年年中為止的兩年多期間，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階段的長順，出社會以來第一次感覺生活充實，並過著可以描繪未來夢想的生活。

##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雖然從成為單親媽媽開始，就過著相當辛苦的生活，但從擔任商場銷售員的二〇〇八年開始，到大約二〇一〇年為止的那幾年，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薪水方面，底薪非常少，業績抽成所占的比例比較多，但只要努力就會得到相對的薪水。當時即使把一半的薪水交給鄉下的父母，在上海還是可以留下一筆充足的生活費，也能存得到錢。我那時覺得要存錢重新裝潢老家也不算太困難，心想我有來上海真是太好了。雖然懷了孩子以後，必須辭掉工作，但如果繼續待在那裡的話，我想即使經濟不夠充裕，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困難。」

出社會八年多來每天為眼前生活忙得不可開交的喬女士，第一次對自己的將來感到樂觀的那一年，就是北京舉辦中國第一場奧運的二〇〇八年。兩年後的二〇一〇年則是舉辦上海世博。然後華特迪士尼公司也在這一年，與中方正式簽訂建設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合約。

長順的父母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第一代農民工，大約從一九九〇年前後開始離開故鄉，前往北京、廣州、上海等大都會。然後大約從二〇〇五年開始，喬女士、長順等第二代農民工開始往上海聚集。世博和迪士尼樂園所創造出來的需求，將他們吸引到上海，支撐著他們的美夢。

然而到了二〇一五年，這些動向卻開始變調。在中國經濟減速的同時，上海市中心的都更也暫緩下來，於是我愈來愈常聽到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朋友抱怨說：「最近工作減少了，害我閒得發慌。」此外，由於都更開始減少，因此以往靠著收集拆除現場廢材料或廢棄物維持生計的農民工，也面臨可回收品項驟減，不得不改行換業的

狀況，或是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況下，因為無法維生只好離開上海的人也大幅增加了。除此之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我也開始從家庭女傭口中聽見工作減少的哀號聲。

## 市郊房租飆漲

就在那個時候，長順告訴我說：「我租的公寓要更新合約了，但房租說要漲一倍，還說：『付不出來就滾出去。』真令人頭疼。」而且差不多就在房租說要漲價的那一陣子，公司突然解散，他頓時成為失業人口。

他住的地區相當靠近上海市郊的浦東機場。雖然是屋齡才兩年的五層新公寓，但因為交通不便的關係，所以兩房一廳只要七百元（新臺幣三千〇八十元），在市中心有不少億萬豪宅的上海算是破格的房租。房東重新提出的房租是一千四百元（新臺幣六千一百六十元），不過以上海市中心的行情來說，仍然算是便宜得不可思議。但相信不用我強調也知道，人會依自己的所得水準規畫生活，租金一夕之間翻倍，要人不慌張是不可能的，更遑論還同時陷入失業狀態。

長順任職的倉庫公司在浦東機場的海關委託下，專門招攬和他一樣來自地方，學歷只有初中或高中畢業的年輕人，靠著人海戰術比對報單與貨物的內容是否一致。然而近年來，由於人事費用高漲，檢貨也改採自動化，於是仍舊維持人工作業的他們公司，工作量便因為效率差的理由逐漸減少。因此，公司的經營者決定，與其花費一筆昂貴的初期費用推動自動化，不如趁著手邊還有盈餘時收掉公司。

## 集體消失的幼稚園生

另一方面，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也收到通知說，從二〇一六年一、二月的開春時期起，房租將從以往的五百元（新臺幣二千二百元）漲到七百元（新臺幣三千〇八十元）。對於全家只有一人在賺錢的喬女士來說，突然調漲四成的負擔相當沉重。只是雖說經濟成長趨緩，中國在二〇一五年的成長率依然達到六．九%，因此喬女士還是接受了房租調漲一事，並說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如今事情之所以演變成，喬女士必須在春節後搬遷出去，是因為公寓的拆除工程定案了。那幢公寓在三年前確定將在都更案中拆除，以前住在那裡的居民雖已在取得補償金後撤離，但承包拆除工程的建設公司老闆和一部分的前屋主，卻在工程尚未開始的期間違法將房屋出租，租戶幾乎都是和喬女士境遇相同的農民工。

進入二〇一六年以後，上海市郊陸續出現許多和長順或喬女士一樣，因為房租漲價或拆除工程來得如此措手不及，所以不得不重新調整生活規畫的農民工。

喬女士女兒琳琳上學的幼稚園，在春節結束後，園生人數減少為放假前的三分之一。在那所幼稚園上學的園生，幾乎都是和喬女士面臨相同境遇的農民工的子女。「老師驚慌失色地說：『假如這附近沒有地方可以給你們住的話，我們幼稚園早晚也會倒閉的。』」喬女士說。

他們究竟消失去哪了呢？向喬女士探問之下，她說有一半的人為了尋找跟以前差不多水準的房租，遷移至上海更郊外的地方，另一半的人決定趁此機會離開上海，暫且回去家鄉觀望一陣子。只是在遷至更郊外的人當中，也有不少人因為通勤路途太遙遠而辭掉工作，改在新居附近

求職。「也就是說，」喬女士說：「工作已經不可能講究什麼意義了，因為光是找到一個住的地方就耗盡我們的心力了。」

## 驅逐地方出身者的上海

那麼被迫撤離的長順與喬女士又做出了什麼樣的選擇呢？

長順搬遷至稍微郊外的地方，找到與以往租金相同的房子。因為長順夫婦都才二十幾歲，所以也不是不可以選擇搬到市中心，尋找商店員工、大樓管理員、清掃等工作。例如在我家附近的出租公寓，當時房租還沒像市郊那樣飆漲，因此若夫妻兩人齊心協力，也不是沒辦法生活下去，但即使是那樣，房租也會吃掉長順一人份的薪水，甚至是更多吧。「房租占去家庭收入一半到三分之二的的生活實在太勉強了，所以我害怕得沒辦法繼續下去。」長順說。

喬女士決定讓女兒和幫忙照顧女兒的喬媽媽一起回老家去，自己一人留在上海繼續做家庭女傭的工作，理由是：「上海已經是個無法靠一個人養活三個人的地方了。話雖如此，鄉下的薪水比都市還少，所以我自己一個人是沒辦法存錢供孩子上大學的。」

幸好她在距離目前住處不遠的地方，又找到一間確定將拆除的房子。房租和去年一樣都是五百元，但和以前那個寢室放得下三張床，還有客廳可以和室友共用的家相比，這次的公寓小到只能勉強塞進一張單人床而已。

在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那一年，大批來自地方的人開始向上海市郊移動。聽聞被迫搬遷的他們，有一部分人考慮返回家鄉時，我心裡想到的是中國當局近年來雷厲風行地推動中國版新幹線，也就是高速鐵路網的整備一事。喬女士和長順的家鄉，也在前一年夏天開通高速鐵路了。

只是開通後沒多久，喬女士與長順就被迫撤離，並面臨到工作減少或失業等波折，簡直就像算準時機似的。見到他們這副模樣，我不禁覺

得耳邊聽見一個不曉得從哪裡傳來的聲音，好像在試圖甩開他們般地說：

「上海沒有各位的容身之處，你們的任務已經結束，辛苦了。不過你們看，返回鄉下的高速鐵路已經備好了，接下來請在家鄉繼續努力吧。」

但高速鐵路是否真如當局所願，對於地方出身者的新生活有所幫助呢？



## 二、雖然蓋了高速鐵路

當高速鐵路尚未通車到長順位於安徽省田園地帶的故鄉，來上海只能搭乘長程巴士時，長順平常吃的吐司，不管是在上海買的，還是在鄉下老家那邊買的，吃起來一樣都是蠟燭的味道。

我還聽人說過，只要用牙籤在奶油中間戳一個洞，把面紙搓成的燭芯塞到底再點火，就能夠當蠟燭使用，因此災害發生時相當方便。另一方面，我雖然沒聽過有人用蠟燭代替奶油做麵包，但我心裡大概有底，那些麵包恐怕是用來源可疑的乳瑪琳烤出來的吧。

## 地溝油做的乳瑪琳

來源可疑的意思是，那是將排入水溝的廢油收集起來提煉的再生油，中文叫「地溝油」，是一種在日本被翻譯為「溝油」、「下水油」的假油。根據媒體調查，使用這種地溝油來料理的餐飲店超乎想像地多，而這件事在二〇一〇年爆發出來以後，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在那之前也有人私下流傳過這件事。

然後據說也有很多豬油或乳瑪琳是用這種地溝油做的。畢竟中國在二〇一〇年當時，人人都煞有其事地說：「吃十次外食就會有一次吃到地溝油。」因此認為蠟燭味的麵包中摻有來源可疑的乳瑪琳，也不是什麼異想天開的事。

我之所以知道蠟燭的味道，是因為小時候試著舔過一次。

那是某個接近耶誕節的午後，母親從壁櫥深處取出一棵小型耶誕樹，還有亮片閃閃發光的彩帶、耶誕老人，和一個圓筒狀的東西。其中還有一個橘色的像茶罐一般大，看起來就像冰凍過的橘子口味可爾必思，令人垂涎三尺。我問母親這是什麼？她說：「這是蠟燭喔，停電的時候不是會點白色的蠟燭嗎？這就跟那一樣。耶誕節那天晚上，我們要點蠟燭來迎接耶誕老人。如果不點蠟燭照亮一點的話，耶誕老公公不就找不到放禮物的襪子在哪了嗎？」

即使聽完這番說明，我還是懷疑那是耶誕節的點心，母親只是為了怕我吃掉才說謊騙我的。於是，我趁母親去廚房時趕緊舔了一口，結果沒有可爾必思的味道，也沒有橘子的味道。第一次嘗到的蠟燭味道，雖然不至於難吃到令人噁心想吐，但我可以從熏到我整個嘴巴與鼻腔的臭味，直覺地明白那絕對不是食物。

蠟燭的味道之於我而言，只有小時候與母親一起過耶誕節的甜美回憶而已。

不過對於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十五歲長順而言，蠟燭味的麵包只是一面將中國貧富差距社會反映在眼前的鏡子而已。

高中入學考試落榜後，他透過親戚到上海花市工作，卻在兩週內就受不了這份需要大量體力的粗活，只好以連夜逃跑的方式辭去工作，連薪水都沒領到。即使如此，他還是聯絡上當初介紹工作的親戚，向對方表示歉意，結果特地前來長程巴士站目送他返鄉的那位親戚，送給他兩斤的吐司當作餞別禮，說：「你帶在巴士上吃吧。」十五歲的長順，出社會拿到的第一份報酬就是麵包，而且還是帶著蠟燭味道的。

長程巴士上，他對著偶然坐在隔壁座的我聊起這些話題，還對我說「請你吃吧」，便把他的「初薪」也分享給我。一口咬下的瞬間，蠟燭的味道就在嘴裡蔓延開來，我身歷其境地體會到了身旁這位少年的境遇。

## 沒錢的人吃蠟燭

區分麵包有沒有蠟燭味的指標，就是價格。

大約從北京舉辦奧運的二〇〇八年開始，上海的「外資」麵包店急速增加。不僅是地理上與中國相近的香港、臺灣大型麵包製造商，連日本人相當熟悉的法國麵包老店「PAUL」等歐美勢力，還有日本的大型製造商、在巴黎進修過的日本麵包師傅，都接二連三在當地展店。

雖然我的一名以英國製藥公司外派人員身分，前往上海赴任的比利時友人，曾經批評上海百貨公司內，日本最大製造商名下麵包店販售的法國麵包，說：「這只是仿冒品而已，與歐洲道地的長棍麵包差太多了。」但也有歐系麵包店可以讓她吃到正統的美味麵包，好吃得連她都讚嘆說：「外表酥脆，裡面又有嚼勁，這跟我在巴黎吃到的長棍麵包一樣！」

雖說如此，這位朋友批評的日系麵包店，似乎很符合同為亞洲人的中國人口味，當時受歡迎的程度，在包含日本在內的所有同公司店面當中，上海店的銷售額可是達到世界第一的水準。從以英式麵包為首的吐司麵包、夾著熱狗或可樂餅的鹹麵包，到披薩麵包、哈密瓜麵包、奶油麵包等點心麵包，在陳列著數十種麵包的店內，至今仍然每到傍晚，都可以見到剛下班的「白領」女性拿著托盤與夾子，把店內擠得水泄不通的畫面。

從我在巴士上結識長順的二〇〇六年開始，到舉辦上海世博的二〇一〇年前後，日本或臺灣品牌的新興麵包店，吐司價格約為十五元（新臺幣六十六元）上下。我吃這個價位的麵包，從來不覺得有蠟燭味。此外，在外資勢力的刺激下，商品變得精緻、門面也變得更漂亮的中國品

牌麵包店，吐司價格介於八到十元（新臺幣三十五到四十四元）之間。這個價位的麵包店，雖然有些麵包還是有蠟燭味，但那樣的店也在逐年遞減。

相對於此，吐司標價在五元（新臺幣二十二元）以下的店，賣的麵包就有濃厚的蠟燭味。雖然不見得所有帶有蠟燭味道的麵包都使用了地溝油做的乳瑪琳，但應該也是使用了劣質奶油或油品吧。只是大概到了二〇一二年左右，我就幾乎不曾在上海遇過有蠟燭味的麵包了。

不過在長順的家鄉，麵包一直都還是蠟燭的味道。直到二〇一五年秋天，我去長順老家玩，回程在他家鄉城鎮三個月前才剛開通的高速鐵路車站商店，一如往常地買了麵包到車上吃，一咬下去發現，麵包已經沒有蠟燭味了。

終於沒有蠟燭味了啊。我一邊在內心感慨，一邊注意到另一件事。回顧過去幾年在中國旅行的經驗，凡是可以到最近的車站搭乘高速鐵路移動的地方，販售的麵包都沒有蠟燭味，而在高速鐵路尚未通車的地方買的麵包，一直到那一年都還有濃厚的蠟燭味。也許高速鐵路的開通刺激了當地的經濟，將蠟燭味的麵包驅逐出去了吧。

## 鄧小平的法國麵包

身為改革開放政策之父，同時也是一九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中期，以中國最高權力者之姿君臨天下的鄧小平，其對法國麵包，尤其是對可頌麵包的喜愛，曾被揭露在中國記者或是外交官的隨筆集裡。作為一位勤奮好學的學生，鄧小平十六歲時留學法國，據說他每天早上去工廠上班途中，都會在麵包店買一個可頌麵包來吃，久而久之就愛上了這個味道，回國時還買下一百個可頌麵包給朋友當伴手禮。

後來鄧小平在一九七四年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他在紐約街上一看到麵包店，就把口袋裡的十幾元美金全部掏出來，買下可頌麵包，說要給一九二〇年代也曾留學巴黎的周恩來總理當伴手禮。此外，他曾在一九八四年造訪廣東省廣州，並在一家由香港人開設的五星級飯店白天鵝賓館的西餐廳吃到法國麵包，當時他感慨良多地說：「如今連廣州也能做出這麼好吃的麵包了，看來改革開放之路一點兒也沒錯。」

（《貴陽晚報》，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雖然這些故事當中並未具體提及麵包的味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沒有蠟燭味。鄧小平在廣州嘗到的法國麵包味道，經歷了二十年才降臨至上海的平民階層，抵達長順故鄉更是花了三十年以上的時間。

根據中國政府國家鐵路局公布的資料，中國高速鐵路的總營業里程在二〇一五年底達到一萬九千公里。光聽數據可能沒什麼感覺，但日本、法國、英國等中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所有高速鐵路營業里程合計起來是一萬一千六百〇五公里（截至二〇一三年一月為止），所以中國一個國家就遠超過這個數字。此外，雖然中國鐵路局曾發表說，截至二〇一五年底為止，人口五十萬以上的都市基本上都被涵蓋在高速鐵路網

的範圍內，但如今連像長順故鄉所在的安徽省農村那種，短短兩、三年前還是一片一望無際農田的地方，也都開始鋪設高速鐵路。

就業機會增加了嗎？

高速鐵路的開通，除了為農村帶來沒有蠟燭味道的麵包，還帶來了些什麼呢？

每一座建於農村的車站周圍，無不矗立著堪比都會地區的摩天大樓，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只是我在安徽省幾個蓋了新車站的地方，詢問計程車司機或當地人的說法，他們說：「現在是在摧毀村落，打造新都心，還有吸引工廠進駐。」、「看準都市化與開發而來的商務旅客變多了。」、「觀光客增加了。」由此可知，農村也開始藉由強化基礎建設，重現過去都會地區的發展模式。

在這之中，在都會工作的地方出身者於二〇一六年最矚目的一件事，就是就業機會開始增加。長順老家所在的村落，也已確定有外資製藥公司將在此建設工廠，聽說整個村落會在幾年之後搬遷，但撤離合約當中不僅保證，將在其他地方準備新的住所，而且有意願的人也可以在那個製藥工廠當作業員。

眼見就業機會開始增加，確實有愈來愈多人考慮從上海等都會地區回鄉發展。



## 重獲生存價值的中高齡者

長順的父親思順，趁著家鄉高速鐵路開通與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之際，做出了返鄉的決定。

在小學三年級結束接受教育的思順，過往的人生都在老家的棉花田務農，農閒時則到上海等都會做做警衛的工作，但大約從四十五歲那年開始，他在上海找不到任何工作，留在上海的最後五、六年借住在兒子的租屋處，並持續著無業的狀態。而且在最後的三年，從頭到腹部還長出原因不明的濕疹。

他勤跑醫院，從中藥到西藥都試過，卻仍不見好轉。長順在網路上搜尋後，致電拜託我說：「聽說資生堂有一款叫ENKURON軟膏的藥很好用。不好意思，你下次回國的時候，幫我從日本買回來吧。」我把藥帶回來以後，這種藥一度發揮作用，濕疹真的變少了。父子倆非常高興地說：「我們在電視上看過一個節目，說去日本購物的中國人說日本的藥是『神藥』，採購了一大堆進來，原來那是真的呀。」但過不了多久，濕疹的情況再度惡化，不管塗多少「神藥」都沒效了。

二〇一五年底，思順致電給我說：「我決定自己先回老家了。」我問他理由，他說長順在網路上找到數則上海迪士尼在徵求警衛與清潔人員的廣告，表明「急徵五十人，學歷、經驗不拘，五十歲以上可」，結果他打電話到上面提供的號碼，每一個接聽的人一聽到他五十一歲，便立刻掛斷電話。

「我一直覺得自己才剛過五十歲，應該還可以繼續工作才對，但這次的事情讓我下定決心了。不是說上海迪士尼有各式各樣的職缺，總共會採用一萬人嗎？警衛或清潔的工作也是，光是在我打電話過去的那個

時候，就有五百人的職缺耶，結果還是沒辦法。看來是時候到了。」

但回去要做什麼呢？原先不就是因為家鄉沒有工作，才來上海找工作的嗎？經我這麼一詢問，他答道：「高速鐵路開通後，有很多工廠或百貨公司進駐，聽說五十歲以上的人也可以找到警衛的工作。」

回到家鄉後的思順，立刻在最近剛蓋好的商業大樓找到警衛的工作，開始上班了。沒想到之前一直糾纏不休的濕疹，竟然就這樣平白無故地好了。看來濕疹恐怕是長期找不到工作的壓力所造成的吧。這件事不僅如實反映出一個人被社會需要，擁有工作的喜悅、精神上的支持與尊嚴，對肉體或身體會造成多大的影響，而且也可以說是高速鐵路開通的效果吧。

## 收入過低，年輕人不願回流

對於出身自高速鐵路沿線的人來說，有項事實讓他們無法全心沉浸在就業機會增加的喜悅中，那就是即使考量到物價差異，薪資水準依然過低的問題。

思順的月薪在週休一日的條件下，只有一千二百元（新臺幣五千二百八十元）而已。雖然當時和現在都是警衛，當時被派遣到工廠，現在變成了學校，但薪水直到二〇一七年的現在，還是只有一千二百元而已。二十到四十幾歲的人，若家裡有學齡期兒童，考量到這個低薪的現狀，實在很難下定決心返回家鄉。

在高速鐵路剛開通的農村地區，即使是新開業的工廠，每月薪資行情也只有二千元（新臺幣八千八百元）左右。雖然同樣在工廠工作，薪水卻是上海時期的一半以下。更何況農村的物價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什麼都比都會地區便宜了。儘管房租比上海低廉，每一百平方公尺大約五百元（新臺幣二千二百元），但在蔬菜或肉類等生活必需品的物價方面，農村與都會並沒有太大差別。即使如此，雙薪家庭的月收入若為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雖然不至於過苦日子，但一想到要存孩子的學費或結婚費用、父母年老後的照護費用，還有自己年老後以及接下來要支出的費用，要接受帳面收入減半還是需要勇氣。

即使高速鐵路正式開通，年輕人也不願回流的狀況，同樣也發生在工作相對有成就的人身上。

潤發夫妻的次男，在北京工作的漢雄與小敏夫妻即為一例。他們倆雖為同鄉，但這個村子也蓋了高速鐵路的車站。尤其距離妻子小敏老家不到五十公尺處，就有高速鐵路的高架橋經過。他們交往半年後，在二

○一五年十月搭乘開通三個月的高速鐵路返鄉，二十二歲的兩人在鎮上最好的餐廳舉辦儀式，禮車還特別挑選BMW。從漢雄念初中時就認識他的我，在潤發夫妻邀約下前往觀禮。

我在儀式前問漢雄說，高速鐵路開通後，鎮上也改變許多了，他有沒有想要趁結婚之際返鄉發展呢？他說：「現在回來的話，家庭收入會變成在北京賺的五分之一而已。年輕時就是會希望收入能夠不斷成長吧？如果不增反減的話，那就有點沒意思了。」

另一方面，長順看到父親在故鄉謀得一職，過得生龍活虎的樣子，也考慮憑著過去的理髮師經驗，回家鄉開一家店。只是他實際在家鄉看過幾間店面，調查了一下理髮業的市況後，發現「目前做不起來」，便打消了此念。「我打聽了一下，發現我想開的那種等級的店，剪髮竟然還有五元（新臺幣二十二元）的價格。就算房租再便宜，但因為不是露天攤販，所以光賺那些錢，每個月剩下來的跟在工廠上班差不多，頂多就二千元而已。」

只是到了二〇一六年，上海市郊的房租飆漲，長順的房東要求租金翻倍，他只好為了找房子四處奔走。

「我該回鄉下試試看嗎？」

對於上海不安定的生活開始感到焦慮的長順，每天內心都在動搖。

### 三、自用車與馬桶

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造訪長順的朋友小周在上海的租屋處時，內心有多麼震撼。

隨他踏入屋內，我第一眼見到的竟是一個西式馬桶，毫無遮掩地坐落在唯一的窗戶附近採光最好的地方。

## 馬桶外露的房間

我心想：難道這裡是浴室，客廳或寢室在別的地方嗎？但馬桶右邊有一張放著大型液晶螢幕的桌子，左側則有一張木製床。

「這裡小得讓你嚇著了吧？房間只有這一個而已，五百元（新臺幣二千二百元）的預算沒其他選擇了，因為上海的房租很貴，我故鄉的老家寬敞多了。」

雖然小周不好意思地說著，但房間的大小大約有五坪。因為這個房間裡總共住了三人，一對夫妻加一個三歲小孩，所以才稍嫌擠了些，但若光以大小來說，房間比這個更小的人比比皆是。不過我第一次見到這種馬桶直接裝在房裡的房間。雖然小周從天花板上掛了一張塑膠布，可以在上廁所時遮掩一下，但看到連窗縫中吹進來的風都可以吹動塑膠布就知道，那只是意思意思掛心安的而已。這讓我不禁聯想到以前在報紙上看過，日本死刑犯在監獄內住的那種獨居房。

小周家的房東是在這塊土地上務農的上海農家，他在自家的土地上蓋房出租，承租人全都是農民工。

## 農民間的貧富差距

房東究竟是出於何種考量，才沒替廁所蓋牆壁呢？

建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上海，也就是租界時期的舊集合式住宅，近年來雖然因為都更的關係，數量減少許多，但在保存至今的這類老舊傳統住宅中，沒有廁所的建築並不少見。而且還不是像日本早期常見的那種，房內沒有廁所但另設有共用廁所的公寓，而是在沒有整備下水道或化糞池的前提下，建築物內本來就沒有廁所，通常都在房間的角落使用俗稱「馬桶」的「便盆」解決生理需求。

像小周住的那種住宅，因為是這十年左右才建成的，所以要用膠合板圍出一個獨立廁所空間，應該不是什麼難事才對。之所以不這麼做，除了有可能對廁所的概念不同之外，身為一個已經在街道上、網路上、雜誌上，看過太多上海人將地方出身者蔑視為「鄉下農民工」的人，我不禁覺得自己彷彿聽見了房東的這番心聲：「有幫你裝馬桶就該謝天謝地了。」這就是上海農民歧視地方農民的現實。

我說聽見房東的心聲，並不是憑空妄想出來的，因為房東他們自己居住的宅邸裡，不僅設有完整的獨立廁所，最近還裝設了從日本「爆買」回來的免治馬桶座。

距今十七年前，我曾住在據說「可以體驗早期上海人生活」的老舊公寓裡，咬緊牙根忍受著沒有廁所的生活，並整整使用了半年的便盆，為此經驗嘗盡苦楚的我，深深知曉沒有廁所的生活有多不方便。但即使如此，我還是認為與其幫我們裝設一個裸露在外的馬桶，不如在原先沒有廁所的房間裡用便盆解決生理需求，還比較能夠保持精神上的安定。

## 與住家不搭調的汽車

說到小周不得不住在馬桶外露的房子裡，我一直以為那是因為夫妻倆一起在物流倉庫上班，家庭總收入才八千元（新臺幣三萬五千二百元），雖然以三人家庭來說，不至於過上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但他們考量到這筆絕不算充裕的收入，以上海來說相當於一名大學畢業白領階級的一人份薪水，所以才（像小周說的那樣）盤算著「我們只念到初中而已，所以想讓孩子念到大學」，把錢存下來當孩子的教育基金。

所以當我在距離初次拜訪小周家不到一年的二〇一六年一月，聽長順說「小周買了車子」時，內心簡直比看到他家時還要驚訝。他們都住在馬桶外露的家裡了，究竟哪來的閒錢可以買車呢？

小周買的是上汽通用在中國製造的Buick Excelle（中國名稱為別克英朗）。一．五升的小型四門房車，價格是十四萬元（新臺幣六十一萬六千元）。由於上海實施汽車的總量管制，因此車牌採競標制，最近最低成交價格高達八萬五千元（新臺幣三十七萬四千元），相當於一輛汽車的價格。不過也有很多地方出身者是在沒有總量管制的家鄉取得車牌，小周自己也是在老家江蘇省申請的，因此費用據說沒有這麼高。這可說是生活在上海的地方出身者少數的好處之一。

這一年在上海，每一對和小周處境相同的二十多歲夫妻檔，紛紛開始購入自用車了。所謂「和小周處境相同」的意思，就是出身地方農村，學歷只有初中或高中畢業，為了求職來到上海，住在房租便宜但交通不便的市郊，工作是基層勞動，家庭所得介於六千到一萬元（新臺幣二萬六千四百元到四萬四千元）之間的階層。由於上海二〇一六年的最低薪資是二千一百九十元（新臺幣九千六百三十六元），因此以目前的



上海來說，家庭收入六千元可說是非常接近底線的水準。

在四川省農村念完初中就來到上海的小魏夫妻是小周的朋友，他們也在二十四歲那年的二〇一六年一月買了自用車。車子是中國汽車製造商吉利的SUV，據（小魏）說購買價格九萬二千元（新臺幣四十萬四千八百元）是「在父母的少許資助下，一次付清」。他們和小周一樣，避開了費用昂貴的上海，在故鄉四川申請車牌。

至於每月的花費，「因為幾乎只有週末才開車，所以差不多就是二百塊（新臺幣八百八十元）油錢而已」，停車場則是「因為這一帶在上海也算是農村，所以隨便停在路邊也沒關係」。

## 和泡沫時期日本相同的危機

不過也有人暫緩購買計畫，那個人就是長順。

在小周隔壁物流倉庫上班的長順，見到一群朋友都打算買車，自己也受到了刺激。為了先考取駕照，他取得母親與妻子的同意後，從家裡的存款撥出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在二〇一五年的夏天前往駕訓班上課。這裡所謂的「家」，指的是長順一家再加上他的父母親。

他第一次路考沒通過，到了第二次才順利通過，還樂不思蜀地夢想著：「好，接下來就是在春節之前買車了，真想要日產的Teana啊，但我沒有錢，所以買二手的就好了。什麼？二〇〇九年產的也要十一萬元（新臺幣四十八萬四千元）？不過貸款買就可以了。」

然而沒過多久，長順便遭到裁員，不得不暫緩買車的計畫了。我問他，不過既然有想要買車的話，手邊應該有一筆存款了吧？結果他答道：「嗯……如果沒有收入的話，存款應該到第二個月就會見底了吧。」我接著說，這樣啊，那萬一在貸款買Teana的中途遭到裁員的話，不就糟糕了嗎？他又回答：「付不出來的話，車子會被車貸公司收走，那樣債務就抵銷了，所以壓力也沒那麼大啦，不過還是好險啊。」

根據他們購車當時的《日經新聞》（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報導，在中國的八家上市汽車製造商中，有七家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的決算金額比前期增加兩位數，尤其在一五年十月開始的小型車減稅背景下，擅長於小型車的中堅製造商收益更是大幅成長。

在泡沫經濟全盛期的一九八〇年代，日本出現過年輕人住在三坪套房，卻購買BMW等高級車的現象。或許中國的現狀也可以說是與八〇年代的日本類似，但親眼目睹像小周那樣，明明一家三口住在馬桶外露的

獨居房，卻仍擠出購車的費用，或是像長順那樣，覺得即使遭到裁員之後會沒有能力支付貸款，也只是車子被沒收而已，所以沒那麼擔心的情形就知道，他們購買自用車的行為，其實是建立在搖搖欲墜的基礎上。

## 奢侈的車內比瀰漫殘敗感的家更令人嚮往

話說回來，他們當時究竟為何紛紛掏錢購買自用車呢？

前面的《日經新聞》也有提到，中國在二〇一五年十月將排氣量一．五升以下的汽車購置稅，從以往的一萬二千元（新臺幣五萬二千八百元）減半至六千元（新臺幣二萬六千四百元）。小周與小魏都說：

「減稅是刺激我們買車的原因之一。」不過他們也說：「那並不是最主要的理由。」我問他們那最主要的理由是什麼，結果包括暫緩購車計畫的長順在內，三人只是一再說著：「為什麼喔……因為想要啊。」

只是其中的小周喃喃說道：「坐在車上會有一種自己變成有錢人的感覺。」另外兩人聽到以後也附和道：「沒錯，畢竟車子裡面比自己家裡還豪華嘛。」

雖然他們自己沒有明確意識到，但這恐怕是他們渴望買車最大的理由吧。當然，他們也不可能覺得馬桶外露的家住起來很舒適。

在小周、小魏和長順三人之中，只有小周住在馬桶外露的家，只是每次造訪他們的家，都讓我覺得屋內瀰漫著一股共通的墮落、殘酷而渾濁的氣息。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一股殘敗感。

上海市郊的房租從進入二〇一六年以來持續飆漲，小周與小魏的房租也在今年（二〇一七年）春節倍增為一千元（新臺幣四千四百元）。在不景氣的影響下，像長順那樣突然失業的案例也增加了。生活壓力明顯與日俱增。

小周斷言說：「在上海買房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事。」即使認真工作，也只能住在連一間完整廁所都沒有的房子裡。砸錢買輛好一點的車子，至少週末還能和家人一起忘卻平日的辛勞。就是這種想法，刺激了

他們購置自用車的欲望。

## 近在眼前卻遠在天邊的上海迪士尼樂園

見到自己的好友長順因為裁員而放棄購置汽車，再加上彼此職業、家庭環境、資產狀況都大同小異，小周與小魏雖然是一次付清，看起來卻多少有些恐懼。

「不過你看啊，就算失業了，只要有一臺車，還是可以靠像Uber或滴滴那種叫車服務賺錢啊。所以長順你也是，就算有一點勉強，還是買輛車比較好啦。」小周說。小魏也附和道：「對啊對啊，而且迪士尼樂園六月就要開幕了，這一帶交通這麼不方便，載人到迪士尼樂園或機場的需求肯定會再增加的。」長順聽了以後說：「也是。」表情變得明朗了些。

他們住在離浦東機場直線距離不到兩公里的地方，而且距離這一年六月開幕的上海迪士尼樂園，直線距離也只有十公里左右。另一方面，如果從市中心出發的話，以日本居住者也很多的婁山關路那一區為例，到浦東機場的直線距離為五十公里，到上海迪士尼樂園大約是三十七公里，但到浦東機場不僅有地鐵直達，還有磁浮列車和機場大巴，因此大約一個半小時就能抵達。另外，到上海迪士尼樂園也只要搭乘配合營業開通的地鐵，車程一小時左右，大眾交通運輸十分便利。

然而，小周他們住的地區雖然直線距離近多了，卻是與大眾交通運輸建設無緣的陸地孤島。若要搭乘地鐵去浦東機場或迪士尼樂園，雖然有市區公車可以搭到最近的地鐵站，但一小時只有一班車。光從自家出發到最近的地鐵站，就已經花上將近兩個小時，而且合法的計程車還不會開來這一區，所以他們每次要搭乘地鐵時，都不得不利用白牌計程車。

雖然從中國通往世界的門戶浦東機場，和象徵富饒中國的最新景點夢幻王國上海迪士尼樂園近在家門前，現實上的距離卻遠如天邊。希望如願以償買下自用車的長順，第一次前往迪士尼樂園是以客人的身分踏入，而不是白牌計程車或叫車服務的司機。

## 四、同類相食的溝鼠

當我在二〇一五年的某一天聽到潤發夫妻的長男敬敬說：「我弟弟漢雄開始在北京經營地下室公寓了。」當下內心第一個念頭是，哇，那個連外送工作都做不久的漢雄，如今竟然變成公寓主人啦，看他這樣出人頭地，婚事也確定了，想必長年在外地賺錢打拚的父母應該也稍微放心些了吧。

從前與在上海工作的雙親分隔兩地的漢雄，和祖母兩人一起住在安徽省農村的老家，我們第一次見面是他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後來他沒有按照父母的期望去念大學，反而嚷嚷著「討厭讀書」，連高中都沒念，直接到父母所在的上海，前前後後做過餐廳外送等短期工作，但旁人紛紛勸他至少要念完專科學校，出來才好找工作，於是他又回到鄉下就讀汽車修理的專科學校，畢業後在內陸的重慶就職，在一間美國汽車公司的汽車修理廠當維修人員。

當旁人還很高興他找到一份穩定工作時，他卻因為受不了長時間的體力勞動，沒多久便提出辭呈。剛好那一陣子，他有一個在北京開公司，專門承包停車場管理工作的親戚實在看不下去，便叫他到北京來幫忙做事，他的父母卻在默默猜想，這次不曉得又能撐多久。

因為知道漢雄有這樣的過去，所以當我聽聞他開始經營公寓的消息，當下反應是「哇，他在北京的生活挺順利的嘛，明明沒有學歷卻能在短期內存到頭期款，買下中古公寓，不過才二十多歲的人，看來他相當努力啊」，單純為他現在的境遇感到高興。

只是等我稍微冷靜下來之後，我再度琢磨起敬敬說的話。雖然說是公寓，但漢雄經營的是「地下室」。「地下室」這三個字，在我的口中



留下了一絲絲的苦澀。

我原先擅自認定他買下了中古公寓，再把公寓租出去，但實際情況似乎並非如此。

北京的地下室公寓可不是有錢就能買的地方。要說「權力」或許有點誇張了，但除非和那些掌握有錢也買不到的「權利」的人有交情，否則根本不可能參與地下室公寓的經營。

## 住在地底的百萬鼠族

隨著不動產價格屢創新高，無法在「地上」租屋的地方出身低收入者，開始居住在原本非供居住，設於地下空間的狹窄房間內，而這個現象最初受到關注，大概是在二〇〇八年北京舉辦奧運的那一陣子前後。其後，地下居住者數量持續增加，巔峰時據說更多達上百萬人。這些地下居民又被人稱作「鼠族」，因為他們就像在地下築巢而居的老鼠一樣。

據說北京的這些地下空間，是在冷戰時期的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代，為了預防蘇聯入侵而挖掘的防空洞。雖說一開始並未規定這些防空洞不能設置住家，但隨著地方人口持續流入北京，居住在地下的人數不斷膨脹，最終使得治安或防災面的問題開始受到重視。然後在二〇一一年的條例修正案中，明文禁止民眾將原非居住用途的地下空間當作住宅出租。

只是在那之後地下居住者依然沒有顯著減少的跡象。中國當局每年都會配合春節或國慶日等節日，舉辦撲滅犯罪等活動，並以一年數次的頻率在這些日子加強取締地下室，但活動結束後又會再緩和下來，就這樣周而復始。

## 做生意看門道

話雖如此，但因為受到條例的明文禁止，所以並不是什麼人都能參與這個「市場」。大部分情況下，承包公寓管理業務的不動產公司就是地下室租賃的總管，管理公司再把尋找承租人或收房租等工作外包給其他公司或個人，漢雄的位置就在這個部分，然後徵收到的房租與管理公司對半拆帳。除此之外，管理公司還要視情況需要，從這之中進貢一部分給管轄這個地區的「組織」。

二〇一五年的北京租賃住宅平均價格是四千四百六十三元（新臺幣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元，偉業我愛我家市場研究院調查）。相對於此，漢雄所管理的兩處地下空間共有十三間房，平均房租是每月六百元（新臺幣二千六百四十元）。

二〇一六年六月，我在北京，請漢雄帶我參觀地下室。這一年的春節有一波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取締，所有居民都暫時出去了，但還是有八成空間塞滿東西。雖然所有塞不進二到三坪空間裡的家具雜物都擺在走廊上的光景，和地上的便宜公寓一樣，但空氣卻阻滯不通。光是想像自己每天走下樓梯，邁向那個自然光完全照不進來的黑暗深處的家，內心就不由得憂鬱起來。不過比起地上的房租，六百元的價格還是便宜許多。

## 同類相食的掙扎與現實的選擇

老實說，當我聽聞漢雄在做地下室生意時，絲毫沒有想要針對「從事條例禁止的事業」這一點去指責他，因為這裡是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中國，與此相似的情形簡直如家常便飯。

只是，在北京地下居民的問題當中，存在著都市人落井下石，蠶食地方出身者的結構。在敬敬與漢雄兩兄弟雙親工作的上海，雖然不像北京一樣有那麼多地下住宅，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確定將被拆除，按理不得居住的廢墟。敬敬與漢雄的雙親潤發夫妻，也是輾轉流連於比正規住宅便宜的廢墟中，一直以來都過著低調的生活。

正因如此，對漢雄而言，向那些與自己父母或自己本身境遇相同的人做地下室生意，也可以說是一種同類相食的行為。針對這一點，我很好奇漢雄內心是否有掙扎。一問之下，他說光是在可容納八百輛車的停車場從事「正業」的管理工作，每個月就有一萬五千元（新臺幣六萬六千元）左右的收入。足月的妻子雖然開始休產假，但還是有一份工作。既然有那麼多收入，就算不經營什麼地下室，應該也可以過著相對充裕的生活才對。

管理公司應該是肯定漢雄經營停車場的實績，才把地下室的管理也交給他。只不過，若是相對寬裕的地方出身者也利用貧富差距來做生意，那麼都市人與地方出身者之間、強者與弱者之間的貧富差距，恐將永遠不會從這個國家消失吧。

## 個人利益最大化

話雖如此，我沒有勇氣當面向漢雄坦白這番心情，因此我試著向較常與我交流的哥哥敬敬表達我的想法，卻見他臉色一沉，說：「你說那些在北京沒有家、赤手空拳從地方上來這裡的年輕人，怎麼可能從四千元、五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到二萬二千元）的薪水中擠出五千元的房租呢？我弟給他們提供便宜的住宅，那些住戶還很感謝他呢。」

在離開北京前，我問漢雄，哥哥說他以便宜的價格提供住處，住戶都很感謝他，他自己怎麼想呢？結果漢雄苦笑道：「老哥那樣講啊？」接著立刻一臉正色，嘴裡嘟囔道：「他們才不感謝我呢。」然後說：「地下室公寓的事只是我運氣好，剛好逮到機會罷了。」

他的哥哥敬敬在國家研究院附屬研究所的博士課程中，研究如何改善空氣汙染。除了學費全額補助，每個月協助研究所業務，還有二千元（新臺幣八千八百元）左右的酬勞可以領。畢業後要留在研究院工作的話，還得符合海外留學三年的條件，因此敬敬也預計將去美國留學，但他經常提起「有機會的話，想直接移居美國」的心願。

## 逃跑的菁英

每次聽他這樣說，我都會教訓他說，如果像你這樣的菁英都移居海外的話，到底誰要來解決中國嚴重的PM2.5問題呢？為國效命不正是像你這樣的年輕菁英的使命嗎？一旦取得一定程度的條件或權利，你們就加入一味行使權利而不解決問題的那一方，這就是中國最大的問題。

「嗯，你說的沒錯。」敬敬每次都認真聽我說教，看起來也理解我的意思。

不過，聽完他們的分享以後，我總覺得無論是敬敬還是漢雄，他們實際採取的行動似乎都是以如何將個人權利或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國家或改善貧富差距為判斷標準。同時我也認為，那對他們來說或許是在中國現實基礎上，所能採取的最佳解吧。

## 第五章 | 徬徨

單親媽媽喬女士的房間。(2015年·上海)



## 一、聳然佇立的正宗哥吉拉

在二〇一六年上映並大獲好評的電影《正宗哥吉拉》，我是在滯留日本期間所借用的工作地點，也就是橫濱港未來附近的電影院觀賞的。雖然哥吉拉最初現身在東京灣的羽田沖，不過若從那座電影院望向羽田沖，似乎就是可以目視到哥吉拉從海中向高空噴射水蒸氣的距離。哥吉拉登陸後，一邊破壞掉腳下的道路或橋梁，一邊前往摩天高樓林立的武藏小杉，那裡也是我在日期間每天必經之處。熟悉的生活圈成為電影的舞臺，為這部電影增添了更多趣味性。



## 生氣的哥吉拉與不生氣的人類

電影雖然有趣，但正因為是以鄰近的生活圈為舞臺，所以有一點令我特別在意，那就是劇中生氣的竟然只有哥吉拉，明明整座城市被摧毀得殘破不堪，卻沒有半個人動怒。

關於《正宗哥吉拉》暗喻的對象，有人說是核電廠事故，有人說是戰爭，有著各式各樣的解釋，但無論如何，因為這些都是人類惹出來的事端，所以對哥吉拉生氣也是無的放矢，不過也不能就這樣置之不理，最後才會以這種不得不嚴肅面對處理的態度去呈現，而沒有讓人類生氣吧。但若果真如此，那未免也太像資優生了。

畢竟為了全家人的幸福，好不容易用這輩子大半薪水買到心中夢想的公寓，結果就這樣遭到摧毀，難道不會感到憤怒嗎？雖然劇中的似乎幸運地逃過一劫，但假如是前文提到的武藏小杉，那裡的摩天大廈可不便宜。

我當初在橫濱港未來設置工作據點時，心想如果可以住在武藏小杉就方便多了，一方面房租也不便宜，乾脆貸款當繳房租算了，結果一查之下得知，那一帶的房價大約介於七千萬日圓到一億日圓（約新臺幣一千九百萬到二千七百萬）之間，當下便打消購置念頭。據說購置武藏小杉摩天大廈公寓的，都是家庭年收入一千萬日圓（新臺幣二百七十萬）以上的階層，但我在路上看到的居民，很多都是家有學齡兒童的年輕夫妻。若考量到長期房屋貸款與學費，可處分所得應該沒有年收入所想像的那麼多才對。我想即使不是武藏小杉，看到千辛萬苦買下的公寓被摧毀，怎麼說也該有一個人情緒失控，暴怒大吼說：「可惡啊，你這隻死哥吉拉，快給我適可而止！」才比較真實吧。

## 面對不公不義也雙手一攤說「沒辦法」的中國人

說到不生氣，現代中國人也給我一種不生氣到不可思議程度的印象。

我每一天都在上海的某個角落對中國人發怒，例如對騎著警用機車朝綠燈過馬路的我直衝而來，撞開路上行人的交警，或者是毫不客氣地說要提高三成房租，卻又說「打合約很麻煩，真討厭」的受惠於泡沫經濟而賺錢一事擺出高姿態的上海人房東夫婦。然而，明明中國人應該也遭受到同樣的對待，卻好像只有我一個人正在生氣。說整個中國是有點言過其實了，但顯然整個上海就屬我特別生氣。

不過說來說去，不想打合約的房東或不守規則的交警，說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所以還不打緊。只是中國還有一大堆遭遇不公不義的人，包括我前文提到的那些朋友。

正如前文所述，單親媽媽生小孩在中國被視為違法行為，只有女性一方會被科處罰金，而且罰金還沒有固定金額，要先由地方官員到家裡視察，再從家具擺設去估價，算出一個勉強可以支付的金額。我的朋友喬女士就因為那樣，被徵收了六萬元（新臺幣二十六萬四千元）的罰金，幾乎等於她和家人全部的存款。

出生農村的人因遭遇不公不義而吃虧的比例，遠高於都市出生的人。我出生於一九六五年，今年（二〇一七年）五十二歲，但在與我同世代或四十幾歲的中國農村出身者中，連小學都沒念完的人數可說是多得驚人。此外，有些人即使有機會上小學，入學年齡也參差不齊，或者有人在十五歲放棄上小學時，還只念到小學三年級而已，類似的情形屢見不鮮。雖然中國從一九八六年才開始實施小學六年、初中三年的義務

教育，所以也有無可厚非之處，但即使如此，同樣在中國，至少我從沒遇過任何同世代出生在上海或北京的人沒念完小學。

不用說，起因於不公平的教育機會差異，當然也會影響到求職。

從一九九〇年代到人事費用顯著飆漲的二〇一〇年前後為止，中國一向被稱為「世界工廠」，雖說冠以中國之名，但那些在第一線擔任產線工人，忍受長時間的重複性作業，住在八人、十人同居的擁擠宿舍或彷彿倉庫改造的破舊公寓中，並領著低薪撐起世界製造業的人們，大多都是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出身者。伴隨著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和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而完工的都市建設，負責體力勞動的也都是從農村出外賺錢的勞工而非都市人。

這些在都市地區的勞動都是相當吃重的工作，比起同年齡層的都會上班族，整體薪水也普遍較低。只是，對於學歷相對較低的他們來說，比起在農村或內陸的地方都市工作，都市地區的勞動比較能賺到現金，也確實是重要的經濟來源。

## 被都市拋棄的農民

然而，大約從二〇一五年秋天開始，許多農村出身基層勞工居住的上海市郊，房租開始急速飆漲。另一方面，他們的薪水在中國經濟減速的背景下到達極限，再加上全球智慧型手機和個人電腦市場飽和，製造這些產品的中國工廠加班時數銳減，產線工人的薪水與上漲的物價相互抵銷後，不少人的實質薪資倒退到二〇一四年巔峰時期水準的一半。

然後從二〇一五年年底到隔年年初，陸續發生有人無法忍受而返鄉求職的現象。也就是說，都市利用完這些農村出身的基層勞工，就開始任意拋棄他們了。

每一次當我見聞那些出身決定終身機率極高的農村人的人生，就對如此不合理的現象感到無奈，氣憤這社會為何如此不公平。我原本以為他們自己應該也很不甘心，沒想到他們卻只是雙手一攤說了句「沒辦法」。大約從景氣開始出現衰退跡象的二〇一四年起，感覺他們抱怨「只有經營者賺錢，真是不公平」的頻率變得比以前多了，不過這純粹是抱怨而已，還沒發展到憤怒的程度。

我猜想中國人碰到交警騎車衝向行人，或房東懶得打合約之類的情形，應該不會放在心上吧。只是對於都市與農村，還有在生孩子方面的男女不平等，各種條件造成的不公不義，他們竟然也能夠無動於衷，我真的無法理解這一點。

就在我對此感到匪夷所思之際，也就是看完《正宗哥吉拉》不久之後，我回到上海，見到一年沒見的鄭凱先生，他給了我一些提示，讓我解開中國人不生氣之謎。

## 離開窮途末路的上海，前往新天地

鄭凱先生從存款當中撥出十萬元（新臺幣四十四萬元），投資十八歲長女與朋友在湖北省武漢開的美容沙龍。其後，他在二〇一五年六月離開物價持續上漲、基層勞動日益減少的上海，打算到女兒做生意的武漢捲土重來。

我很好奇鄭凱先生在武漢的生活狀況，但他換了手機號碼之後，我們便失去了聯絡。在他離開上海一年後的二〇一六年九月，我接到他的電話，說：「我決定再來上海打拚了，我八月就在這裡了。」

當初他明明是因為無法在上海生存下去才決定離開，但才過一年就回來，所以不難想見的是，這表示在武漢的生活恐怕不甚理想吧。我有點害怕見到他，但又很高興他聯絡我，於是立刻約他吃飯。

鄭凱先生比最後一次見面時長了一歲，但看上去比想像中還年輕。不，我反而覺得他看起來比在上海做廢棄物回收時還要年輕。見到他這個模樣，我稍微放心了些，因為他應該沒有像我擔心的那樣吃了不少苦，但當他一邊吃飯一邊分享這一年來發生的事，我才知道他不是沒有吃苦，而是實際上什麼也沒做，或者該說，是什麼也做不了才對。先不論精神上如何，他之所以沒有想像中那麼老，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的身體沒有過度操勞吧。

## 無以為繼

帶著太太一起前往武漢的鄭凱先生，在新興住宅區找到出租店面，開了一家水果行。第一個月的生意還算可以，但第二個月附近開了兩家水果行，第三個月又再開了三家，方圓不過一百公尺的土地上就聚集了六家水果行，因此他那家店的銷售額就減少了。其他水果行也一樣，全都陷入同樣窮困的狀態。

鄭凱先生給女兒投資的美容沙龍也面臨同樣的狀況，附近聚集了許多競爭對手，每家店都沒賺多少錢，只能勉強支付店租，要是也付家裡的房租就會陷入虧損狀態。

有些人可能會想，為什麼同樣的店要開在一起呢？我只能說水果行在中國是資金少的人做生意的第一步。換句話說，他們並不是故意開設水果行，而是因為在現實上，如果沒有其他創業構想和經驗，唯一能開的只有水果行而已。美容沙龍也是，很多人只是看見這股風潮，感覺好像會賺錢，便投入這門生意了。

當時鄭凱先生心想，繼續開店也只是增加虧損金額而已，便在短短三個月內收掉水果行，而且還直接放棄武漢，打道回鄉下老家去了。雖然有考慮找份工作，但才初中畢業又四十幾歲的他，能做的工作只有大樓或公寓的警衛或清潔工而已，薪水大約是上海的三分之二到一半的程度。「人家說武漢物價低又賺得到錢，我才過去的。雖然那裡房租確實比上海便宜，但其他物價跟上海也沒差多少，所以存不了錢。與其這樣，不如到薪水較高的上海工作，心情還比較好吧。」鄭凱先生說。

我問他女兒的美容沙龍怎麼樣了？他說：「我女兒結婚以後懷了孩子，現在待在鄉下老家。」看來生意不是很順利，十萬元資金恐怕都付

諸東流了。他說女兒的結婚對象是她的青梅竹馬，目前沒有固定工作，最近在上汽車駕訓班。此外，直到去年都還說要送去上大學的長男，今年夏天從初中畢業了，卻也沒去念高中。「他自己都說不想去了，我也沒辦法。我把他叫來上海工作，要出社會得先鍛鍊一下，讓他累積經驗。」他說。

## 重返毫無展望的上海

鄭凱先生最初會離開上海，就是因為物價高漲與求職困難，導致生活無以為繼。那樣的狀況在一年後依然沒有任何改變，但當時我周圍開始出現一些像鄭凱先生一樣的朋友，他們在二〇一五年到二〇一六年春節前後，因為在上海找不到工作，紛紛返回家鄉或去其他地方都市求職，結果求職不成又陸續回到上海。但我要在此重申的是，當初迫使他們離開上海的狀況，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換句話說，失去方向的農村出身者開始徬徨失措了。

當初廢棄物回收工作快要經營不下去時，連以往從未抱怨過隻字片語的鄭凱先生，也開始嘀咕說：「賺錢的都是有錢人。」

經過兩年以後，雖然長孫出生是一件值得賀喜的事，但若客觀檢視他這一年來的經歷，鄭凱先生一家的狀況可說是比前一年更加辛苦。見鄭凱先生為了配合國家需求而流離失所、四處碰壁，我想他應該會對國家或社會有所不滿，內心積滿無處宣洩的怒氣吧。



## 頌揚中國的失業者

然而，當他一口氣說完這一年來的狀況後，明明我什麼也沒問，他卻話鋒一轉，悠悠地說：

「中國已經成為傲視世界的強國、大國了，我們確實變得更好了。」

咦？怎麼突然說起這個呢？當我還在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話題感到疑惑時，他已經開始滔滔不絕地頌揚起中國了。他說：「你知道『一帶一路』吧？就是連結起中國與中亞、歐洲、非洲的經濟圈。那個之所以能夠實現，也是因為中國產品的品質變好了，愈來愈多國家想要中國的東西了。」還說：「為了國防安全，我們的負擔變重也是沒辦法的事。為了變成一個強國，勢必得強化軍事才行。」又說：「去年股價下跌對吧？現在中國的經濟確實不好，但如果一味追求成長而迅速發展的話，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可就無法挽回了，現在正是該忍耐的時候啊。」

最後的經濟與環境等話題，確實如他所說。只是在那環境保護的名義下，被迫當代罪羔羊的，都是中小規模企業或像鄭凱先生那樣無力的個人，他還因此無法再從事自己多年來最熟悉、最有經驗也情有所鍾的廢棄物回收業。這樣的話由他來說，不會有點太美化現實了嗎？

我原本打算這樣對鄭凱先生說，卻又突然打消此意。因為我很容易想像得到，以前幾乎沒批評或抱怨過誰，也不曾談論過國家話題的他，究竟是從哪裡吸收到「強國」、「大國」和「環境保護」等單字。

取而代之地，我說：

「鄭凱先生，這一年來你工作變得比較有空了，所以看了很多電視吧。」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彷彿在說：「哎呀，露餡啦？」接著點頭稱是。下一秒又立刻恢復正色說：

「中國確實比以前好多了，明天會愈來愈好，將來還會再更好，成為更強大的國家，我真的這麼認為。」

見到鄭凱先生不僅沒有因為失業而爆發滿腔憤懣或怒氣，反而還成了愛國主義者，我不僅覺得電視的影響力仍然不能小覷，也佩服中國當局考量得相當周全。而鄭凱先生等人之所以能夠不生氣，是因為他們現在至少還能夠相信「下一個變好的就是我了」。

「但是啊，鄭凱先生，」我說，「成長總有一天會停止，就像日本也一樣，好像沒有例外喔。所以啊，抱著『成長該不會已經結束了吧』的心態，去思考許多事情，說不定會比較好吧。」

頓時，我看到他眼裡閃過一絲不安，接著轉換為怒意。

那眼神彷彿在說：「都還沒輪到我，我不容許這種事情發生。」那一瞬間，我以為自己看到的是，在盛怒中摧毀摩天大廈的哥吉拉那雙血紅色眼睛。

無論暗喻的對象是核電廠事故還是戰爭，在《正宗哥吉拉》中登場的日本哥吉拉，描繪的肯定是對於製造出無法控制的、愚蠢的事物，所產生的憤怒的化身。倘若哥吉拉現身中國的話，那大概便是像鄭凱先生那樣的人憤怒的化身吧。

## 二、流離失所

中國有一項迷信，只要是條件符合的中國人就幾乎一〇〇%會相信，就是「祛除厄運要穿紅內褲」。

在日本只要提到年男或年女，也就是正值本命年的男女，大家都會覺得那一年會是運勢突飛猛進的好命年。然而在中國，人們認為那一年的干支會沖到吉位，所以把年男、年女的「本命年」視為厄運年，但只要穿上紅內褲就能祛除厄運。進一步詢問下，正值本命年的人遇到厄運年都會買紅內褲避邪，而且還不是一、兩天而已，是一年幾乎三百六十五天都穿紅內褲。

我的一位上海朋友小費也是，因為二〇一六年是他三十六歲的本命年，所以他當然毫不猶豫地穿上紅內褲祛除厄運，但我十二月中旬見到他時，他卻面色不快地說：「我還以為自己終於要熬過厄運年了，沒想到最後的最後來了個大災難。」我惴惴不安地問怎麼了，擔心該不會是他家人出事了，結果他說：「就在我打算買第二間公寓時，新規定頒布下來，害我不能買了。白白損失了一個賺錢機會啦。」我不由得面露苦笑，心想上海人不愧身處在失控的不動產泡沫中，講的話都跟別人不一樣。

## 家不是用來住的

以全國的都市地區為中心，中國的房價始終居高不下，因此自二〇一六年九月起，上海、北京等二十個以上的城市相繼實施限購政策。同年十一月底，上海也決定一個家族用房貸購置不動產，第一間的頭期款至少要繳三十五%，第二間則必須依據價格或面積，支付五十至七十%的頭期款，否則將不得購置。小費看中的不動產就屬於頭期款七十%的類型，因此才會惋惜說：「如果可以買的話，一定能夠賺到價差，但七成實在是沒辦法，今年真是大凶年。」

三年前他在上海市郊以一百五十萬元（新臺幣六百六十萬元）買到一百平方公尺的公寓時，還一臉客氣卻又藏不住喜悅地說：「我終於買到期盼了好久的家了，我要努力工作，趕快把貸款還清。」然而在接近二〇一六年的尾聲時，他說的話卻不一樣了：「日本人覺得家是用來『住的』對吧？中國人可不這麼想喔，我們覺得家只是用來轉手賺錢的『商品』而已。」

經歷過二〇〇八年的雷曼兄弟事件、二〇一一年的東日本大地震與核電廠事故，再加上近來因移民問題或民族問題而動盪不安的世界局勢，我想儘管程度因人而異，但應該每一個日本人都開始產生危機意識，認為沒有什麼東西是絕對的吧。如果從這樣的心理來看，小費那種斷言家是「轉手賺錢用的商品」的想法，肯定顯得傲慢無禮，但上海房價飆升的速度，也的確快到有可能讓他產生這樣的錯覺。

## 失控的上海不動產泡沫

例如在離小費住的市中心三十五公里遠的青浦區，全新公寓每一平方公尺的平均價格，從二〇一六年一月的一萬八千四百元（新臺幣八萬〇九百六十元。Fang.com調查，以下皆同），漲到十二月的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元（新臺幣十四萬三千九百七十六元），一年之內上升了七十七%。如果是在單價更高的市中心，例如靜安區從年初的六萬六千三百二十九元（新臺幣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八元），漲到最近的八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元（新臺幣三十六萬二千八百九十元），漲幅雖然只有二十五%左右，但以一百平方公尺來說就是八百二十四萬元（新臺幣三千六百二十六萬元），換算成日幣就是一億三千萬圓。

這還只是平均價格而已，在圍繞上海而建，人稱「外環」的高速公路環狀線以內的區域，以面積來說大約是六百八十平方公里，只比東京二十三區的六百一十九平方公里大一些，假如想在這個區域購買一百平方公尺的全新公寓，「沒有六百萬元（新臺幣二千六百四十萬元）是不可能的」（上海的房仲業者），也就是說，房價已經飆漲到一億日圓是最低下限的程度。

和多數熱中於生財的中國人一樣，小費也玩遍了股票、不動產與投資信託。有趣的是，只要看他對哪些生財工具投入最多資金，就能知道當前中國的錢都往哪裡集中，又從哪裡脫手。

儘管針對個人推出的，標榜六到十%高利率的金融商品「理財商品」，遭到質疑有債務不履行的風險，但在市場過熱的二〇一四年前後，他說自己當然也買了一些理財商品。然後在二〇一五下半年到二〇一六年，我發現好像有愈來愈多經手理財商品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或投資

信託公司的營業據點關門，詢問小費後，他說：「從二〇一五年夏天上海股市暴跌以來，理財商品就不行了。我二〇一六年就處分掉所有的理財商品了。你問我賺多少？我最後處分掉的是五萬元（新臺幣二十二萬元）吧。」

接著就在他準備把處分掉的理財商品轉投資不動產時，頭期款七十%的新規定頒布下來，「運氣真差，才晚一步就賺不到了。」換句話說，他明明毫無損失，卻愁眉苦臉地哀嘆著，彷彿世界末日到來一樣。

小費的情形似乎反映著上海一般上班族的日常，看著他的狀況，就感覺上海新頒布的購置規定，對抑制房市泡沫化已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只是在實施新規定之前，一般平民階層中仍有許多透過反覆轉手賣出，賺取高達上千萬，甚至上億日圓銷售利潤的人。

更令人擔心的是，提高頭期款比率的購置規定，恐怕會讓不動產更加集中於有能力重複購置的富裕階層或既得利益階層，造成無法挽回的貧富差距。然後像鄭凱先生那樣，過去十年來都定居在上海工作的地方農村出身的低所得階層，則為了尋找工作與住處遷徙流連於中國各地。

我在前文多反覆著墨的，包括中國為了舉辦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或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而推動國家建設之際，是這些來自農村、教育程度較低的出外賺錢者，在支援著上海的體力勞動或基層勞動需求；面臨不動產泡沫化所造成的房租飆漲，或經濟成長衰退所造成的薪資極限，令他們在上海的生活愈來愈辛苦，其中一部分人期待地方隨著高速鐵路開通等基礎建設完工而有所發展，愈來愈多人離開上海返回家鄉；然而他們對於明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物價都與都市不相上下，月薪卻只有一千五百到二千元（新臺幣六千六百元到八千八百元）左右的環境感到洩氣，卻在明知物價高漲與求職困難致使生活無以為繼的狀況毫無改變的

情況下，又接二連三在一年之後重返上海。

## 已達薪資天花板的農村出身者

這些人在二〇一七年的上海，究竟又賺到多少錢呢？

這裡只介紹我朋友的例子：在物流倉庫做電話銷售的初中學歷二十六歲男性長順，他的基本薪資是二千八百元（新臺幣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元）；從事廢棄物回收的初中學歷四十三歲男性鄭凱先生，他上個月的收入不到三千元（新臺幣一萬三千二百元）；星期一到星期六在多戶人家當家庭女傭的高中學歷三十七歲單親媽媽喬女士是三千七百五十元（新臺幣一萬六千五百元）；在提供住宿的火鍋店工作的初中學歷十七歲男性，鄭凱先生的長子是三千元；週休半日在四川特產麵店工作的初中學歷四十五歲女性，鄭凱先生的妻子是三千元。

根據中國政府的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在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公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二〇一六》，二〇一五年的流動人口，亦即從農村到外地賺錢的人數是二億四千七百萬，占總人口的十八%，平均月收入為四千五百九十八元（新臺幣二萬〇二百三十一元），比前一年成長三十四%。長順兩年前在其他公司同樣做物流工作時，月薪確實是四千五百元，符合政府統計出來的平均數字。

但到了二〇一七年，他在上海從事任何工作都無法突破三千元的極限。

我不清楚中國政府二〇一六年的統計結果如何，但現實就是他們的收入正日益減少。

另一方面，假如想在上海市中心承租二十平方公尺的套房，即使是屋齡八十年的老舊公寓也要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按照目前的狀況看來，他們已經不可能一面在上海工作，一面獨自居住在市中



心了。

## 失去立足之地的農民

鄭凱先生沒讓兒子上高中，與太太一家三口在二〇一六年夏天重返上海。我問他為何沒讓兒子繼續升學，他說：「在上海就算只有初中畢業，幫房仲發傳單一天就有一百元（新臺幣四百四十元），每天發的話就是三千元，比在鄉下賺得到更多現金。全家人一起做的話，一個月就有九千元（新臺幣三萬九千六百元）。只要大家住在一起，勉強還過得去吧。」

只是在廢棄物價格暴跌前的二〇一四年，九千元這個金額在生意好的時候，鄭凱先生一個人就能賺到了。更何況，幫不動產公司發傳單的工作，當學生打工還可以，但以一個放棄念高中、前途茫茫的十六歲少年來說，實在太沒有展望與希望了。

失控的不動產泡沫讓他們在上海失去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假如不動產泡沫破裂的話，也不會有發傳單的工作了吧。

二〇一七年春節前，我問前文介紹到收入現狀的那些朋友，春節過後何時回來上海，結果每個人都說：

「不知道會不會回去耶，先在家鄉觀望一下再說。」

不過我們已經知道的是，他們在家鄉並沒有滿意的工作與收入。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有一些不得不這麼回答的狀況。

事實上，他們所有人都回來上海了。自從二〇〇〇年代來到上海，十幾、二十年來都在上海生活的他們，如今開始在中國漫無目的地尋找安身之地。即使只看我自己的朋友，那人數還是明顯在急速增加當中。

## 著眼於日本的中國農民

中國政府管轄華僑政策的僑務辦公室網站，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在日本每年失蹤幾千中國人，他們哪兒去了？〉。文中引用日本法務省的統計，指出截至當年六月，以技能實習生身分滯留日本的外國人共有二十一萬人，其中中國人占六成，而且失蹤的實習生人數從二〇一四年的四千八百四十七人，增加至二〇一五年的五千八百〇三人，不僅是有史以來最高的數字，當中更有三千一百一十六人是中國人，大部分失蹤者似乎是為了謀求待遇更好的工作，而在日本非法就業。

此外，《日本經濟新聞》（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也引述日本法務省的調查，指出在日本農家面臨高齡化與人口減少所造成的嚴重人手不足背景下，農產業的外國人非法就業情形正急速增加。在二〇一五年強制驅逐出國的非法就業者中，從事農業者比前一年增加三倍，達到一千七百四十四人，占全體的三成之多，而且國籍以中國、泰國和越南為大宗。除此之外，最近也愈來愈常看到有報導指出中國遊客搭乘郵輪，在日本靠岸後就失蹤的人數正在增加。

日本有雇主會讓技能實習生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或有日本人為了賺取暴利而明知對方是失蹤實習生還非法雇用的新聞，也被中國媒體廣泛報導。因此，很多人都知道即使去日本當實習生工作或非法就業，也無法賺到太多錢。只是中國人在日本失蹤或非法拘留之所以呈現增加趨勢，與中國國內有愈來愈多流離失所的農村出身者，在都市或在家鄉都賺不到錢一事，恐怕並非全無關聯。

前文介紹的那些朋友出生地是安徽省與河南省。我問他們在自己的

家鄉，有沒有遇過別人邀他們去日本技能實習或非法就業，或者是聽過相關的傳聞，結果每個人都說沒聽過。看來目前的實習生或失蹤者，應該還是以鋼鐵或煤礦等深受成長減速打擊的產業較多，且以氣候嚴寒的東北地區，或是海外移民文化根植的福建省等地的出身者為主吧。

總而言之，無論不動產泡沫過熱或破裂，流離失所的農村出身者增加的狀況，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一項不安因子。同時對日本來說，也擴大了直接面臨一項問題的可能性，也就是企圖在日本就業的中國農村出身者流入的人數攀升。

### 三、EXILE與中國農民

中國有一位羽毛球選手叫林丹，曾經蟬聯北京與倫敦奧運會的男單冠軍。羽毛球在中國是與桌球齊名的國民運動，也是一種相當受歡迎的休閒運動。我在上海第一個任職的國有雜誌社，也會趁午休利用會議室的桌子打桌球，然後每個月大約會有一、兩次，在週六或週日借用初中或高中的體育館，同事們聚在一起打羽毛球。

林丹選手在這樣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中蟬聯奧運冠軍，其中還有一次是由自己國家舉辦的金牌，自然一度被視為國民英雄。

之所以說「一度」，是因為林丹選手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爆出婚外情。

林丹選手的妻子謝杏芳也是一名羽毛球選手，她曾在北京奧運會中奪下女子單打銀牌，兩人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不到兩週，八卦媒體就公開林丹選手與模特兒外遇的照片。這起日文所謂的「下流不倫」，遭到媒體與民眾大肆撻伐。

順帶一提，過去「不倫」在中文裡，通常稱作「婚外情」，但不知從何時開始，「出軌」一詞，亦即踏出軌道的這種形容方式，變成了慣用的表現。在報導林丹選手這起婚外情的新聞標題中，有所謂的「孕期出軌」，也就是在妻子懷孕期間發展的婚外情。此外，林丹選手也遭群眾指責為「渣男」。「渣」這個字與日文同意，即「碎塊、碎屑」，也就是「爛男人」的意思。「孕期出軌」的「渣男」，這讓我再次體認到中文是多麼直接而生動的語言。

林丹選手遭大肆撻伐為「渣男」，若不論言詞之激烈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無可厚非之事吧。只是在這場騷動中，有一件令我在意的

事，那就是婚外情醜聞使得許多與林丹選手的行為沒有直接關聯的中傷誹謗，大量出現在網路留言裡。例如：林丹選手的外型很像從農村出外賺錢的勞工，亦即中國所謂的「農民工」或「民工」等言論。

## EXILE = 「民工團」

林丹選手膚色較黑、身材精壯、眼神銳利，留著一口帥氣的鬍子。以現今的日本人來說，應該有很多人會覺得「像EXILE<sup>02</sup>那一型」吧。

然而這種EXILE型，也就是看起來有點痞、皮膚偏黑的人，在中國並不是那麼受到歡迎，其中的理由也是「因為看起來一副民工樣」。

EXILE雖然有正式的中文名稱叫「放浪兄弟」，但網路上很早就有人開始稱他們為「民工團」，因為皮膚曬得特別黑，身材又瘦，看起來跟在都市建築工地的民工沒有兩樣。

另外，也有網友留言說林丹選手很像宅急便的配送員，這是近年來與建築工地不相上下，以出外賺錢者為大宗的工作之一。大批網友留言寫道：「我一直都覺得，林丹很像騎著電動機車在城裡到處跑的民工配送員，皮膚又黑。」

從EXILE的暱稱到對林丹選手的留言，在在反映出中國人偏好的男性類型，以及中國人，尤其是都市人，對農村或出外賺錢者的蔑視。

### 註釋

**02** 編注：二〇〇一年出道的，融合流行音樂與舞蹈的日本偶像團體，團員多數身材精實健壯、膚色偏黑。

## 問題的轉移與歧視

中國基本上偏愛皮膚白皙光滑的男性，甚至代表「皮膚水嫩、有彈性的年輕男子」之意的「小鮮肉」一詞，更獲選為二〇一五年的流行語。光從這個用語流行起來的現象就知道，人們對於「白皙光滑」的偏好正與日俱增。

這樣的偏好來自於，不必像農民或出外賺錢者那樣風吹日曬也能賺到錢的人，比較具有文化或文明的想法，以及對這類事物的憧憬。

再來，比起過瘦的人，反而是肥胖的男性比較受歡迎，這也是來自於肥胖象徵衣食無虞的印象。若說皮膚偏黑的結實EXILE型與皮膚白皙的微胖型，何者在中國較受歡迎，肯定是皮膚白皙的微胖型。

綜上原因，林丹選手的外型本來就不是中國人喜歡的男性類型，只是因為他原本是羽毛球這項國民運動的英雄，所以過去才沒人拿他的外型做文章，但當婚外情問題除去這層鍍金後，群眾的真心話才一口氣爆發出來吧。

不同國家或區域偏好的類型當然有所不同，婚外情遭到撻伐也無可厚非，不過，原本應該討論的是EXILE或運動選手的婚外情，結果那卻只是一個引子，並在不知不覺間演變成「富足的白皮膚（都市人）」嘲笑「貧窮的黑皮膚（民工與貧窮階層）」的話題，其中不難窺見分割中國的斷層之深。

關於富足的都市人與民工、貧窮階層之間的關係，不知不覺間取代原本的議題這件事，其實還有另一個現象令我在意，那就是有媒體或部落格的文章，表面上佯裝同情民工夫妻所面臨的嚴苛環境，實際內容卻幾近於官能小說。



## 佯裝成正經報導的官能小說

有些民工為了讓孩子在老家上學，由先生獨自前往都市賺錢，太太留在家裡照顧孩子。不少家庭每年只有春節才一家團圓，而且這種骨肉分離的生活還長達十幾、二十年，這些人就是「留守兒童」或「留守婦女」。

根據中國民政部統計，與丈夫分隔兩地留守在家的妻子，全國共有四千七百萬人。若年輕健康的夫妻過著分隔兩地的生活，那麼行房的機會當然也極其有限。再加上家裡沒有男人，只有女人與小孩，這種生活所造成的不安，也讓不少太太面臨身心失衡的狀況。

另一方面，都更的建築工程、宅急便的配送員、雙薪家庭的家庭女傭等支撐都市人生活的工作，很多都是由低薪的民工所負責。政府也開始改正這種不公平的現象，例如發放津貼給留守的婦女或介紹當地的工作，致力於提升整個家庭的收入。只是原本那些被迫分隔兩地的夫妻，並沒有太多人因此得以一起生活。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少媒體或部落格也開始報導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的問題。只是在這些報導當中，很多都在開頭寫著留守婦女的統計等標題，讓人以為是正經的文章，但實際詳讀就會發現，有的文章是小說形式，有的是以紀實風格遊走情色邊緣，不時穿插著與丈夫分隔兩地的留守婦女陷入婚外情，或是熱中於自慰等內容，這些文章的留言也充滿不堪入目的下流字眼。這在禁止色情的中國，堪稱是包裝在探討社會問題的體裁之下，扭曲的「合法色情」。

在嚴酷勞動下形成的暗沉膚色遭人訕笑之餘，親身面對的嚴重問題還被拿來當作魚目混珠的色情題材，民工如此遭人嘲笑、消費，又是另

一項令人憂憤鬱結的源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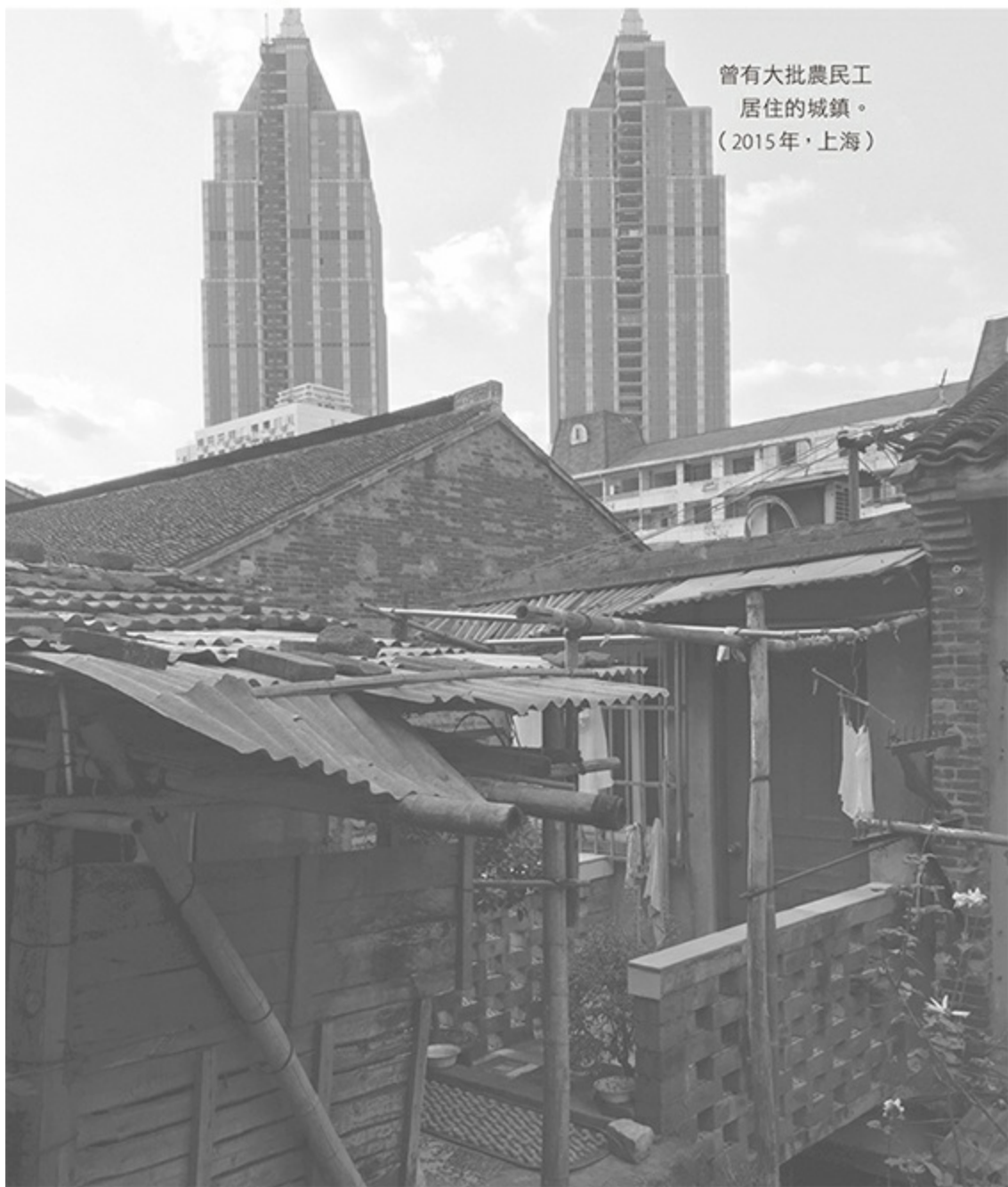
二〇一七年開春不久，上海就毫無預警地開始大規模拆除違章建築，並如火如荼地持續進行當中。

即使是許多日本人居住的虹橋地區，我在六月中旬造訪時，明明前一週為止還有一條數十間餐廳聚集，大家都喜歡來這裡享用平民美食的美食街，才隔一週再訪，沒想到就發生了店鋪被推土機連根拔起，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事態。碰巧來到現場的我，在一群遠遠圍觀作業員整地的附近居民中，隨意搭訕一個人問話，得知拆除理由果然也是在拆除違章建築。那裡的社區面對道路，聽說一樓住的主要是上海居民，他們在原屬於公共道路的部分違法擴建，並出租給人經營餐廳或商店。

我自己也有碰到類似的狀況，家附近有一間我常去的拉麵店，明明前一天才去吃過，隔天再去就看見門口堆滿磚頭，整家店被封鎖起來。那間拉麵店也被貼上當局的通知，寫著因為違法所以必須停止營業。

畢竟是違法的事，所以當局有正當的理由加以取締，只是那條平民美食街都經營超過十年了，整條路卻毫無預警地在一週之內被夷為平地，拉麵店也像神隱一般在一天之內消失不見，每當看著那些空地，就不免覺得最近愈來愈常在日常生活中瞥見中國強權的一面。明明當局應該也心知肚明，倘若採取如此強硬的做法，恐怕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抗，但明知如此卻還要強行冒此風險，肯定有什麼理由才對。

## 第六章 | 第一次看海



曾有大批農民工  
居住的城鎮。  
(2015年·上海)

## 驅逐農民工

就在這時，我突然有急事必須帶著大件行李前往機場，便用SNS聯絡我熟識的計程車司機老邱。不到一分鐘之內，老邱就回覆我說：

「好。」

上海的計程車基本上是兩人一組，共用一輛計程車，採做一休一的形式，所以其中一人是對路況瞭若指掌的老手，而搭檔是新人的情形也挺常見的。在這方面，因為五十五歲左右的老邱和他快要五十歲的搭檔小邱，兩人都是有二十年以上經驗的老手了，所以無論何時叫車，我都可以放心地交給他們駕駛。

我開始在上海生活的十六年前，地鐵只有兩條路線，如今已增建至十四條路線，搭乘計程車的機會也大幅減少，但因為我和他是將近十年的老交情了，所以無論清晨、深夜或短距離，他總是很乾脆地答應來載我，而且老邱每隔一天就會在上海市區從早上五點開車到半夜十二點，這裡發生什麼事他都如數家珍，因此我每次都很期待聽他分享。

我已經將近一年沒搭老邱的車了，稍微問候一下彼此的近況後，我提起平民美食街遭拆除的話題，老邱當然也知道此事，他說：「其他也有好幾個地方像那樣被拆除的喔。有幾條路上開了很多餐廳，專門給我們計程車司機提供便宜的套餐，結果有幾處都在今年被拆掉了。」我說，那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掃蕩違章建築吧，結果老邱透過鏡子瞄了我一眼，嗤之以鼻地笑道：

「目的是為了掃蕩違章建築？你相信那種說法啊？真是太單純了。」

然後又繼續說：

「真正的理由是為把農民工趕出上海啦。」

我的農民工朋友生活陷入困境，難以在上海繼續謀生，正流離失所地到處尋找住處與工作一事，我早有所聞，也反覆在前文提及。見到他們那樣子，我自己的解讀是「上海正要把他們驅逐出去」，不過那純粹是在不動產泡沫的背景下，因為房租高漲或薪資面臨極限等因素所造成的，並不是遭到當局直接刁難或驅趕。結果如今，他竟然說上海當局毫不掩飾地要將農民工趕出上海，難道上海也窘迫到這種程度了嗎？

根據老邱的說法，雖然使用違章建築的店面提供便宜套餐給計程車司機，或是在平民美食街開餐廳的老闆裡面，也有上海人，但絕大多數都是地方出身者。其中很多也是從簡陋棚屋搭出來的違章建築，因此房租比合法建築便宜，一般都是來到上海的農民工存了一筆錢以後，才在這裡開設店鋪。

聽到這裡，我對老邱說：「上海房東把店面租給他們本來就是違法的，所以就算拆除後少了房租收入，也只要想成是少了非勞動收入就好了吧，但一夕之間從在那做生意的農民工手中，搶走他們賴以維生的食糧，上海當局究竟要人家明天的日子怎麼過下去啊？」

只見老邱面露慍色，說道：

「那才不關我們的事，上海已經人滿為患了，我們沒有餘力養那些農民工，他們趕緊滾回家鄉去就好了。」

於是我向老邱描述我那些朋友近來奔波於上海與家鄉之間，只為了求得工作與住處的事情。我說，他們回到鄉下薪水也太少，無法存錢供孩子上學，所以只好又立刻回來上海。即使如此，老邱依然堅持：「那不關我的事。」明明在工作過程中去農民工經營的餐廳吃過好幾次飯，但看來農民工似乎已成了對他來說不必要也不想要的人了。

不過老邱的反應究竟為何如此激烈，要這樣指責農民工的不是呢？  
等後來聊到他的搭檔小邱的話題時，我才明白其中的理由。

## 一夜致富

老邱的搭檔小邱，在幾天之前因為地鐵建設相關的都更計畫，必須搬離市中心的公寓。首先，他戶籍上的家人與親戚共有十人，平均每人有三十六萬元（新臺幣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元）的補償金。除此之外，實際住在那裡的小邱一家，由於查定價值是三十平方公尺三百八十萬元（新臺幣一千六百七十二萬元），因此換得兩間位於上海市郊松江區，價值各一百一十萬元（新臺幣四百八十四萬）的九十平方公尺公寓。由於適用的是拆遷專用地價，因此每平方公尺是以一萬二千元（新臺幣五萬二千八百元）的破盤價計算，但實際價格卻是每平方公尺四萬元（新臺幣十七萬六千元）。雖然規定搬遷後兩年內不得售出，但從帳面上來看，光是這兩間公寓的價值就高達七百二十萬元（新臺幣三千一百六十八萬），等於是獲得了上億日圓的資產。

即使如此，小邱手頭上還是有剩一百六十萬元，因此他又用那筆錢在市中心購置一間狹小的中古公寓，預計短期間內會住在市中心那間中古公寓，並把市郊那兩間出租給別人，每月房租收入估計總共是八千元（新臺幣三萬五千二百元）左右，幾乎相當於目前計程車工作所得的收入。

在持有上海戶籍的上海人之中，像小邱那樣因為都更而一夜致富的人比比皆是。過去二十年來，為了籌備上海世博而整備地鐵等基礎建設，或重新開發老舊市街，上海毫無間斷地創造出許多像小邱這種花錢不手軟的人。

在都更中晉升億萬公寓的「資本」，也就是原籍所在的住宅，很多都是由父母所屬的「單位」，例如國有企業或公所，以幾乎免費或低廉

的價格分配下來的，因此幾乎不花他們一分一毫。只要一邊看著鄰居變成億萬富翁的模樣，一邊期待著「下一個就輪到我了」就總有一天會輪到自己，這種堪稱「不勞而獲」或「鍊金術」的狀態，基本上只要是在上海或北京等大都市有戶籍的人，都可以享受得到。

然而從去年（二〇一六）以來，上海當局見到不動產不斷創天價，認真擔心起泡沫破裂，便開始對不動產下達各種規定，使得上海人的「不勞而獲」籠罩上一層烏雲。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底頒布新規定，一個家庭以房貸購置不動產時，第一間最少要付三十五%的頭期款，第二間則必須支付五十到七十%的頭期款才能夠購買，甚至以往默認的商業用地變更為住宅用地，從今年起也一概禁止。

對於二〇一七年這項措施有可能使手中房價暴跌而感到憤怒的居民，在五月底至六月上旬之間，三度在上海市區遊行抗議。規模最大的六月十日遊行，據說有一千名參加者聚集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即使有實質上由中國當局動員的反日遊行等官辦遊行，但由市民對政府政策舉辦的抗議遊行仍屬極端異例。

關於這場遊行，雖然中國國內沒有任何報導，但看SNS上的投稿文章，似乎有從地方來上海工作且與億萬公寓完全無緣的年輕上班族，為了結婚好不容易買下相對便宜的住宅，卻因為加強管制而無法入住，導致未婚妻逃跑而陷入絕望的案例。不過最多的情形，還是明知違法卻為了投機目的購買，說得難聽一些，也可以算是咎由自取。

話雖如此，這一連串的不動產相關規定，對於像計程車司機老邱這種，尚未輪到自己享受不勞而獲之樂的上海人來說，恐怕已經足夠讓人憂慮：



「會不會在輪到自己之前，泡沫化就已經結束了啊？」

老邱自己有一間位在上海市中心，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公寓，因此不擔心沒地方住。更何況，如果泡沫經濟持續發展下去，這應該會成為創造億萬公寓的「資本」才對。

但不能否認的是，一旦有可能無法受惠於不動產泡沫，老邱的前途可就染上一層不安定的色彩。由於上海對於叫車服務有所管制，因此他的計程車司機一職尚不至於暴露在無法維繫的危機下，只是中國也和其他國家一樣，汽車導航的普及使得熟悉路況的老手經驗，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具備優勢，所以在六十歲領到退休金之前的六年期間，並不能保證平靜無波。

「農民工才不關我的事。」老邱之所以出現這種激烈反應，或許是來自於一種，眼下不只要擔心億萬公寓，連幾年後即將退休卻還必須擔心工作的焦躁感，還有農民工搞不好會與自己搶奪工作飯碗所造成的吧。

而上海當局以拆除違章建築為名，正式開始行切割農民工之實，就是準備開始承接那些「尚未輪到的上海人」。

一思及此，我不禁在老邱的計程車後座深呼吸一大口氣，以安撫內心的情緒。

## 儘管告別了沒有窗戶的房間

儘管上海農民工的生存環境日益嚴苛，我那些朋友在二〇一七年夏天依然留在上海，每天辛勤工作。

從事廢棄物回收的鄭凱先生與目前從事大樓清潔工作的妻子，還有因為不想念高中而來到上海，做過麥當勞和火鍋店店員的十七歲兒子，一家三口最近搬到了一間有窗戶的套房。沒錯，他們去年一整年都住在沒有窗戶、照不到陽光也不通風，用社區倉庫改造而成的房間裡。房租從一千五百元（新臺幣六千六百元）增加至二千五百元（新臺幣一萬一千元）。邀請我去新居參觀的鄭凱夫婦高興地說：「現在的房間比較通風了。」但在經過一番深聊後，我得知廢棄物回收業的收入每下愈況，因此一家三口的總收入從去年的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變成今年遠不及一萬元的水準。

住在通風、採光良好的房間，是人類擁有身心健康生活極其理所當然的條件，沒有任何過分的奢求。但我認識的鄭凱先生，是兒子還在讀初中時就說：「為了送孩子上大學，必須多賺點錢，省著點用。」因而住在沒有窗戶的房間裡，成天埋頭苦幹，所以當他選擇搬到採光與通風良好的舒適套房，似乎便代表著他這一年來放棄了孩子的升學或自己的工作等各種事情，實在令我無法感到全然喜悅。

這麼說來，在我去年夏天剛看完《正宗哥吉拉》那時，鄭凱先生滿口稱讚中國說：「中國成了世界的強國。」、「明天的中國肯定會更好。」但他邀請我來新家的這一天，嘴裡只是一個勁地重複著罰款的事，說：「我只不過是把生財用的電動三輪車停下來短短幾分鐘而已，這半年來就被罰了多少次罰款啊？如果連電動三輪車都不能停的話，政

府到底要我們怎麼生存下去啊！」這一回，他總算讚揚中國了。

讓妻子穿優衣庫大紅色羽絨外套當作新娘服的長順，今年滿二十六歲。他去年任職的物流倉庫因為不景氣，半年就裁員了，所以他目前在其他的倉庫上班。基本底薪從前一份工作的二千八百元（新臺幣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元），減少到二千五百元（新臺幣一萬一千元）。過去五年來，他都在機場的物流倉庫工作，但三年前的四千五百元（新臺幣一萬九千八百元）是最高水準，此後便每下愈況。

在薪資水準達到巔峰的三年前，長順和我分享過他的夢想：

「我爸媽叫我再給他們添一個孫子，以後好有人繼承家裡。如果第二個孩子出生了，我想在老家附近找工作，買一間高鐵車站前新蓋的公寓。貸款分十五年繳清，大女兒大學畢業時，我也才四十幾歲。到時候我還能工作，也可以送第二個孩子上大學。每天送孩子上學後，我去上班，然後傍晚接他們下課，再一起回家與祖父母和妻子圍成一桌吃飯。我只要這種簡單的幸福就好了，應該可以做到的。」

時隔三年，如今即使身在上海，他的收入卻遠不及五年前的三千元（新臺幣一萬三千二百元）薪水。靠他的初中學歷，回到家鄉也很難找到高於上海薪水的工作，更別提要買車站前新蓋的公寓了。最近每一次見面，他開口閉口都在講說：

「我老家的隔壁村要進行都更，聽說每一家都換到兩間房子。大家都說如果我們村子也開始都更的話，條件就會跟隔壁村一樣呢。」

實際上似乎有那樣的計畫，但沒有人知道究竟何時才會執行。

長順這樣一個剛過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實現夢想的方式竟只剩下期待故鄉遷村，從此成為暴發戶一途。

他的太太也在上海的物流公司上班，女兒交給返回老家的長順父母

照顧，讓她在那上幼稚園。長順夫妻到去年為止，還很常在只有好朋友才看得到的SNS上，分享父母親傳來女兒在鄉下的生活照。然而這一年來，長順上傳的照片幾乎都是他最近玩的手遊截圖，他太太則都上傳跟朋友出遊的照片，令人有點擔心。

「大家的運氣真好啊！」

身為單親媽媽的喬女士，今年三十七歲了。

她還是一樣把獨生女託給安徽省農村的老家，自己在上海當家庭女傭。目前住在上海市郊一處由農家在自家土地上，專為農民工搭建的公寓裡。三坪大的套房，和一樣來自安徽省北部農村，也在附近手機工廠上班的女作業員共用。房租含水電瓦斯共二百五十元（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是至今為止在上海租過最便宜的房子，只是雙層床生鏽的鐵管裸露在外，玻璃窗上貼著用來代替窗簾的破爛報紙廣告，天花板上垂掛著用來防漏水的塑膠布，見到房裡的樣子，實在很難想像那是兩個三十幾歲單身女性生活的地方。

直到去年為止，喬女士為了多增加一些收入，想讓生活更加安定，一有空就會去面試工作，但從今年開始，她不再去面試了。「因為我發現，我可以撐到面試那關的工作，薪水最多只有三千元，跟我做家庭女傭賺的錢一樣多，沒有辦法再往上了。」她說。

喬女士去年夏天與今年春天，在鄉下親戚的介紹下相親了兩次，兩個人都是農家的長男，而且都住在從她老家開車一個多小時的地方。關於第一位男性，她沒有多談，只說：「我立刻就拒絕了。」不過今年春天相親的第二個對象，她說：「他現在還是每天都會用SNS傳訊息給我。」對方今年五十歲，結過一次婚，在獨生子三歲時與前妻離婚，現在孩子升上大學一年級，開始住宿生活，因此在兒子的同意下，他開始考慮再婚，並與喬女士相親。

雖然很多農民工因為無法光靠農業收入供孩子上學，必須前往都市賺錢，但據說喬女士相親的對象，靠著在溫室裡種植各種蔬菜，在最近

城鎮的市場裡販賣，賺到足夠供兒子上大學的錢。對方的父母現在與他同住，不過如果決定結婚的話，他們準備搬到兒子在附近蓋的另一間房子，好讓兒子與媳婦可以沒有顧慮地展開新生活。

對方也很喜歡喬女士和她的女兒琳琳，還向她求婚說，結婚以後她如果幫忙工作的話，農業和市場的生意都可以再擴大，希望她盡快從上海回來。甚至還說，如果不想這麼快就結婚，也可以先搬到附近比較容易見面的城鎮，然後跟他交往，而工作和房子他都會負責幫她找。

如果和那位男性結婚的話，儘管住的地方會從都市變成田園地帶，但居住環境與收入肯定都會比現在喬女士在上海的生活好。為了來年秋天就要念國小一年級的女兒琳琳的將來，喬女士也認為比起獨力撫養孩子，和這位男性在一起的選擇性應該也會更廣。

即使如此，喬女士還是無法下定決心與對方結婚。

「說真的，我覺得自己都在都市工作二十年了，為什麼遇到的對象還是農家出身呢？」她說。

另一方面，喬女士的SNS在這半年以來，愈來愈常出現羨慕別人運氣好、感嘆自己運氣差的內容。

「坐在公車上看著外面，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多的自用車，大家的運氣真好啊，為什麼我運氣差到連一臺車都買不起呢？」

「下班回家，這裡又在蓋新公寓了，究竟是誰這麼幸運可以住在這裡呢？又為何那個幸運的人不是我呢？」

諸如此類。

在喬女士當家庭女傭的幾戶人家中，也有不少因為都更補償而獲得新的公寓。與此同時，喬女士去年曾對我說：

「一想到我有可能就這樣窩在上海的角落工作，每月一成不變地領

著三千元薪水寄回家裡，庸庸碌碌地過完一生，心裡就感到很不安。」

一邊看著都更暴發戶的生活，一邊住在破爛公寓中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喬女士自然會開始覺得，人生的價值最終只能以運氣來衡量了吧。

## 廢墟，最後的落腳處

今年三月中，我接到潤發太太的電話，她說：「為了幫二兒子還有他媳婦照顧孩子，我們可能會離開上海，搬到北京去住。你最近好像也很常回日本，以後可能沒辦法經常碰面了，所以再來我家吃頓飯吧。」

原本在北京一度上軌道的雞肉攤生意，發生SARS之後無法繼續經營，潤發夫妻不得已之下，只好一切從零開始，潤發先生到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潤發太太開始當家庭女傭。長子敬敬在國家研究院附屬研究所的博士課程中，研究如何改善空氣汙染，是前途一片光明的菁英，次男漢雄學歷雖低，卻也在北京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也已經結婚生子了。在我的農民工朋友中，潤發夫妻過的生活最為安定。經過他們倆的悉心栽培，如今兩個兒子都能夠自力更生了。

據說住在北京的次男還說：「爸媽來北京的話，都可以把工作給辭了，在家裡照顧孫子，享享清福就好，生活費我會負責的。」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堅持：「以後要繼承家裡的長男還沒辦完結婚這項人生大事，所以現在還不能放鬆下來。」說即使去了北京，還是打算看情況找份工作。

假如去了北京的話，日後恐怕無法輕易碰面了吧。我一邊心想今天有可能是最後一次見到潤發夫妻，一邊按圖索驥來到他們用SNS傳給我的新地址，說是「兩個月前又搬家了」，潤發先生已經在外面等候，一見到我就揮了揮手。在潤發先生背後倚著的那面牆上，有人用紅色油漆漆上代表拆除之意的「拆」字。

在上海生活長達十四年，潤發夫妻最後選擇的家，依然是即將拆除的廢墟。



不知是不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潤發先生伸出手來與我握手，說：

「要是在上海付出一筆正式的房租，我們這對沒有學歷的夫妻，就存不到錢送孩子上大學，或是翻新老家當作娶媳婦的賀禮啦。」

接著他又說道：

「住在破房子裡並不開心，但我認為一直有廢墟可以住是我們運氣好。」

我問即將離開上海的潤發夫妻，在上海有沒有什麼想去的地方。潤發太太思考了一會兒說：

「雖然不一定要是在上海，」接著表示：「但是我想去看一次大海。」

潤發先生也說：

「我也沒看過大海。」

這是住在沿海都市上海長達十四年、年皆五十三歲的夫妻，心中小小的心願。

由於兩週後的四月上旬就是清明節的三連休，我和他們相約說：

「作為告別的紀念，我們搭地鐵轉公車，三人一起去看海吧。」那一天就這樣分開了。我不禁開始想像，五十三歲才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兩人，究竟會露出什麼樣的表情呢。

連休數日前，我收到潤發太太傳來的訊息。

「因為家庭女傭的工作沒辦法請假，所以我不能去海邊了。對不起，改天再來我家吃飯吧。」

這就是潤發夫妻的生活。從前如此，往後恐怕也是。不過他們的兩個兒子，未來應該可以過上想看海就隨時能看海的生活吧。

不知道鄭凱先生、長順，還有喬女士的孩子們，第一次看見大海又會是多久以後的事呢？

## 尾聲 農民工該何去何從？

身為中國的主力，卻永遠也無法成為主角。

這麼一句話就能夠徹底表現出來自農村的出外勞動者，也就是農民工，在中國的立場。

毛澤東主席的時代，亦即新中國成立的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一九七七年前後，中國曾嚴格限制農民移動到都市。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國家必須確保有充足的糧食可分配給國民。

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爬到最高權力者地位的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決定開發都市地區、推動工業發展，於是隨之而來的製造業或建築業便出現勞動力的需求。當時，農民獲准從自家所在的農村前往都市賺錢，而農民工就這樣應運而生。

只是即使獲准前往都市，但要把農村戶籍遷至都市，這在當時或今日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因此，農民工前往都市地區賺錢的同時，無法受到當地醫療或教育等社會保障，純粹只是得到離開農村前往都市工作的許可而已。不過，「難以謀生」的農民即使留在農村也無法賺取現金收入，因此為了覓得一份差事，大批農民就這樣湧入都市。

## 西裝與鶴嘴鎬

我第一次見到並結識農民工，也是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到九〇年代這段期間。我最初在一九八八年前往北京以西五百公里處的山西省太原學習語言，隔年一九八九年到北京大學留學，一九九二到二〇〇〇年在香港擔任日文小報記者，但每次到廣東省的廣州、深圳，或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旅行或採訪時，在當地見到的農民工都令我印象深刻。

我見到他們的地方，幾乎都是在這些有各地列車匯集的大都市總站前廣場，但不論何時經過，廣場上總是坐滿農民工，他們大部分人工作都沒有著落，只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來都市了，也沒有錢投宿旅店。我的朋友潤發夫妻，一位是體力勞動者，一位是家庭女傭，聽說他們兩人在結婚之後，於一九八九年來北京賺錢，當時他倆身上所有的錢是十九．八元，以現在的匯率換算就是三百二十日圓（新臺幣八十六元）。我在山西省有認識的人，他說他那年大學畢業，到學校去教書，初任薪資是八十元，由此可知農民身上的現金有多匱乏。所以農民工在找到工作之前，連日以自己帶來的行囊為枕，睡在無法遮風擋雨、滿地冰冷石磚的站前廣場上。然後那些或坐或臥在廣場上的人，好像事前說好似地，全都穿著當時正開始流行的成套西裝。他們會直接以那身打扮去建築工地扛起鶴嘴鎬，用鎬頭鋤地。當然，每個人的西裝都皺皺髒髒的，也有不少人穿到衣服都快磨破了。見到「COMME des GARÇONS」、「NICOLE」、「BIGI」等一九八〇年代日本流行的設計師品牌穿在他們身上，來自日本的我雖然有種異樣的心情，卻一點也笑不出來。

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展現出「我要在都市闖出一番天地」的氣魄，反而沉默不語，臉上毫無表情。不過在那木然的面孔，和那套可能

是家裡唯一一套的西裝底下，似乎可以感覺到他們從鄉下來到都市的緊張心情，而且很容易就看出，他們只有身上那套西裝可以穿而已。他們身穿西裝、面無表情、沉默不語，在地板上或坐或臥等等的姿態，在在散發出他們為了活下去，什麼都願意做，也就是「我們只能來這裡這麼做，否則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生存下去」的氣息。

一九九〇年的中國人口是十一億九千萬人，其中農村人口是八億四千萬人，人口的七十三．五％是農民。在那些湧入大都市車站、坐守在站前廣場的人背後，是占總人口七成以上的勢力。其後，隨著都市化的發展，農村人口在二〇一五年減少至六億人，占全體人口的比率也降至四十三．九％，但即使如此，全國還是有將近一半是農村人口，因此農民工或農民依舊是左右國家動向的一大勢力。當時，大批農民工為了求職而在中國四處遷徙，彷彿潮汐的漲退一般，因此又被稱為「民工潮」，或是因為盲目流竄而被稱為「盲流」。

對於那些全身上下散發出沉穩氣魄的農民工，我感到無比好奇。話雖如此，我也沒有勇氣接近建築工地或站前廣場，向坐在那裡的他們搭話。

不過假如改革開放政策沒有開始，他們一直留在農村裡的話，就算我長期在中國上學或工作，身為外國人的我應該也毫無機會與中國農民有所接觸。當時的農民在時代命運下陸續現身於都市，而我則對於無法找到機會與他們交談的自己感到不耐煩。

## 巨大的貧富差距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都市地區的居民生活水準提升，服務業日益興盛，農民工也開始投入都市的服務業。這件事帶給二〇〇一年起在上海工作的我，與農民工接觸的機會。雖然建築工地非我平日涉足之處，但如果是有農民工當服務生的餐廳，只要每天去那用餐即可，比起向坐在站前廣場或路邊的農民工搭話，難度瞬間降低許多。

藉由向在餐廳工作或從事服務業的人攀談，我開始與一些十幾、二十歲的農民工交流。此外，等到建立交情以後，由於他們的父母也與我同一個世代，所以我又結交到更多四、五十歲的農民工好友。我也愈來愈常鼓起勇氣向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男性搭話，與他們閒聊一番。

像這樣與上海的農民工交流，了解他們的生活以後，我這才注意到中國一項難以抹滅的現實。

那就是在中國的都市居民與農民之間，存在著龐大的貧富差距。

只有農民工必須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只有農民工必須為了供孩子上學或養家活口，把孩子留在家裡到外地工作；只有農民工必須在都市做「辛苦、骯髒、危險」工作。即便來到都市拚了老命工作，他們也必須住在廢墟裡，否則沒辦法存錢供留在家鄉的孩子上學。縱使一天站著工作十二小時，但自己在生產線上組裝的iPhone 卻是底薪的四倍，所以根本買不起。然後這些貧富差距大多都取決於一個人出生於農村或都市這樣的偶然因素而已，這些現實帶給我莫大的衝擊。

同時，對於嚴酷的環境、與都市人之間龐大的貧富差距，農民工從未抱怨過隻字，只是默默地埋首苦幹，他們的堅毅令我產生近乎畏懼的

感覺。此外，我也認為中國是由農民工無邊的寬容所支撐著的。

他們的堅毅與寬容究竟從何而來？

其一，是他們內心尚存希望，認為明天就輪到自己出頭了。

再者，對於目前四十歲以上的人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相較於自己的童年或青年時期，如今的中國確實比以前更富有也更進步了。

我出生於上一次東京舉辦奧運的隔年，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潤發先生與潤發太太年長我一歲，長順的父親與我同年，我們雖屬同一個世代，但成長的環境與見過的風景，即使不考慮國別差異，也很難相信出生於日本的我，與出生於中國農村的他們是同世代的人。他們有些是像潤發先生或長順父母那樣上到初中畢業，有些甚至國小畢業就立刻出來工作，而且不光是他們而已，即使是大學畢業的人也是一樣。

我有個朋友名叫寶生，來自中國華北地區的山西省農村，年紀小我三歲。我一九八八年在山西省的大學學習中文，他則在那所大學就讀日文系二年級。

## 雙親餓死的震撼

寶生的雙親在他三歲時餓死了。

如前文所述，我出生於東京奧運隔年的一九六五年。我還記得我在上小學前住的名古屋，看過奶奶上半身赤裸著搭公車來。褲子或毛衣穿破的話，縫補過後繼續穿也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些事情，雖然不知道能不能算是殘留著些許戰後的氛圍，但顯然與現在是截然不同的時代。即使如此，我也不曾餓過肚子。不，或許只是我比較幸運，也許有其他同學可能餓過肚子，也有朋友因為營養不良，臉上掛著兩條黃鼻涕。但只要父母有在工作，而且沒有放棄育兒的話，那個年代無論大人小孩都不至於餓死。

再說一次，寶生出生的年分比我晚三年。我記得大概在我認識他的第十五年吧，我們在他居住的廣東省某城鎮，久違地一同用餐。吃著吃著，我突然問道：「你的父母是怎麼過世的？」我發現自己雖然從學生時期就聽他說過，父母親在他三歲時雙雙過世，由大他一輪的哥哥賺錢供他念到大學，但我從沒問過他們的死因，他也不曾向我提起。

寶生頓時露出被戳到痛處的表情，看了我一眼，接著一臉困擾地低下頭，但又立刻抬起頭來，直勾勾地看著我的眼睛。

「嗯，因為沒東西吃，才過世的。」他說。

「聽說是我父親先過世，然後母親在兩個月後也過世了。確切的時間我不太記得了，

都是長大以後聽我哥說的。」

我頓時啞口無言。



## 同樣的世代，不同的背景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寶生趁返鄉之際邀我走訪他的家鄉，他的老家位在冬天氣溫會降至攝氏零下二十度的山區地帶。雖說是農村沒錯，但在他們耕種的山坡地上，散布著許多連大人也抱不起來的岩石，土壤貧瘠得似乎只能勉強種些玉米等作物。

我拜訪他的老家，是在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幾年後的事。留守在老家的寶生哥哥端出來招待我的食物，每一樣都無比美味，只是早餐是玉米粥，午餐是用玉米打出來的烏龍麵，晚餐也是用玉米打出來的炒烏龍，配菜只有辣蘿蔔乾。在我停留的期間，餐桌上從未出現肉食。不過如果能夠攝取這些食物，應該不至於餓死才對。他的父母是在全中國陷入大混亂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過世的，當時的慘況恐怕無法用言語描述吧。

據說寶生是他們村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其他村民聽到他回來了，接二連三地到他家來湊熱鬧。見到穿西裝、打領帶的他被村民團團包圍的樣子，我心想，原來這就叫做衣錦還鄉啊。

即使屬於同一個世代，中國人與日本人經歷過的人生竟是如此不同。以那一次前往寶生家鄉的旅行為分水嶺，我開始慢慢理解到，中國與日本的好惡、價值觀、人生觀截然不同，反而才是理所應當的事。同時，我似乎也窺見了造就農民工如此堅毅與寬容的一絲端倪。

尤其我自己本身也是受到農民工的堅毅與寬容拯救的人之一。

## 除夕夜的日式炒飯

那是我在上海的生活即將迎來第二個春節的冬天。前一年離婚的我，那年冬天只要一到晚餐時間，就獨自前往附近的中式餐廳，吃一種叫麻辣燙的料理。

麻辣燙是一種可以選擇蔬菜、肉丸、蛋餃、豆腐等自己喜歡的食材，加入用辣椒熬出來的紅通通辣湯中，一起滾煮來吃的料理。一來可以攝取大量蔬菜，二來可以暖和身體，最重要的是價格非常便宜，無論選再多食材都七元（相當於新臺幣三十一元）有找。只是因為我完全無法吃辣，所以都請店家幫我加沒有辣椒的湯頭，煮成不辣的麻辣燙。即使如此，對我來說還是相當美味。那裡的王姓店長見我每晚光顧，便記住了我的臉，每次一見到我就大喊：「喔，你又要不辣的麻辣燙啊？你還真是奇怪呀。」店裡的人聽到都吃吃竊笑，害我羞得無地自容。

雖說如此，在眾人的嘲笑下，我逐漸與店裡的人互動起來。那家店的老闆是上海人，但總是不在店裡，負責管店的是年約五十歲的王店長，他老家是江蘇省的農家，自己獨自一人來上海賺錢，家人全都留在鄉下。店員也全都是來自安徽省或四川省的農民工，所有人都住在店家提供的八人房公共宿舍裡。

有一天，王店長對我說：「今天開始暫時不供應麻辣燙了，你今天開始要吃什麼呢？」雖然店會持續營業到除夕，但店員全都是從地方來賺錢的農民工，大部分人都返鄉去了，因為人手不足，所以春節前後一個月，麻辣燙的部分暫時休息。

於是，我決定試著點點看之前一直很好奇的「日式炒飯」。等待五分鐘後，端上桌的是用醬油調味搭配洋蔥、火腿、雞蛋、玉米的炒飯。

雖然不知道哪裡算日式，但味道還不差。王店長一臉擔心地窺探著我的表情，「怎麼樣？好吃嗎？跟日本的炒飯一樣嗎？」對於他連珠炮似的問題，我答說：「嗯，還不錯。」他一聽便露出鬆一口氣的表情。

到了除夕夜，我想著：要一個人吃團圓飯了啊.....，心情有些沉重地推開麻辣燙店的門。

中國的春節，是以家庭或家族等有血緣關係的一群人為單位，齊聚慶祝的活動。一家人會在除夕聚在一起吃「團圓飯」，然後在北京等華北或東北地區，大家會一起包水餃來吃，上海的話則是做蛋餃或芝麻湯圓。大年初一會去寺廟參拜，並在一年的開始去親戚或朋友家走春，這些活動基本上都是以家庭或親戚等有血緣關係的人為單位進行的。

換句話說，對於沒有家庭的人而言，中國的春節是一個極其殘酷的活動，讓人不得不再次面對自己孤家寡人的現實。

王店長可能回故鄉蘇州去了吧，店裡並未見著他的身影。沒想到櫃檯那個認識我的店員一見到我，便一臉賊笑地對著廚房大喊：

「日式炒飯一個！飯要大碗的！用心一點炒！這是王店長吩咐的！」

我還沒搞清楚眼前狀況，廚房最靠近外頭的實習男廚師就複誦道：

「日式炒飯一個！飯要大碗的！用心一點炒！這是王店長吩咐的！」

結果實際負責料理的廚師聽了也喊道：

「好！日式炒飯一個！飯要大碗的！用心一點炒！王店長有吩咐過我！」

即使遲鈍如我，也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雖然我沒跟王店長說過自己離婚恢復單身的事，他也從來沒問過我，但一個四十幾歲的男人，

每天晚上都一個人來吃飯，所以他應該也察覺了吧，還在返鄉前集合店員，交代大家說：

「如果那個日本人在除夕或春節一個人來吃飯的話，給他來一盤他們國家的炒飯吧。他那個人食量很大，所以飯量要大碗的，而且要給他們日本人吃的日式炒飯，一定得用心一點炒才行。」

那家店的店員以八人為一組，擠在一間由店家提供、四坪左右的宿舍裡，但有一次王店長給我看他在那家店閣樓上的房間，說：「我都睡在這裡喔。」那裡沒有窗戶，一片昏暗，天花板低得甚至不能直立行走，看起來比其他店員住的宿舍還要糟糕，是個稱不上家也稱不上房間的空間。感覺根本沒有多餘心力顧及別人的他，竟然為了一個不是家人也不是同胞，只不過是店內常客的日本人如此設想。

這一年將我從除夕夜的孤單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儘管身為店長、生活條件卻絕不算充裕的中國農民工。

後來遇到從事家庭女傭與體力勞動的潤發夫妻、新娘穿優衣庫的長順一家、單親媽媽的喬女士一家、從事廢棄物回收的鄭凱夫妻，也都屢屢關照著我，拯救我逃離孤單的飯桌。

怎麼有人能夠不愛他們呢？

在我經常光顧王店長那家店的期間，我剛經歷離婚又失業，一天的生活費只有二十元（新臺幣八十八元），後來生活條件雖然稍微好轉，但也只是從只能吃七元的麻辣燙，變成可以毫不猶豫地吃Sukiya 牛丼的程度而已，與日本企業外派來的駐地人員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我想農民工和我，彼此都在對方身上嗅出了相同的氣息吧。

一種以「難謀生者」身分來到上海生活的人類氣息。

而如今上海、北京等中國大都市開始切割農民工，將他們驅逐出

城。儘管中國的高度成長結束，進入所謂「新常態」的低成長時代，都更告一段落以後，不再像以往需要那麼多人手，因此沒有餘力接受農民工也是事實，但光從中國職業足球的「超級聯賽」以天價爆買海外知名選手來看就知道，他們並不是沒有錢。

連外國人也無法倖免慘遭過濾命運。我自己取得的簽證居留期間，從十年前的一年，變成數年前的半年，然後從二〇一六年開始縮短為三個月。此外，核發給駐地人員的簽證也從二〇一七年四月開始，將條件或能力化為點數，分級成「高端」、「專業」和「一般」等A、B、C三類，據說被判定為C類的人也有可能無法取得停留許可。

正如這些足球或簽證案例象徵的，中國似乎正在過濾農民工或沒錢的難謀生者，想把大都市打造成只有菁英或富裕階層等上層清澈部分的城市。其中，上海或上海人似乎相信，留下上層清澈部分可以更增添「魔都上海」的光芒，但那完全是錯誤的思維。

提到魔都上海不可或缺的魅力之一，最好回想一下眾多中國作家在文學或電影中，反覆描述的兩條河：黃浦江與蘇州河（吳淞江）的顏色。無論是南北縱貫上海的黃浦江，還是東西蜿蜒的蘇州河，只要沉入底下就會發現，那是濃得不能再濃的灰色。就是這種彷彿沉澱著難謀生者們的混濁河水，塑造出魔都上海的魅力，為其創造源源不絕的活力。選擇淘汰難謀生者的上海，今後恐怕會迅速流失其獨特的魅力與活力吧。

而且不僅是上海而已，如今全中國各大都市都呈現相同的趨勢。

## 中國夢的極限

如前文反覆著墨的，那些快被驅逐出去的農民工，不僅沒有擺脫難謀生者的境遇，反而更加左支右絀。

身為為政者的習近平當然也注意到這件事。

中國的為政者喜歡標語。回顧最近三任掌政時期，江澤民時代是「三個代表」，胡錦濤時代是「科學發展觀」，而習近平時代則是當前的「中國夢」。

前兩任政權打出的標語，若光看字面之意，很難理解想表達些什麼。不過那樣也無妨，畢竟要領導超過十億的人民，必須要有指引出眾人朝同一個目標方向前進的北極星，理論的補充在趕路時一邊完成即可。我認為，為了充實標語的理論而能夠大量動員國家智識，使得最終成果看來充分合乎邏輯的這一點，正是中國這個國家的潛力。

相較於前兩任政權，習近平提出高唱「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標語，則非常淺顯易懂。

無論是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社會生產力、先進文化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個代表」，或主張「以科學理論為基礎，促進社會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皆可看出其中對於知識階層或權力階層的考量。

相對於此，習近平在「中國夢」中提出的中華民族復興三要素很簡單，意即「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與「人民幸福」。儘管中國到了習近平時代才終於培養出堪稱「強盛中國」的國力，然而知識階層卻對露骨的中國禮讚感到掃興，反應十分冷淡。

我認為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向農民工提出的標語。

目的是將快要從「明天就輪到自己」的夢中醒來的農民工，暫時拉回夢的世界裡。

目前看來，他的這番努力還算有效。

## 夢醒之後

靠著二十一世紀世界新經濟圈「一帶一路」取得主導權的強盛中國；在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領土問題中毫不退讓的強盛中國；看準中國躍居世界經濟大國，全球首屈一指的大企業或菁英爭相湧入的富足中國。雖然比起出生在都市的人，自己的手頭還沒那麼寬裕，但生活條件和以前相比大有改善，更何況自己是強盛中國的一員。

令我掛心的是，這些從不抱怨或氣餒的農民工，最近愈來愈常埋怨自己的處境了。在相信明天會輪到自己的希望開始動搖的現在，以往農民工令我感佩的堅強韌性逐漸浮現一抹陰影，令人不禁覺得自己正在目睹，一直以來承受著與都市人相比之下極度不平等條件的，那看似無限的寬容心，當然也有瀕臨極限的時候。

中國發展出今日的成長與繁榮，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農民工的寬容。我想不僅是為政者而已，中國全體社會對此都應該比現在更加有所自覺。同時也該謹記，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沒有過難謀生者忍無可忍、流離失所，最終形成一股失控奔流的紀錄。

「上海的農民工生活愈來愈辛苦？喔，也許吧。」都市人說得事不關己，彷彿中國完全沒有斷層存在。然而，農民工眼中的中國確實存在著斷層，與都市人之間的鴻溝也在持續加深。在社會斷層如波濤一般逐漸擴大到歐洲、美國，乃至全世界的時代潮流下，我已全然失去自信，不敢斷言自己絕不會親眼目睹歷史在中國重演。

然後，習近平會這樣說吧：「那種事情，不用你說我也知道。」



## 後記

撰寫完本書的數日後，我搭上計程車要從上海機場返家。與司機交談幾句發現，對方說的不是上海腔。我問他來自何方，他說是安徽省的農村。我又問：「上海的計程車司機幾乎都是上海本地人，很少有外地出身者不是嗎？」結果對方答道：「因為上海年輕人在不動產泡沫下，手頭變得很寬裕，不想再做計程車司機了，就輪到我們這些鄉下人接手啦。」

聽他說自己今年三十歲，我又繼續追問。由於他的雙親之前都以農民工身分來上海討生活，因此他是在老家由祖父母撫養長大的留守兒童。原本初中學歷的人必須年滿十八歲才能入伍，但他說：「我老爹不知道去哪給我弄來一張大三歲的身分證。」所以他初中畢業後，立刻入伍成為人民解放軍。十八歲退伍後，便來到雙親居住的上海擔任警衛，並和同樣在上海工作，年長四歲的同鄉女性結婚。婚後不久就出生的女兒，今年小學六年級，雖然至今為止都是一家三口同住，但由於制度規定高中入學考試只能在戶籍地所在的老家接受測驗，因此預計不久之後就要送她回老家安徽去。換句話說，又要出現一個留守兒童了。

出於「可以一個人工作，感覺比較自在」的理由，這位計程車司機從兩年前開始投入這一行，他從一開始就放棄了上海買房，「可能得五十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吧。」不過他說：「房子的話我已經在老家那邊蓋好了。」我問他花了多少錢，他說：「不，是我自己蓋的。」我又再確認一次，不是啦，你是家鄉買了房子吧？貸款分幾年？「真的是我自己蓋的啊，我幾年前辭掉工作，暫時回鄉的那段時間，我自己買來磚頭，在老家角落一塊空地上，一磚一瓦蓋出來的啊，就靠我自己這雙

手，大概三個月就蓋好了吧，畢竟我也沒錢哪。」

我頓時陷入一種錯覺，以為自己聽見的是用磚塊蓋出牢固的家，以免被大野狼吹走的「三隻小豬」寓言故事。接著我想起上海計程車司機小邱的故事，他因為不動產泡沫而一夜致富，獲得三間公寓，也像是現代版的寓言故事。我再次心想：一個人出生在都市或農村，遭遇的寓言故事竟如此天差地別，這就是中國這個國家啊。

本書是根據筆者在《日經商務電子版》連載的「中國生活物語」專欄文章，經過大幅增改修正後彙總而成的作品。

為了總有一天能夠將中國農民工這種坦然堅毅，視不公平為無物的壯烈人生公諸於世，我大約從十年前開始一筆一墨地詳細記錄著。不過由於事關一群幾乎從未在日本被拿出來談論，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知道其存在的人，因此我遲遲沒有機會公開自己彙整好的內容，也一度不抱希望地心想，這樣下去恐怕沒有問世的一天。

當時主動向我提議「要不要開始寫一些關於中國的事」的人，是我的舊識，日經商業的編輯木村知史先生。在這樣的機緣之下，我開始在《日經商務電子版》的連載上，三不五時地描寫農民工的事。這一回付梓成書，則是開始連載當時的《日經商務電子版》總編輯飯村香織女士提議：「要不要將連載彙總成書？」當我提出自己想以農民工為切入點，描寫現代中國的構想時，她鼓勵我說：「你一定可以完成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此外，在整理成冊過程中，反覆提供明確建議並鼓舞激勵我的人，是日經商業的編輯日野直美女士。倘若沒有三位的協助，我那群重要的朋友，那些中國農民工的人生，不會有問世的一天，實在感激不盡。

此外，我也想藉此機會感謝我的父母與家人，謝謝你們以包容的心

守護著我，讓以如此特立獨行的步調走過我的人生。

山田泰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史大講堂

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  
掙扎與悲歌

著者：山田泰司 Yasuji Yamada

譯者：劉格安

副總編輯：陳逸華

總經理：陳芝宇

社長：羅國俊

發行人：林載爵

叢書主編：黃淑真

特約編輯：黃美玉

校對：馬文穎

封面設計：兒日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mailto:linking@udngroup.com)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初版

電子書製作日期：2020年4月

電子書製作：王聖淵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ISBN：978-957-08-5513-5

3 OKUNIN NO CHUGOKU NOMINKO KUITSUMEMONO BLUES

written by Yasuji Yamada

Copyright © 2017 by Yasuji Yama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through Keio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延伸閱讀——

## 低端人口

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

——派屈克·聖保羅



聯經社群



回函贈書

「上海正要把他們驅逐出去。」

長居中國的日本記者山田泰司，親眼目睹自己的農民工朋友生活日漸艱難，國家愈壯大，人民就愈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殘酷過程，並寫下最真實的第一手記錄。

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讓世界見證了中國的繁盛與強大的國力，但隨著城市的擴張與經濟的成長，遠離家鄉、自四面八方聚集而來，追逐「中國夢」的農民工，不僅沒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反而陷入難以謀生的窘境。山田泰司親身與這些生活艱苦卻樂觀的農民工長期往來，發現他們腹背是敵，不但被城市人排擠，也被制度排擠，更深深受制於政策的瞬息輾變。愈做愈窮已經不再是最大的困擾，問題是即便犧牲自己的人生，卻似乎再也成就不了什麼。

努力的人，不是該獲得回饋與獎賞嗎？  
為何卻彷彿總是在受懲罰？  
貧窮，注定是一代傳一代的嗎？

他們像被限制在農村出生的詛咒裡，只能遙望城市人注定更好、更光鮮的未來。原本就懸殊的貧富差距，更在這十幾年內劇烈擴大，大得就連原先樂天、欣然樂見國家富強的農民工，都忍不住要嘶吼一句：「政府到底要我們怎麼生存下去啊！」

占了先機、具備條件的人冷漠以對，政府則沉默不語，而掙扎、痛苦，甚至絕望無處申訴的農民工們生活的空間，又被一紙一紙的拆除公文漸漸限縮，甚至面臨被切除的命運。

中國經濟富強了，大城市欣欣向榮。對此，山田泰司說道：「入住率如此低的地方，摩天大樓卻一棟接一棟的蓋，到底是蓋給誰住的呢？」



建議分類：社會科學／社會議題／中國

YASUJI YAMADA

